

后浪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1973

危机因何发生

# 大转折

多绥婷——译

An

# Extraordinary Time

# → 1973 →

by Marc Levinson

[英] 马克·莱文森——著

繁荣为何不可持续

比尔·盖茨盛赞的经济史家马克·莱文森重磅新作  
解密繁荣为何不可持续，美国因何不能“再次伟大”

《华盛顿邮报》  
年度最佳经济学书籍

《战略与商业》  
年度图书

1973年，西方的命运迎来根本性的逆转！  
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固化，社会普遍焦虑……  
一场危机如何成为当今政治秩序的起源？

# 大转折

[英] 马克·莱文森 (Marc Levinson) 著  
多绥婷 译



## 版权信息

书名：

作者：

译者：

版权：

\_\_\_\_\_

# 目录

\_\_\_\_\_

# 引言



\_\_\_\_\_

②

\_\_\_\_\_

\_\_\_\_\_

④

1

\_\_\_\_\_

⑥

⑦

\_\_\_\_\_

1



\_\_\_\_\_

---

⑩

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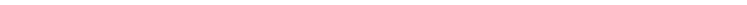
\_\_\_\_\_

⑬

⑭

1

1



①

---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 第1章 新经济学

①

②

\_\_\_\_\_

③

\_\_\_\_\_

④

⑤

\_\_\_\_\_



⑧



\_\_\_\_\_

⑨

⑩

\_\_\_\_\_

⑪

⑫

\_\_\_\_\_

1

14

15

16

1

⑰

⑱

①

①9

---

②

③

④

⑤

⑥



\_\_\_\_\_

⑦

⑧

⑨

---

⑩

⑪

⑫

⑬

---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1

## 第2章 魔方

\_\_\_\_\_



\_\_\_\_\_



\_\_\_\_\_

③

④

\_\_\_\_\_

⑤

\_\_\_\_\_

\_\_\_\_\_

\_\_\_\_\_

⑧

⑨

\_\_\_\_\_

⑩

⑪









1









⑪

⑫

21

22



\_\_\_\_\_

\_\_\_\_\_

②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 第3章 混乱局面

①



1

\_\_\_\_\_

②

\_\_\_\_\_

\_\_\_\_\_

④

\_\_\_\_\_

⑤

\_\_\_\_\_

⑥

⑦

1





⑧

⑨



①

---

②

③

④

⑤

⑥

---

⑦

⑧

⑨

## 第4章 信仰危机

①

②

\_\_\_\_\_

③

\_\_\_\_\_

④

⑤



\_\_\_\_\_

⑥

⑦

\_\_\_\_\_

\_\_\_\_\_



⑩

⑪

⑫

⑬

⑭

---

①

②

③

④

⑤

---

⑥

⑦

⑧

⑨

---

⑩

⑪

⑫

⑬

⑭

## 第5章 大滞胀



②

③

\_\_\_\_\_

④

⑤

\_\_\_\_\_

⑥

\_\_\_\_\_

⑦

⑧

1

\_\_\_\_\_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_\_\_\_\_

18

19

1

20

21

22

23

\_\_\_\_\_

24

25



---

①

②

③

④

---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

⑫

⑬

⑭

⑮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

②④

②⑤

②⑥

## 第6章 黄金男孩

1973年初，人们的心情轻松愉快。一年之后，随着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气氛已经完全不同。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联邦德国禁止了移民劳工的引入，而该国的工业从1955年开始就依赖于劳动力输入。奥地利很快就如法炮制。随着北欧和中欧地区的“招工”广告牌被摘下，来自土耳其、南斯拉夫、葡萄牙和希腊的家庭，原本数以百万计地进入德国务工，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阵痛。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气氛更加阴霾，一场煤炭工人的罢工引发了大规模的断电，工厂每周只能开3天工。在日本，政府正在与被《每日新闻》形容为“灾难性的”局面抗争。<sup>①</sup>

身处危机之中，就很难把目光移到失业和滞胀的紧迫压力之外，展望未来。但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剧变伴随着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跌宕起伏，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加深远、更加持久的影响。最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变化的是全球金融系统。越来越错综复杂的银行和中介机构网将工人的积蓄和石

油出口国的利润转化成了新工厂、高速公路以及对提高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房屋。银行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石油资金，而他们运用这些资金的方式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新型风险。最先发现金融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人之一，是一个威严的高个子英国人——令人敬畏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Gordon Richardson）。

理查森与亚瑟·伯恩斯的共同点比一般人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虽然表面上是无懈可击的英国贵族，但是理查森的出身远没有这么简单。和伯恩斯一样，他也是纯粹凭借着自己的头脑和雄心突破了阶层的限制，跻身于上流社会。

理查森出生于1915年，父亲是诺丁汉一家杂货铺的老板。他在声名卓著的诺丁汉中学当上了学生级长，并凭借奖学金进入了剑桥大学学习法律。“二战”结束后，理查森在伦敦的一家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并迅速脱颖而出。施罗德资产管理公司（J. Henry Schroder & Co.），伦敦最有声望的商业银行之一，将他收入麾下。理查森在1962年成了该银行的董事长。他以无可挑剔的外表、皇家般的尊贵气度和喜欢“纽约调法儿”的马提尼酒著称，将原本懒散经营的家族企业打造成了国际化的金融机构，处理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兼并和收购业务。1973年7月，57岁的理查森走上了事业的巅峰，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邀请他出任英格兰银行的第116任行长。<sup>②</sup>

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中央银行，还保留着穿粉色双排扣常礼服、戴大礼帽的门卫。它处于英国经济的核

心，并且手握重权。它负责管理女王陛下的借贷事项。它能够决定哪家公司可以获取外汇，用于进口商品和境外投资。它对利率进行管制，调节企业和购房者能够使用的贷款总额。而且它正式监管着英国境内两类主要的金融机构：承兑所，专门交易政府金边债券的商业银行；高街银行，大部分英国人存储积蓄的场所，比如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sup>③</sup>

由于伦敦的商业银行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办理股票上市和债券发行业务，银行行长的影响力远远不止局限于不列颠群岛。英格兰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经常被派遣去执掌商业银行，央行以此进一步巩固它在伦敦的影响力。央行行长的大部分职权都没有在法律中列明，而正是这种模糊性，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行长从位于针线街的华丽办公室走出，即可进入种植着桑葚树、如寺院一般宁静的室内花园。就是在这里，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行使着比全世界任何一国央行行长都重大的权力。

但在理查德接管英格兰银行之时，当局的权威已经受到了威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管制利率和限制资金流动的法规，以保障固定汇率不变。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解体，很多限制被摒弃了。国家的界限已经不再重要，金钱自由地涌入能带来更高的收益或者无须纳税的地方。大部分的资金来到了当时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并主要以美元的形式存储。



这些资金中的很大部分都属于中东和北非的石油产出国。随着石油价格的推高，这些国家的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石油美元的流入使得伦敦大银行的利润在1973年的上半年惊人地提高了80%。世界各地的银行都在伦敦开设了支行，以期能够分一杯羹。<sup>④</sup>

涌入大银行的资金多到银行无法将其全部贷出。英国政府鼓励他们使用“次级银行”处理过剩的资金，而次级银行的放贷条件要远比大银行宽松得多。很多次级银行的贷款用在了房地产投资领域，这在繁荣时期无疑是一条简单、低风险的收益途径。但在1973年11月，当一家名为伦敦郡证券（London and County Securities）的公司倒台时，轻松赚钱的好时光也戛然而止。该公司的失败虽然源于经理人的欺诈行为，却引发了消极的连锁效应。各大银行急于召回贷款以维持周转，但是很多借款人的资金已经投进了房地产，无法及时偿还。以国际大银行的标准来看，次级银行规模很小，然而却从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等伦敦巨头手中借入了巨额资金。从法律上看，理查森和英格兰银行并无责任。但是理查森还是挺身而出，强迫英国的大银行划拨资金，有序地对次级银行进行清理和关闭。<sup>⑤</sup>

次级银行危机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竟没有人对银行进行严格的监管。1973年11月，英格兰银行手中掌握的最新的有关伦敦郡证券的财务信息还是一张日期为3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而且其中并没有载明有关借贷、担保或者其他义务的细节。比它大得多的

银行也在接受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正式监管。没有审计人员到银行的办公楼里仔细检查他们的记录或研究他们的财务报告。“我们甚至连一份完整的损益表都不需要提供。”克兰沃特一本森银行的一名董事事后回忆道。每隔大约六个月左右，各家银行的高管就会拜访英格兰银行贴现办公室主任，向他出示最新的账目。每年一次，英格兰银行行长会邀请主要金融机构的董事长们喝茶，向他们询问是否有充足的短期资金，以及是否有必要减少房地产投资。据说，只要央行行长的眉头一皱，银行家们就知道要小心留意了。<sup>⑥</sup>

然而这些银行家们到底如何小心留意则被刻意地模糊了。英格兰银行倾向于保持神秘，行长一般不会发表公开演说。据说，英格兰银行新闻办公室的职责就是“让媒体别进银行，让银行别上媒体”。英格兰银行的历史研究员评论道：“查阅1980年之前的年度报告，我们连确认这些银行家的身份都做不到，更不用说了了解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了。”不同于法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几乎没有发布任何银行监管方面的细则。比如说，一家伦敦银行为了回应央行行长的关注而在几个月内收回了大量的境外贷款，但是央行行长到底希不希望看到境外贷款科目缩减5%或者20%，却是无从得知的。<sup>⑦</sup>

这种银行监管的方式有其优势。当伦敦的日子还没有这么不好过的时候，英格兰银行贴现办公室的人会每天与银行家们喝茶，听他们讲竞争对手的闲话。如果得到有人在市场上抛售法国债券或者某个机构的客户陷入困境的风声，贴现

办公室的主任，甚至行长，就会召集所有银行家并要求他们采取行动。英格兰银行没有罚款和颁布禁令的权限，但是它的告诫有着巨大的权威。没有人愿意和得罪过央行的机构做生意。仅仅是央行行长的一句不满，就足以让最桀骜不驯的银行家屈服。

理查森在1973年出任行长之时，英格兰银行正在艰难地追赶金融改革的步伐。虽然每家在伦敦设立的外国银行支行都经过了英格兰银行的批准，可以交易货币并吸收石油美元，但是核准的依据不过是银行母国的一纸证明。因此，就算是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信息并及时做出警告的老银行家，对于这些新来的外国机构也知之甚少。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英格兰银行对这些新来的银行的业务（包括账目、贷款审批程序，以及管理风险的方式）几乎一无所知。

理查森在银行监管方面还是个新手，但是上任头几个月的市场狂躁，让他强烈认识到了英格兰银行监管的缺陷。1974年冬天，在没有任何公开通知的情况下，理查森采取了两项革命性的措施。第一项是内部改革：贴现办公室被一个新部门——银行监管处取代。原来的贴现办公室只有20名员工，对银行进行检查也不是它的常规职责；银行监管处的规模更大，人员也更加专业。银行家不会再被请来喝茶了，从今以后，银行需要定期递交有关贷款、存款和借款的详细数据，而且监管处的主任会派遣专员仔细检查他们的文件，面试他们的员工，审核他们的制度。并没有任何法律赋予英格兰银

行这样的权力，但是理查森准确地预计到了，任何拒绝央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在伦敦都无法立足。<sup>⑧</sup>

理查森的第二项举措是国际化改革。央行官员以低调、含蓄的方式提醒金融界，国际银行业的繁荣带来了全新且不可预见的风险。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德国央行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副行长 1973年11月这样谈及银行争夺外国存款的情况：“私人机构的经济利益似乎与整个信贷业的健康发展发生了冲突。”在与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的一次私人谈话中，理查森更进一步地指出，外国美元流入美国，兑换成其他货币后再出借到世界各地的现状，有可能会打破整个银行体系的均衡。他建议在巴塞尔举行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sup>⑨</sup>

巴塞尔是莱茵河畔一座安静的瑞士小城，国际结算银行就坐落在那里。这家无名的机构由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组成，成立于1930年，初衷是处理凡尔赛条约下的德国赔偿金。到了20世纪60年代，其主要职能就剩下了在各国央行之间调动资金。这项工作相当专业而且无趣，以至于很少有非专业人士能将它准确地表述出来。这个默默无闻的地点也有一项优势，那就是周围没有大批的记者紧盯着往来的权贵。

20世纪70年代，央行官员们大约每月一次聚在这里开会，主要就是讨论经济形势。1974年3月到4月，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处理石油输出国膨胀的财富。发达国家的银行为了从大量流入的资金中谋利，就要将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再将资金贷出到境外。这就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风险。即便借

方及时还款，但如果汇率向不利的方向变动，还款金额就有可能低于银行应当付给存款人的本息。而且如果某个石油酋长国突然想要提回存款，将这笔钱用作五年期的英镑或荷兰盾贷款的银行就会面临流动性短缺。

这一前景令人担忧，因为在金融国际化、汇率浮动制的新世界里，银行与银行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不仅相互拆借资金，联合成为银团进行贷款，还会互换货币以满足各自客户的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交易需要拿未来某个日期的汇率做赌注。举例来说，一家西班牙的服装公司预计在6个月后会有一笔100万联邦德国马克的货款入账，这家公司可以与银行签订协议，锁定6个月后这笔资金在西班牙货币上的价值，如果到期日汇率向不利的方向变化，风险将全部由银行承担。相应的，银行又可能与其他银行签订类似的协议以对冲风险。任何时刻，此类交易下都有着数以千计的风险敞口，任意一家大型银行的破产，无论在何处发生，都可能引发世界范围的银行和经济危机。然而没有一家央行有权控制在新世界中诞生的全球银行业。正如美联储官员亨利·沃里克（Henry Wallich）在巴塞尔会议后向他的同僚干巴巴地汇报时所说：“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该领域的职责划分。”<sup>⑩</sup>

然而，已经没有时间进一步明确了。1974年5月，危机已经近在眼前。

危机爆发的地点相当不可思议——并不是纽约、伦敦或者东京的大型跨国银行，而是一家最多算得上中型的美国银

行，富兰克林国民银行。

富兰克林国民银行扎根于纽约郊区，面对大银行的扩张，其原本依靠特许经营权获取的收益不断受到挤压，因此经理人决定到境外寻求更高的收益。1969年，美联储准许它在巴哈马群岛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尽管主审人员对其账面上的不良贷款深表担忧，美联储还是在1971年批准了它在伦敦开设分行的申请。在获得了跨国银行的地位之后，富兰克林国民银行赢得了最令人垂涎的奖励。1972年6月1日，英格兰银行批准其从事外汇交易，正式接纳它成为“大联盟”的一员。一个月后，一位名叫米歇里·辛德那（Michele Sindona）的意大利律师获得了富兰克林国民银行21.6%的股权。<sup>⑪</sup>

时年52岁的辛德那，一路从西西里岛的贫穷乡村打拼到了意大利商业圈的顶端。作为蔬菜商人的儿子，他获得奖学金进入大学学习法律，并在“二战”期间靠走私蔬菜赚到了第一桶金。他衣着考究，剪裁得体的套装口袋里总是露出一方白色手帕，他与黑手党、天主教堂、意大利政界高层都建立了联系。除了打理梵蒂冈银行的投资外，他通过一系列控股公司在意大利、德国和瑞士持有多家银行、房地产和制造业企业的大量股份。他在美国的生意不多，富兰克林国民银行正好提供了一处据点。

然而，辛德那的律师们坚持，他的持股不应该达到取得控制权的程度——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一旦取得控制权，就意味着美联储将有权审查辛德那的其他商业行为。将购买

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股份严格当成一项投资，正如辛德那声称他在做的那样，是不需要美联储的批准的。

事实证明，辛德那绝非一名被动的股东。他推动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加强在外汇市场上的投资，而且很快就在银行的国际部里安插了自己的人手。这些人很快就不顾监管制度的限制，让银行向自己的股东辛德那的公司提供借款。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对外汇变动方向的预测相当不准，也因此损失了大量资金，但是辛德那的手下利用从辛德那的商业帝国里挪东补西的方式掩盖了这些损失。由于没有一家监管机构可以监管辛德那掌管的所有银行，也就没有人发现他们的欺诈。然而流言似乎掌握了真相：1973年秋天，一些满怀疑虑的银行暂停了与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外汇交易。但是这些消息外部人员无从得知。1973年12月，在纽约的圣瑞吉斯酒店的一场晚宴中，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专门赞扬了辛德那在外汇市场上的运作，将他称为“里拉的救星”。一个月之后，约翰·沃尔普，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更是提名辛德那为“年度人物”。<sup>⑫</sup>

1974年5月3日，伦敦的一家银行向官方传递了那些流言，纽约的调查员顺藤摸瓜，发现了富兰克林国民银行进行非法交易并隐瞒损失的证据。5月10日，美联储接管了这家银行。但是联储官员立即看出，他们不能简单地将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关闭。它是数百笔外汇交易的参与方，其中很多笔还有几个月才到期。如果这家银行突然倒闭，与它做交易的银行就要蒙受严重的损失。出于对造成全球性金融恐慌的担

忧，美国官方维持着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基本存续，逐渐减少它的持仓，最终才拍卖它的残值。

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只是金融稳定的时代终结的第一个迹象。就在美国人竭力控制损失的同时，联邦德国政府遭遇了一场极其相似的危机。最新的威胁来自科隆，当地一家鲜为人知的小银行突然压垮了半个地球之外的金融市场。

赫斯塔特银行（Bankhaus Herstatt）是一家致力于服务科隆金融界精英的私营机构，它的口号是“储蓄不应该是一场冒险”，然而它的行径却与之背道而驰。这家银行的老板伊万·赫斯塔特（Iwan Herstatt）允许年轻的外汇交易员团队，也就是他的“黄金男孩们”，规避内部控制，并在外汇市场上自由对赌。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赫斯塔特银行的财务报告显示，其资产足以覆盖全部交易损失，这些资产包括在瑞士经济银行的存款。瑞士的银行保密法相当严格，规定瑞士的银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赫斯塔特银行的存款规模，这也许就是审计师和德国的银行监管机关没有对存款进行核实的原因。如果做了尽职调查，他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瑞士经济银行并不存在。当监管机关最终在6月24日关闭赫斯塔特银行的时候，它的亏损已经接近5亿马克，是其存款人存入的资金6倍。

跟接下来发生的事件相比，上述亏损几乎称得上是微不足道。某个周二下午4时，德国官方抓捕了赫斯塔特本人，《明镜周刊》称这次行动为“一次避免金融混乱的闪电袭击”。但与美国不同，德国的监管机关没有考虑到赫斯塔特



与境外银行密集交易的事实。就在倒闭之前，赫斯塔特又收到了一些其他时区的银行的付款，但是向外国银行做出的相应付款却发生在倒闭之后。这些付款受到阻碍无法完成，给世界各地的银行都造成了损失，造成了外汇市场上连续数月的混乱局面。<sup>⑬</sup>

赫斯塔特倒闭的冲击引发了第三场跨国银行的破产风波。尽管此事受到的关注不多，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令人担忧。以色列—不列颠银行（Israel-British Bank）的倒闭并没有威胁到世界经济，但它揭示出，很多借以维护银行体系稳定的流程存在着危险的漏洞。<sup>⑭</sup>

以色列—不列颠银行是以色列的第六大银行，但是从国际标准来看，它只能算条小鱼。以色列—不列颠银行成立于1929年，由波兰移民建立，最初的名字是巴勒斯坦—不列颠银行，由英国犹太社区的领袖人物沃尔特·内森·威廉姆斯（Walter Nathan Williams）的继承人控制。威廉姆斯家族在犹太复国运动中很有影响力，而且与以色列的右翼政治团体关系紧密。到了1974年，该行在以色列已经有了八家支行，在伦敦有一家子公司。威廉姆斯的女婿，哈里·兰迪（Harry Landy），一名出生于威尔士的会计师，当时是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主席。另一个女婿，约书亚·本西翁（Joshua Bension），是副主席兼总经理。就在该行位于伦敦霍尔本的总部——威廉姆斯国家大厦，这两人同时还经营着一系列其他公司，包括英国的保险公司和以色列的葡萄庄园。<sup>⑮</sup>

给自己的股东和管理人提供关联贷款，是银行业务中最有潜在危害的行为之一，因为它给动机不纯的银行家提供了打劫自己公司的机会。正因如此，1970年，以色列银行监管机构命令以色列—不列颠银行限制其向威廉姆斯集团的贷款。但是兰迪和本西翁拒不接受。他们找到了一条回避监管的新路，办法是让自己的银行用资产向两家瑞士的银行提供担保。有了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资产作为抵押物，这两家瑞士银行向兰迪和本西翁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控股公司提供了7500万美金的贷款。如此操作下来，兰迪和本西翁就有办法将资金从以色列转移出去，而这又违背了以色列的外汇管理规定。<sup>①⑥</sup>

赫斯塔特事件让这种手段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随着金融市场的动荡，银行急于收缩国际业务——包括撤回他们存储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款项。1974年7月，也就是赫斯塔特银行倒闭两周之后，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发现他们的流动性不足以清偿外国存款人了。本西翁以银行在瑞士的资产为支撑，向以色列当局申请一笔应急贷款。就在当局准备拨款文件的同时，以色列中央银行的律师发现，这些资产已经被冻结，作为向兰迪和本西翁的公司提供秘密贷款的抵押。以色列当局因此撤销了应急贷款，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也就无法偿还伦敦的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贷款。两天之后，伦敦支行倒闭，尽管哈里·兰迪承诺“我们会坚持下去”。<sup>①⑦</sup>

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一不列颠银行并不是赫斯塔特危机的无辜受害者。该行业务兴隆靠的全是对监管者的欺瞒。周一到周五，它把资金留在伦敦，以取悦英格兰银行。等到了周末，伦敦支行就将资金借给它在特拉维夫的总行，确保其短期资金量能够满足以色列的监管要求。下周一一早总行就向伦敦支行还款，再次显示伦敦支行强大的资金实力。而当表演谢幕之时，以色列一不列颠银行远比它所展示的要窘迫得多。该银行的业务盘根错节，以致法庭指定的审计师团队花费数月才将其梳理清晰。受害者名单中美国政府赫然在列，因为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向以色列一不列颠银行提供的贷款，美国政府损失了210万美元。而以色列一不列颠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经营着相对简单的业务。如果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九家支行就能将监管方蒙在鼓里，那么对于那些手握石油美元的巨型银行，比如东京的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或者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⑮

米歇里·辛德那最终因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被判处65项联邦重罪，在美国的一家监狱服刑4年后，又被转移到意大利继续服刑，1986年死于一杯加了氰化物的咖啡。辛德那到底是选择了自杀，还是为了防止将安德烈奥蒂总理牵扯进丑闻而被谋杀，至今未有定论。伊万·赫斯塔特在1991年被认定为精神失常之前，曾两度因欺诈而定罪。约书亚·本西翁，在以色列被控窃取4700万美金，1975年被判入狱12年，两名首席拉比呼吁宽大处理也无济于事，1977年由总理梅纳赫姆·贝京释放。哈里·兰迪因欺诈被判处5年，但此判决19

79年在英国的法庭被推翻。无论是老于世故的辛德那、心宽体胖的赫斯塔特、虔诚的本西翁，还是口若悬河的兰迪，他们尽管性格千差万别，却都在银行监管体系中发现了同一个漏洞——如果一家银行的业务跨越了国界，就没有任何一国的监管者能够完整、清晰地掌握它的运转情况。<sup>①⑨</sup>

戈登·理查森向亚瑟·伯恩斯指出了这个漏洞，他们在1974年初把问题摆到了各国央行长官的面前。他们称，跨国银行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即便发生在小银行之间，也有可能引发大范围的经济危机。1974年12月，各国央行官员要求本国的银行监管者提出解决方案，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令人心惊的国际传导事件。<sup>②⑩</sup>

数十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975年某个星期二，各国银行监管者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或者想法聚集在巴塞尔弗雷甜品店楼上的单调会议室里的。与会者都是技术专家——籍籍无名的银行监管人员，而不是卓有声望的央行官员。大部分人互不相识。他们的语言也各不相同。在会议室里，代表们戴着耳机，听同声传译将大会的进程翻译成英语、日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在茶歇期间，他们的闲谈和交流都很费力。

与会人员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充分的法律授权，以及是否有资格将本国的信息在会上共享。有些人需要考量国内的政治形势，而有些参会代表所在的机构并不具备监管本国银行的全部权限。美联储无法代表财政部的货币监理署，而后者又没有出席巴塞尔会议；日本银行与未到场的财政部关系疏

远，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外交上的考虑也产生了干扰，尤其是法国更倾向于将金融监管作为一项欧洲事务来处理，而不是带上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一起玩。更何况这个有关银行规制与监管实践的委员会到底是干什么的也尚不明晰。会议议程主要由主席决定。经过一番谨慎地运作，理查森为一名同事争得了主席的位置，他就是英格兰银行的乔治·布伦登（George Blunden），而该人在处理银行违规方面经验并不丰富。<sup>②①</sup>

时年52岁的布伦登，是英格兰银行的资深知情人。作为英格兰银行终身员工的儿子，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在牛津大学学院毕业后进入了英格兰银行，然后就再未离开。20世纪70年代初，他升任管理服务处主任，负责管理行政办公室和电脑系统。他并不是银行监管领域的专家，但是英格兰银行的其他人也同样不是——毕竟，英格兰银行的监管更多要依赖于社会规范，而不是会计标准。布伦登的组织能力足以弥补他在监管经验方面的不足。针对银行系统数据信息不足的情况，他要求各家银行按月度和季度提交报告，内容包括外汇存款、房地产贷款、关联企业贷款等方面的详细数据。有了这些数字，布伦登手下的监管人员就可以比对不同的银行，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以规范他们的行为。<sup>②②</sup>

在第一次巴塞尔会议中，布伦登宣布，中央银行行长们希望委员会能够设计出一个体系，该体系能够为潜在的银行危机提供预警。此计划很快就以不切实际为名而被否决。经

历了数月的讨论之后，参会的监管者决定专注解决对他们造成最大困扰的一个问题——监管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

简单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银行有三种方式在母国以外拓展业务。第一种是成立子公司，这种形式类似于在境外设立本地银行，需要接受当地的全部监管政策。除此之外，子公司还要有自己的财务资源——用银行的话说，就是“资本”——即便境外的母公司破产了，它也能用自己的资本履行义务。第二种是设立境外分行，也就是仅在境外设立据点，这个据点拥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资产。如果一家支行无法向存款人付款，其总行需要代其履行义务，也可能不履行；加拿大和瑞典认为境外支行可能引发的风险太多，因此不允许外国在本国设立境外支行。第三种开展跨境业务的方式是成立合资银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共同持有股份。这种安排的问题是一旦出现危机，并不能确定这些境外的合作方是否会承担责任。<sup>②③</sup>

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是，外资经营的业务存在潜在的风险。外资的前哨已经遍布全球各地——从1971年到1974年，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境外支行数从303家上涨到了472家，但是监管者对它们的忽视令人震惊。他们对于本国银行的境外业务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很多国家的法律又禁止监管者跨境分享信息。德国的银行通过在卢森堡的子公司大举向波兰提供贷款，而德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对此毫不知情，结果就是，德累斯顿银行在卢森堡的子公司破产，几乎导致全球最大的一家银行以及与之有业务往来的数百家重要金融机构瘫

疾。日本的银行在欧洲和北美迅速扩张，但是日本央行承认他们极少对这些银行的境外支行进行审查。负责监管美国绝大多数大型银行的美联储，在境外完全没有监察人员。尽管很多美国银行在境外从事着本国法规所禁止的业务，比如发行债券和交易现货，美国的监管者完全没有能力监督他们的行为。<sup>②④</sup>

经过对上述问题长达一年的研究，各国监管者达成了共识。1975年9月，他们建议各国修改法律，允许银行监管机构在国际层面互通信息。他们相信，母国的监管机构应当有权检查本国银行在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而分支机构所在国的监管机构应母国的请求，有权对该分支机构进行检查。

这一初衷良好的安排，后来被称为《巴塞尔协议》，在当时饱受赞誉，它代表了过时的国家主权观念被更为开明的国际合作共识所取代。然而，最为棘手的问题，即金融机构跨境业务的最终责任主体是谁，尚未得到解决。“想要制定出明确的规则，将所有情况下的监管责任边界都确切地体现出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会者们得出结论。新协议中的内容，没有一条能够预防类似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赫斯塔特的危机发生，更不用说看穿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花招。运用国家权力监管跨国银行在政治上过于复杂，因此与会人员干脆决定完全放弃讨论。在金融国际化的新世界里，因为各国的弃权，将无人对监管工作负责。<sup>②⑤</sup>

银行监管者讨论的时间越长，流入石油出口国口袋的资金就越多。1973年10月，沙特阿拉伯出口轻质原油的官方价

格还是每桶5.12美元，这个数字在1974年1月升至每桶11.65美元，到了1975年又达到了每桶12.37美元，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入账的资金达到了1350亿美元。随着大量资金涌入银行体系，全世界的银行都在法兰克福、纽约、贝鲁特和亚特兰大设立了据点，使尽浑身解数吸纳储蓄，然后再将贷款发放给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客户。在那些想在新业务中分一杯羹的银行中，有很多并没有国际贷款的经验，对他们的新客户也缺乏了解。这是一颗定时炸弹，监管者也都知道。他们在巴塞尔讨论得越详细，也就越担心那个银行希望他们忽略的问题——资本不足。<sup>②⑥</sup>

资本对于银行来说至关重要。简单地说，资本代表了银行在遭受重大损失时偿付存款人和交易伙伴的能力。银行通过向投资方出售股份、在年利润中提取部分资金、建立不良贷款准备的方式筹集资本金。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银行的资本不能用于贷款，它必须以现金或者短期证券的方式闲置出来，以备紧急情况使用。在理想的情况下，一家银行发放的贷款越多，用于预防坏账而配置的资本金也应该越高。但是银行家们痛切地意识到，大量闲置资本将导致股东回报率下降。20世纪70年代中期，很多银行几乎完全没有自有资本。纽约花旗集团的沃尔特·里斯顿，几乎算得上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宣称精细化管理可以降低银行资本金的必要性，他明确表示，他的银行将尽可能少地持有资本。大银行的贷款和交易规模日益扩大，但是他们的资本金却没有相应地增加。<sup>②⑦</sup>



第一个公开敲响警钟的人是亚瑟·伯恩斯。伯恩斯惊讶地发现，美联储不得不出手扶助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并给赫斯塔特事件擦屁股。1974年10月在檀香山，伯恩斯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上致辞，这次他完全没有费心客套和寒暄。

“银行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过于激进地吸收短期存款，而发放贷款时对期限和还款可能性又考虑得太少了。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张，“对维持银行信用起到关键作用的资本缓冲被逐渐稀释，尤其是在一些大型银行”。他还宣布，监管机构打算采取“短暂休整”的政策，在银行拥有更加稳健的基础之前延缓银行的扩张。<sup>②8</sup>

公众对这些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各地的银行监管机构不约而同地将衡量银行实力的关键指标——资本与贷款以及其他资产的比率秘而不宣。在不利消息被散播出去的极少数场合中，监管者会反过来帮银行遮掩。1976年1月，华盛顿邮报报道，当时全美第二大和第三大银行——第一国家城市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出现在“问题机构”的官方清单上。而他们的监管者，货币监理署的长官詹姆斯·E. 史密斯，坚称他们属于“全世界最稳健的银行机构”。但在大量借款人明显丧失还款能力的情况下，这两家银行怎么还能称得上稳健，史密斯没有深入说明。很多法国和日本的银行几乎没有任何资本，一旦他们的贷款无法收回，政府就会陷入被动。<sup>②9</sup>

银行究竟应该持有多大比例的资本，这一问题相当敏感，监管委员会在1976年10月决定暂不讨论。每个国家都要

独自面对、独自解决。没有国家经得起激进的改革。如果一家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要比它的境外竞争者高出许多，这对它来说将是一个劣势。保罗·沃尔克1975年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以及约翰·海曼1977年担任货币监理署长官时，都曾要求美国银行增发新股或者提留利润以提高资本水平，他们都遇到了层层阻力。哪怕是资本水平的微小提高，都需要数年才能实现。虽然表面上看石油美元源源涌入，国际信贷业务蓬勃发展，银行业的基础实际上却越发不堪一击了。正如戈登·理查森担忧的，国际金融的扩张速度太快了，监管者的能力远远达不到保证其业务安全稳健的水平。用不了几年，严重的后果就会浮现，被贪婪和石油美元刺激得胆大妄为的银行业将会带垮整个世界金融体系。<sup>③④</sup>

---

① Richard Halloran, "Japan Braces for a Full-Scale Oil Crisi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973.

② 关于理查德森的背景，请参见诺丁汉市的官方网站[www.nottinghamcity.gov.uk/index.aspx?articleid=4116#R](http://www.nottinghamcity.gov.uk/index.aspx?articleid=4116#R), viewed October 26, 2011. See also Anthony Loehnis, "Lord Richardson of Duntisbourne Obituary," *The Guardian*, January 24, 2010; "Lord Richardson of Duntisbourne, KG," *The Telegraph*, January 24, 2010; William Keegan, "Lord Richardson of Duntisbourne: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During the Troubled Times of the 1970s and early 1980s," *The Independent*, February 9, 2010.

③ Forrest Capie, *The Bank of England, 1950s to 197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19.

④ Clyde H. Farnsworth, "Force on Monetary Scene: Oil Money from Mideast,"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73; Michael Blanden, "NatWest weighs in with bumper £92m. profit," *Financial Times*, July 25, 1973;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0), 980, 986.

⑤ On fringe banking, see Daniel O' Shea, "Role of secondary bank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1, 1972, and Kenneth Lewis, "Secondary Bank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0, 1973. On the crisis, see Capie, *Bank of England*, 531-577; Michael Flandén, "Secondary banks: an end to freewheeling,"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4, 1973; Margaret Reid, "How the 'Bankers Lifeboat' came to the rescu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9, 1974; and Derek Matthews, "London and County Securities: A case study in audit and regulatory failure," *Accounting, Audit and Accountability Journal* 18(2005): 518-536. On legal authority, see the statement by Sir Geoffrey Howe,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fringe banks, in Hansard,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vol. 865, December 3, 1973, 909.

⑥ Paul Thompson, "The Pyrrhic Victory of Gentlemanly Capitalism: The Financial Elite of the City of London, 1945-90, Part 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2(1997): 433; Capie, *Bank of England*, 532, 596-597.

⑦ Ibid., 499-507, 824.

⑧ Ibid., 605-614.

⑨ Otmar Emminger, "Probleme der Stabilitätspolitik," address to the Association of Public Credit Institutions, Frankfurt, November 9, 1973, BA, B102/165947.

⑩ Henry C. Wallich, "Notes on BIS Meeting of March 11-12, 1974," March 18, 1974, in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March 18-19, 1974, Attachment B; Fed

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pril 15 - 16, 1974.

⑪ Joan Spero, *The Failure of the Franklin National Ban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46 - 51.

⑫ Ibid., 53 - 57, 64 - 66, 81 - 83.

⑬ "Bankencrash: Die Bilder sind bedruckend," *Der Spiegel*, July 1, 1974.

⑭ Meir Heth, Bank of Israel, "The Failures of Israel-British Bank, Tel-Aviv, and Israel-British Bank (London): Some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rchive (BISA), BS75/47, 1/3A(3), vol. 19.

⑮ Richard Redden, "Probe May Prove a Classic Example,"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6, 1975; Gil Sedan, "Bank Scandal Hits Israel,"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July 11, 1974.

⑯ 多数新闻报道中隐去了瑞士银行这个名字，但它在下面的文章中被报道出来："Banking Scandal Hits Israel," *Washington Post*, July 21, 1974. See also Paul J. Green, "When a Bank Is Not a Bank," *Brooklyn Law Review* 43 (1976): 899.

⑰ "Israel-British Bank (London) closes doors," *Financial Times*, July 12, 1974.

⑱ "Israelis to Allow Pooling of British Bank's Assets,"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75. 关于以色列—不列颠银行越过英国流动性指导线的情况，参见：BISA, BS/75/3,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commercial banks' foreign currency transactions: Summary of replies received from the central banks," March 26, 1975, BISA, 1/3A(3), vol. 18; "Liquidity Crunch Gets New Victims at Foreign Bank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0, 1974.

⑲ Eric Silver, "12 years for Bension," *The Guardian*, February 24, 1975; "Anger at Begin move to pardon banker," *The Tim*

es (London), September 10, 1977; “Fraud convictions quashed after judge’s ‘unclear’ summing up,” *The Guardian*, January 13, 1981; David Lane, *Into the Heart of the Mafia: A Journey Through the Italian South*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9), 4.

⑳ 在要求其他央行行长授权之前，两人已就委员会的任务达成一致。

㉑ 一种说法是，德国联邦银行的代表急忙向德国联邦监督局的同行介绍自己的情况。虽然他们的职责有重叠，但来自法兰克福的联邦银行家和来自柏林的监督员从未见过面。Cable, US Mission to the EC, Brussels, to Secretary of State, NARA, RG 59,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Electronic Telegrams, <https://aad.archives.gov/aad/>, 1975ECBRU02657, March 25, 1975; George Alexander Walker, *International Banking Regulation Law,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Hague, 2001), 36; Charles Goodhart,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A History of the Early Years, 1974-199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3; confidential interviews. 保罗·沃尔克强调，委员会缺乏法律权威。对此我深表感激。

㉒ Goodhart, *Basel Committee*, 53; Alex Brummer, “Bank of England names supremo in wake of crises,” *The Guardian*, July 19, 1974; Alex Brummer and Tom Tickell, “Adding up the list of ‘don’ts’,”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7, 1976. 乔治·布伦登的父亲也叫乔治·布伦登，在银行的会计部门工作，直到1955年退休为止，参见：Bank of England, *Old Lady Magazine*, March 1955, 58。

㉓ “Informal record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 held at the BIS on 6th-7th February 1975,” April 3, 1975, BISA, 1/3A(3), vol. 18; “Informal record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 held at the BIS on 11th-12th December 1975,” BISA, 1/3A(3), vol. 22.

㉔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anking supervision,”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17 (1977): 325. George W. Mi

tchell, "How the Fed sees multinational bank regulation," *The Banker* 124 (1974): 757-760; "International Banking Survey," *The Economist*, March 20, 1982; Colin Campbell, interview with Don Templeman, Colin Campbell Collection, Special Collections Department, Georgetown University Library, Washington, D C, box 2.

②⑤ "Report to the Governors on the supervision of banks' foreign establishments," September 26, 1975, BISA, BS/75/44, 1/3A(3), vol. 20; "Informal record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 held at the BIS on 19th-20th June 1975," BISA, BS/75/40, 1/3A(3), vol. 19. Ethan B. Kapstein, "Resolving the Regulator's Dilemma: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Banking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3 (1989): 330. 卡普斯坦将协议描述为一个“君子协议”，而不是一个“针对银行失误的处理框架。”就目前而言，这一点是准确的，但却忽略了一些条款，这些条款试图以可能避免国际银行倒闭的方式规定监管责任，而且是以过于模糊的方式规定的。“Strictly confidential: Note on the Committee's discussion of the paper, 'The failures of Israel-British Bank, Tel-Aviv and Israel-British Bank (London): Some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by Dr. Heth of the Bank of Israel,” November 3, 1975, BISA, BS/75/56, 1/3A(3), vol. 20; "Informal record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 held at the BIS on 11th-12th December 1975," BISA, 1/3A(3), vol. 22; BIS staff paper BS/76/3,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problem bank situation," distributed to the committee on March 5, 1976, BISA, BS/75/56, 1/3A(3), vol. 22.

②⑥ 1973—1978年，欧佩克每年的原油产量在100亿至114亿桶之间。See Liscom, ed., *Energy Decade*, 372.

②⑦ Philip Green, "Citibank's Apostle of Innovation," *Washington Post*, July 28, 1974; confidential interviews.

②⑧ Arthur F. Burns, "Maintaining the Soundness of Our Banking System," address to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Honolulu, Hawaii, October 21, 1974.

②⑨ See comments by F. R. Dahl, Federal Reserve Board, in BIS A, BS/76/37 Banking Supervision 1976/4; "Informal record of the fourteenth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 held in Basel on 26th and 27<sup>th</sup> October 1978," BISA, BS/78/42, Banking Supervision: Informal Records 01/78 - 11/79; "Cost to International Banks of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Maintenance of Reserve and Capital Ratios," BISA BS/79/49, 1979/10; Ronald Kessler, "Citibank, Chase Manhattan on U.S. Problem Lis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1, 1976; "Citibank, Chase Listed as 'Problem' Banks But Regulators Say Neither Is in Danger,"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2, 1976; confidential interviews.

③⑩ "Informal record of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 held at the BIS on 28th-29th October 1976," BISA, Banking Supervision: Informal Records, BS/77/1, 02/75 - 06/77; "Cost to International Banks of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Maintenance of Reserve and Capital Ratios," BISA, BS/79/49, 1979/10.

## 第7章 配额与侍妾



①

②

---

③

④

1

⑤

⑥

\_\_\_\_\_

⑧

\_\_\_\_\_



1

⑩

⑪

⑫

⑬

1

14

15

\_\_\_\_\_

⑩

⑪

\_\_\_\_\_







\_\_\_\_\_

22

①

---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⑨

⑩

⑪

⑫

---

⑬

⑭

⑮

⑯

⑰

---

⑱

⑲

⑳

㉑

\_\_\_\_\_

## 第8章 出口机器

也许正是厕纸事件让日本认清了眼前的危机。1973年10月底，就在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降低产量、提高油价的同时，大阪附近开始流传一个谣言，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厕纸马上就要用完了。某个小报报道了这则新闻，成群的家庭主妇马上就聚集到了杂货店，把见到的每一卷纸都买回家。一则宣称国家没有厕纸储备的政府声明更是火上浇油，公众完全陷入了恐慌。在尼崎，一位年迈的老妇人在商场抢购时被人群推倒，摔断了一条腿。在静冈，一名男子买了整整1000卷厕纸，以防万一。在东京，商店给个人消费者的采购数量设置了上限。就在日本人在小小的公寓里堆满成箱的手纸的同时，政府介入了，批发商接到命令清空仓库里的存货，以终止眼前这场闹剧。<sup>①</sup>

就连卫生纸市场都陷入了混乱，在日本，人们不得不承认国家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飙升的油价给日本带来的威胁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利用黄金时代的机遇，日



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从战后的乞讨者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石油危机冲击了这个取得了惊人财富的社会的集体梦想。日本政府不顾一切地想要保住他们空前而辉煌的成就。而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将重新塑造世界贸易的格局，并让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危机感与日俱增。

20世纪60年代是奇迹般的十年。在其初期，日本的农业人口（1280万）要多于工业人口（940万），而且投身工业的人口大多要操作缝纫机，或者机械地检视注塑机吐出的廉价塑料玩偶。接下来的十年中，制造商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西方最先进的设备，每年都能将平均生产率提高10%，与此同时还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剔除通胀因素，日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倍以上，数百万名消费者买上了冰箱、汽车和彩色电视机。只要肯做，就有工作的机会。公司千方百计地留住员工，向焦躁不安者承诺终身职位，这种新的方法很快被视为宝贵的传统。<sup>②</sup>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通商产业省负责规划日本未来的精英官僚开始担心国家经济很快就要坠入谷底。他们的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繁荣背后的基础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牢固。

日本经济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到三个方面。一是引进欧洲和美国的技术。日本的企业大量购买境外专利，然后用它们提高本国工厂的效率。据估计，仅仅是新技术一项，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就为日本经济贡献大约每年2%的增长率，直到石油危机爆发。二是大量投资资本

的注入。受到利息收入低税率政策的鼓舞，日本家庭的储蓄率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飙升。银行将这部分资金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了制造商。第三个重要原因与前两项紧密相关，那就是经济的规模效应。技工的小作坊转变成了装备着现代机器的巨型工厂，规模经济的作用凸显了出来。<sup>③</sup>

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就是一部制造业的发家史。到了1970年，国内总收入的45%都是在工厂车间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样的高增长率难以永葆。利用西方技术升级工业的红利已经成为过去。廉价的贷款和过分的热情导致资本投资过剩。一旦大型工厂完全取代了低效作坊，生产率的飞速提升也就难以复制。到了1970年，超过一半的日本工业产量都来自工人数大于300的厂家。

与此同时，经济的其他领域却仍保持着极端的低效。1970年，日本有711,269家食品商店，每家店平均只为43个家庭服务。烘焙店的平均雇员人数是2名，而药店的平均雇员人数是3名。由于法律限制了零售店的规模，每年新开张的小商店又有数千家之多。在银行，只是把几百美元兑换成日元就要花上15~20分钟，需要与数名银行职员交谈，这些职员都要对交易进行批准，最后才能换得区区上万日元。在电子业和金属制造业的生产率在奇迹十年中领跑的同时，卡车运输业和铁路业的生产率几乎完全没有提高。<sup>④</sup>

通商产业省的专家们预见20世纪70年代是现代化的时代。他们提出增强日本的服务产业。他们倾向于准许零售企业扩大规模，这样成百上千的夫妻商店业主就不得不找更具

有生产性的工作谋生了。而且，他们敦促制造商转型，尽快从基础的金属锻造业，转向更适合发达经济体和高素质劳动力的产业，比如计算机产业和航空发动机制造。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凸显了他们指导日本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先见之明，因为日元的升值让日本制造业陷入阵痛。就在1971—1973年这两年的时间里，用美元衡量的时均劳动力成本提高了38%，导致大量日本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1973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18%，工人们两位数的工资上涨幅度根本跟不上通胀的步伐，却让日本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昂贵了。到了1973年秋天，石油危机冲击日本经济，实业家们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担忧，而家庭主妇们则开始对被报纸形容为“疯狂”的物价感到恼火和不满。<sup>⑤</sup>

正是黄金时期低廉的原油价格，让日本这个既不出产石油也不出产天然气的国家能够大力发展化工、制铝和钢铁产业，所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提价行为立即威胁到了日本工业的核心利益。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的心态从担忧急转直下，变成了彻底的阴霾。两年之前，各大公司都急于为装配线和柜台添置人手，刚刚中学毕业的15岁男孩平均每人能拿到5.8个工作邀请。但到了1973年的最后几个月，多余的员工则面临着被解雇的命运。女性员工最先受到了“经营规模下降”的冲击，企业解雇了临时工和兼职员工，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以保障父亲和丈夫们还有工作。但是随着公司利润的萎缩，男性员工也被贬为低收入的合同工，按兼职的时间表工作，或者被迫提前退休。政府要求企业减少能源消耗，以节约珍贵的石油，但工业产量还是陡然下降。3月将

近，警察署提醒政府，可能会有暴力冲突发生，因为又到了工会每年发动“春季攻势”要求涨工资的时间。<sup>⑥</sup>

政府在尽力鼓励乐观的情绪。1974年1月时，政府预计到1975年3月经济增长将达到2.5%。即便预测成真，这仍会是1945年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以来日本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但是增长的部分还能勉强给工人们加薪。然而，现实却远比人们预想的严酷。随着石油危机大幅提升进口价格，国际贸易迅速转向逆差，日本的外汇储备能否支撑到买够供照明使用的石油都成了疑问。与此同时，飙升的物价证明了政府关于通货膨胀将得到遏制的预言再次破灭。到了年均通胀率超过20%之时，日本央行认为除了提高利率已别无选择，尽管经济仍然疲软不振。“通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手握重权的通商产业省次官山下英明告知媒体，如果解决不好，“日本经济将面临全面崩溃。”<sup>⑦</sup>

反通货膨胀的战役对消费者和企业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73年，日本还是一枚璀璨的国际巨星。但到了1974年中期，日本的经济表现已经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差，社会稳定也受到了威胁。日本急需大量的美元支付石油账单。政府首脑们认为，他们除了扩大出口别无选择。<sup>⑧</sup>

出口导向型增长远远谈不上什么新观点。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就通过出口女装和收音机，然后是纺织品和钢铁，重建了举国的制造业。日本几乎每年都面临贸易逆差，因为进口原油和工厂设备的花销要远高于出口的收入。但是这些进口得来的生产资料，为工业产量的大幅提升奠定

了基础。第一批出口的日本汽车，即便数量极少，也出现在了美国和泰国的街头。1968年9月，通向加利福尼亚州的集装箱服务一经开通，国际运输成本降低，美国电气商店的货架上就挤满了日本制造的电视机、音响和微波炉。日本的长期贸易逆差终于扭转为顺差。<sup>⑨</sup>

政治压力在美国立即显现了出来。美国的汽车公司、钢铁企业和电子制造商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突如其来的竞争相当不满。1968年春天，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和欧洲“自愿”减少向美国出口钢铁。几个月之后，美国的彩电制造商请求政府对日本出口的电视机征收惩罚性关税。8月，理查德·尼克松为了在竞选中争取到南方的支持，承诺当地的纺织企业，他将尝试减少毛织品和人造纤维制品的进口。

尼克松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69年1月宣誓就职不久，他就指派了首席竞选顾问去处理纺织业的事务。当记者问他是否会在贸易方面制裁日本时，他回答说“更愿意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处理”。其言下之意，如果日本不限制纺织品的出口量，国会将通过法案对日本纺织品采取进口配额制度。东京没有忽略他的暗示：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都是美国购买的，更不用说美国还是日本的盟友和保护者；日本的军事支出相对有限，但有数以万计的美国士兵驻扎在日本的本土和冲绳岛上。1969年11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问华盛顿时，主要议题是将冲绳岛归还日本管理，但是纺织品出口的问题也在议程之中。出人意料的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

花了两个多小时讨论羊毛和合成纤维。经历了两国政府高层之间长达两年的艰难谈判，最终在1972年年初，日本同意限制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增长。<sup>⑩</sup>

美国人的强烈怒意让日本感到震惊。谁能想到一国总统会因为衣服的布料而去严厉指责另一国的首相呢？作为回应，通商产业省转变了对日本企业的指导方针，并在1972年宣布：“‘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扩大出口’的理念已经不再适宜。根据现今的形势，该政策极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通商产业省建议，日本应该转向出口技术密集型商品，而不仅仅是扩大现有出口品的出口总量。<sup>⑪</sup>

通商产业省并不是简单地提出不含倾向性的建议。在日本的大环境下，无视其意见的企业将自食苦果，因为通商产业省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指导方式。胡萝卜就是发放给企业的贷款和津贴，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受鼓励行业的发展，以及在夕阳行业裁员时补贴失业的工人。在某些情况下，几家竞争企业甚至可以获准无视反垄断法的规定，共同决定哪些工厂需要关闭。大棒就没有那么昭彰了，但是重要性却丝毫不减。对通商产业省的意见视而不见的企业，会发现自己很难申请到银行贷款。他们为了对抗进口产品而提出的贸易保护要求将得不到回应。而且政府可能会把“自愿”的出口限制强加给他们。通商产业省的话并不是真正的法律，但是鲜有企业敢与之相抗。

能源匮乏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让高耗能的传统工业难以为继，曾经推动日本崛起的重工业走向了衰退。尽管工会

在1975年建议降低工资以避免大规模裁员，但很多生产钢铁、纺织品、铝制品和化工产品的工厂已经病入膏肓。商业领袖们已经开始认清现实，一位经济学家在1976年就轻描淡写地说：“9%的增长率，一度被认为是70年代下半叶合理的发展速度，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需求的复苏毫无希望，很多工厂被整个拆除。制造业开始大批裁员：1973—1979年，8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1976年，失业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此时第一次达到了2%，而且没有降低的迹象。<sup>⑫</sup>

为了减轻旧有经济产业衰退的冲击，政府采取干预措施，以避免大面积失业。按照计划，如果企业愿意将衰退产业的工人转移到新兴产业，政府将对其返还部分税收。此外还有工资补贴、培训津贴，以及为远离家乡寻找工作的工人提供的补助。政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补贴被迫削减工作时间的工人。在特定产业中，如果企业愿意对45岁以上的工人进行再培训，政府将支付他们工资的四分之一。然而尽管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通商产业省几乎无所不能，但事实上它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1973—1978年，日本船舶制造商的订单量下降了90%，造船业的规模无疑应当缩减。但是没有地方愿意失去本地的造船厂，也没有企业愿意关闭自己的码头。直到1978年，距离造船业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5年，日本国会才授权建立了一个拆船协会。由国家 and 地方政府、银行业、大型商社和船舶制造商共同注资组成。到了1980年末，这家大型卡特尔共并购和拆除了日本138

家造船船坞中的50家，减少了119,000个工作岗位，但也让产业中余下的其他企业有了更坚实的发展基础。<sup>⑬</sup>

类似的故事也在很多其他行业上演。1972年，日本的铝产量高达100万吨。10年之后，总产出下降了70%，近一半的熔炼厂都关门大吉。制造电钻、压缩机和电风扇等简单电器的厂商，眼睁睁地看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少。造纸商在1977—1981年间关闭了七分之一的纸板制造设备，而纺织企业则将尼龙纤维产量降低了五分之一。1972年艰难制定出来的要求日本限制向美国出口人造纤维制品的协议，最终被证明是一张废纸，因为出口量从未达到总量的上限——很多纺织厂已经永久关闭了。<sup>⑭</sup>

旧经济结构为新兴产业让路，在此过程中，管理与设计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低价的能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日本将通过汽车、先进的电子产品和精密仪器而不是成吨出售的日用品创造财富。

新兴经济在汽车行业的效果最为明显。战后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不啻为一部传奇。丰田公司，最初以生产织布机和缝纫机发家，曾经考虑是否要关闭它规模极小的汽车制造生产线，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大批军用卡车的订单扭转了局势。本田公司，另一家以制造电动自行车起家的企业，直到1963年才生产了第一辆小客车。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企业已经颇具实力，日本汽车行业的年生产量高达250万辆。想把迅速累积起来的收入花在汽车上的工人，除了购买本国制造的汽车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进口关税



导致美国福特汽车或德国大众汽车的价格比原价高出30%~40%，而且给进口的大型车上牌照的费用也远高于小巧的国产车。事实上，很少有经销商愿意经营进口汽车。1966年，全日本仅进口了15,244辆汽车。

1973年石油价格的飙升给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虽然日本制造的车型小，也不特别舒适，但却比大型的美国车和德国车省油得多。制造商受到了政府的鼓励，在日本各地开设了大量新的装配厂、发动机生产厂、变速器生产厂和部件厂。1966年，日本的汽车生产量占全世界的5%，同时也留下了质量差、易损毁的恶名。直到1973年末汽油价格飙升，达特桑和丰田汽车才开始畅销境外。此时，制造商扩增的生产能力为迅速提高产量创造了条件。日本的汽车年产量在1973年为450万台，等到198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700万台。卡车、引擎和动力摩托的产出已经过剩。从1973年到1980年，日本的汽车出口数量翻了3倍，而卡车的出口量增长得更快。随着汽车品质的提升，更多富裕的境外消费者愿意给日本制造一个机会。1978年，日元的大幅升值也没有对汽车销售造成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日本汽车在美国已经随处可见，及至1980年，日本制造已经占到美国汽车销售总量的四分之一。<sup>⑮</sup>

正如通商产业省的规划者所预见的，小型汽车成了日本“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锋。20世纪70年代，排除通胀因素后，日本劳动者的人均研发支出提高了70%，日本从山寨产品的制造厂转变为创新的发源地。随着“更轻、更薄、更短、

更小”的信条在日本产业界盛行，高速计算机、采用一流光学技术的高端照相机、数控机床和高功率彩色复印机，开始大批地从日本工厂中产出。也不是每项努力都能够点石成金——通商产业省谋划多年，想生产出日本自己的喷气发动机，结果却一无所成——但是成功的案例已经足以让日本跻身出口大国的行列。<sup>①⑥</sup>

1973年石油危机之下，日本国际收支再次转为赤字，回归到了1969年以前的常态。1974年的贸易逆差则高达60亿美元，无疑是日本经济史上的峰值。但是收支表里的红线只是暂时的。重建的出口机器开始运转，同时国家又出台了限制进口的大部头法规，日本的贸易顺差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充沛的外汇让日本经济涅槃重生。到了1975年，日本经济再次进入增长期，虽然速度远远低于1973年之前。整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表现都远远优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直到后来，人们才会认清，这些收益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专注于打造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日本政府，几乎完全忽视了国内极其低效的服务业。日本服务业1980年的生产效率竟然比1970年还要低。用现在的眼光看，阻碍开设大型商场、在货运领域限制竞争、强制银行在周末关闭自助取款机，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限制措施，都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拖累。但在当时，制造业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日本服务业的严峻形势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sup>①⑦</sup>

抛去日本的贸易顺差不谈，石油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而这将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日本

与向其提供原材料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贸易长期保持着逆差，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则始终是顺差，这些国家先进的工业制品与日本是竞争关系。一方面日本从贸易逆差转向了顺差，另一方面美国却从1975年前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转而陷入了巨额贸易逆差的泥潭。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重工业的心脏，开始被称为“铁锈地带”，成了“去工业化”这一顽疾的第一批受害者。加拿大和欧洲也有自己的铁锈地带，英国的中部地区、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法国和比利时的煤铁城市，都将很快与美国往昔的工业重镇一样破败凋零。<sup>⑮</sup>

贯穿整个黄金时代，各国的制造商都从看似永无止境的商品需求中获益。利润无疑是丰厚的——远远高于农业、采矿业或者服务业——而增长的资本又被投入到了提高工资、研发新产品和建设更多的工厂上。1973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加之日本挤入了先进制造商的行列，台湾和韩国也受日本启发走上了迅速工业化的道路，在石油价格攀升推高成本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过剩。随着制造业利润的暴跌，大批工厂都仅仅是部分开工，或者干脆完全关闭。<sup>⑯</sup>

在代议民主制社会中，没有任何政府能够被动接受某个行业的整体消亡，以及随之产生的大量失业。挽救衰退行业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诸国在面对制造业危机时，第一反应都是扶植地方工业并保住工人的饭碗。尽管各国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是主张的论调都是大同小异。

照其说法，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特殊且不可取代的角色：工资高于平均水平、为国家生产率的增长贡献重大，而且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远高于服务业。日本正在通过不正当竞争威胁他国的制造业基础，在补贴出口行业的同时，将外国产品排斥出日本市场。面对这一指责，通商产业省从中协调，各国政府提出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保证本国制造业得以良性发展。

在美国，救援行动主要以贸易保护的形式展开。1974年石油危机之后的大萧条时期，国会为大企业和工会的行动铺路，声称进口对他们造成了“严重损害”。政府凭借《1974年贸易法》向他国施压，要求减少向美国运送的货物，如果各国不愿主动配合，新法律将按照受损企业的要求提高关税，直至该产品被赶出美国市场。各行各业的生产商，从皮鞋到打字机，一致宣称他们受到了“严重损害”——这个概念在法律中并未明确定义——要求政府把他们的境外竞争者拦在国门之外。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某种奇特的产业政策，那些在华盛顿最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行业受到了保护，而不是在经济上更加重要的行业。<sup>②⑩</sup>

螺栓、螺母和螺杆行业的境遇，为我们提供了新规则运行的标准案例。美国有成百上千家螺栓和螺母生产企业，其中一些是高度自动化的，另一些则相当落后，需要戴着手套的工人用火钳夹着螺栓在炼铁炉中定型。1977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在听取了企业和工会的请愿后，裁定此行业受到进口的严重损害，而进口品的

四分之三来自日本。委员会敦促卡特总统对进口螺栓、螺母和螺杆增加关税，下限为商品价格的20%。卡特拒绝了这一提议，因此更加坐实了他自由贸易主义者以及亲日派的名声。<sup>②①</sup>

几个月之后，国会议员在1978年6月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再次调查此事。委员会再次建议提高关税。这一次，卡特没能顶住压力，同意将关税提高15%，为期3年，从1979年1月开始实行。高价的进口产品给本国制造商创造了提价的空间，使用螺栓和螺母的生产企业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根据一项测算，通过限制来自亚洲的进口来“拯救”一个美国工作机会的成本是55万美元——而此时，普通螺栓生产工人的平均年薪仅为2.3万美元。尽管如此，卡特的政策也无法保全一个落后的行业。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螺栓、螺母和螺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年销售收入还是比1979年低了15%。<sup>②②</sup>

螺栓行业仅是20世纪70年代中以保留工作机会的名义争取到政府保护的众多行业之一。政府直接救济的情况非常少见。更加通行的做法是利用1974年贸易法，加强关税或者配额限制，提高进口品的价格，事实上就是迫使美国消费者为保留不必要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买单。轴承、彩色电视机、超高强钢、铣削和钻孔机床的制造商都争取到了进口保护，以提升其产品的竞争力。<sup>②③</sup>

面对日本的出口繁荣，欧洲选择了一条更加折中的道路，来保护他们岌岌可危的本国工业。欧洲各国政府在要求日本限制录音机、纺织品、汽车、卡车、摩托车、特殊钢、

轴承和电视机出口的同时，还为本国的造船厂、炼钢企业和飞机制造业提供现金补贴。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区域援助”是被允许的，政府的补助流向了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区域，比如意大利南部和与民主德国交界的联邦德国地区。然而制造商的经营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欧洲政府有魄力下令关闭主要工业园区，以消除过剩的产能。

1977年，艾蒂安·戴维侬，前比利时外交部官员，当时是欧洲工业与能源事务专员。戴维侬相信，钢铁和化学等重工业的问题，自由市场无法给出答案。他害怕个别欧洲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重工业而提高对邻国的贸易壁垒，无视9个成员国间的自由贸易承诺。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欧洲共同体，其初衷就是重建煤炭和钢铁工业。戴维侬担心，一旦上述情况出现，欧共体将会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sup>②4</sup>

在联邦德国的强烈反对之下，戴维侬坚持推行建立钢铁卡特尔的计划。其核心思想就是，只要各成员国的企业和政府同意关闭落后的工厂或者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钢铁制造商就可以通过内部协商来限制产量并确定价格。为了防止进口的产品打乱上述安排，欧共体就进口限制与日本等国进行协商，获准进口的钢铁仅能以商定的价格出售。戴维侬计划对于欧洲的钢铁消费者来说代价高昂，但他至少在朝着迫使钢铁行业缩减规模的方向上努力。随着旧工厂的倒闭，1978—1981年，欧洲钢铁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五分之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之下，还有更多的就业岗

位流失。类似的“危机卡特尔”在纺织业、化工业和玻璃制造业也出现过，旨在淘汰过剩的产能。1975年，当欧洲的造船业与韩国交手之时，这一新晋的亚洲竞争者得到了政府的高额补贴，欧洲政府的反击策略是为造船厂提供接近成本价二分之一的补贴。尽管如此，10年之内还是有近100家欧洲造船厂倒闭了。<sup>②⑤</sup> 美国和加拿大对于欧洲的现金补贴及“危机卡特尔”政策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仅在汽车行业是个例外。两国在1965年建立了统一汽车市场，总部设在底特律的汽车“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在两国均有生产工厂，而且汽车和零部件可以自由出入两国边境。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还能独占市场——彼时廉价、质量欠佳的日本车仅有学生和年轻人问津，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更好的选择。随着汽车质量的改善，日本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也在稳步提升——尤其是在油价飙升的1973年。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轮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市场对北美生产的大型高耗油汽车的需求骤减，而体型小、省油的日本车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1979年，克莱斯勒，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中规模最小的一家，濒临破产。它质量低劣的口碑让买家却步，而且它的生产线中没有一款是当时需求最旺盛的小型汽车。该公司和汽车工人工会向华盛顿求助，声称克莱斯勒的倒闭将造成生产线和部件厂的20万工人失业。经过激烈的争论，国会同意为一笔15亿美元的贷款提供联邦担保，来维持公司的资金运转。<sup>②⑥</sup>

这笔贷款避免了克莱斯勒立即倒闭的命运，但是解决不了该行业面临的更大问题。1980年可能是美国汽车制造史上最为困顿的一年，汽车工人工会和福特公司依据1974年贸易法提起申诉，声称日本进口品对美国汽车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要求对其进行制裁。国际贸易委员会驳回了这项请求，认定贷款利率过高和美国企业缺少小型车辆的生产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来自日本的进口。但是，随着美国国内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生产商在1980年的危机中裁员了近30万人，汽车产量也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了1980年11月前夕，对政府介入的呼声已经相当高昂，不容忽视。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对峙中，卡特总统，虽然曾公开反对就进口车辆制裁日本，此时却改变了立场。他的竞争对手，罗纳德·里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却对一名底特律的克莱斯勒工厂工人说，汽车行业的情况特殊、不能一概而论。里根认为，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要说服日本，让他们明白，为了日本自己的利益，也要放缓向美国出口车辆的节奏，直到我们的汽车工业恢复元气”。<sup>②⑦</sup>

面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威胁，日本通商产业省在1981年5月1日宣布了向美国出口车辆的“自愿限制”，此时距里根宣誓就职还不到3个月。日本承诺，在接下来的3个财务年度中，他们不会向美国出口超过168万辆汽车。1个月后，日本政府“预测”当年对加拿大的汽车出口量将会比上一年度下降5.8%，要求各汽车制造商自行调整出口计划，以便与政府的预测保持一致。所谓的“自愿”限制还会持续好几个年头，而北美消费者为此支付了高昂的代价。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测算



显示，1984年间，日本的出口限制为美国提供了44,100个工作机会，但汽车买主却因为高价而多支付了85亿美元，平均每增加1个工作机会的成本是19.3万美元——大约是美国汽车工人平均工资的6倍。在加拿大，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继续给每个被裁员的工人发放工资都会比现在的办法便宜得多。<sup>②8</sup>

日本的情况要好很多。得益于“自愿”出口限制，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得以用更高的价格卖更少的车。整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共计从美国和加拿大收割了大约70亿美元的利润。除了在北美兴建整车装配厂之外，日本公司还将这些利润投入到开发高端车型上——既然他们能向美国出口的汽车数量是有限的，合乎理性的做法就是尽可能销售最有利可图的那种。制铝、化工和钢铁制造业中被裁员的工人，在汽车行业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缓解了艰难的产业转型之痛。<sup>②9</sup>

在1973年之后的10年，以帮助工人阶级为名，保全本国陷入困境的行业成了各工业国的一项重要事业。打着醒目的“结构调整”的大旗，盈利微薄的制造商直接接受的国家津贴就高达数十亿美元。借助政府限制竞争的政策，比如限制进口和合法组成卡特尔，制造商通过提高价格赚取的利润更是超过百亿。但是国家付出的真正代价，远远不止高价的商品和财政补贴。在全球经济受到低生产率增长困扰的时期，多数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有组织地辅助了毫无增长潜能的夕阳产业，而不是更有活力、更具创新性的新兴产业。其最终结果就是加剧了生产率的衰退，而非终结这一现象。

这一点在钢铁行业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扶持自己的钢铁行业，即便不是处于经济目的，为了国家荣誉也会这样做。钢铁行业往往能够提供制造业中最具优势的薪资，而且还有强大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通过购买储备钢的方式，政府保全了一定数量的钢铁行业工作岗位。这些成本中一部分由纳税人承担，还有一部分由以钢铁为原材料的行业负担，这些企业不得不比他们的境外竞争者花更多钱购买钢材，负担更高工资的能力也因此降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本难以计算，那就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世纪70年代，钢铁业已经沦为最不具创新意识的制造类行业。美国的数据显示，金属制造企业，主要就是钢铁厂，研发投入与销售投入的比例在制造业大类中是最低的，而且专利的数量也远远低于其他制造类行业。他们的设备陈旧，往往无法与最新的技术进步相匹配。到了80年代中期，很多被政府以高昂的代价保全下来的钢铁厂，被采用新方法炼钢和铸造的工厂所取代，最终也没能逃脱倒闭的命运。如果政府没有插手对旧式制钢企业补贴和保护，这些新技术可能会发展得更快。<sup>③⑩</sup>

与钢铁业类似，政府在危机的年月中对纺织业也偏袒有加。20世纪70年代，很多国家的服装制造工人数量比其他任何行业都高。但是自动化的缺位——衬衫和长裤都是由教育程度很低的工人在缝纫机前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可以轻易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因为他们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放弃了让本国公民享受平价服装的便利，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在1973年签署了

一项国际条约，允许使用关税和进口配额控制纺织品贸易。

《多种纤维协议》及其后续方案详细规定了一国可以向另一国出口的胸衣和羊毛衫的数量。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该协议将富裕国家低效率的服装生产业延续了近30年，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推迟了资本和劳动力向那些它或他们能够贡献更多经济增长的产业转移的步伐。

尽管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黄金时代的终结实际上开启了一场全面的经济转型，20世纪以来就是经济明星的大规模工业园区，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组织分散的小型工厂网络的制造商，他们的生产链条由全球化的供应链衔接，雇用的工人也少而精。每个人都能进入工厂拿高工资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于新经济来说，真正的价值是创新、设计和市场营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将原材料转化成制成品的物理过程。20世纪70年代晚期，日本和韩国还是新兴的工业强国，但是用不了几年，他们的制造业也开始了大面积裁员。急于完成国家复兴伟业的政府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工业经济已经被信息经济逐步取代，无论何种力度的政府补贴都无法逆转这一进程。

---

① Yoshikuni Igarashi, *Narratives of War in Postwar Japanese Culture, 1945-19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1. See also Jayson Makoto Chun, *A Nation of a Hundred Million Idiots: A Social History of Japanese Television, 1953-1973*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91. Photos of panic buying from *Asahi Shimbun*, November 1, 1973, at <http://ajw.asa>

hi.com/reliving\_the\_past/leaf/AJ2011110116049, viewed December 16, 2014.

② Employment data are from US Department of Labor, “Comparative Civilian Labor Force Statistics, 10 Countries, 1960 - 2004,” May 13, 2005. 1960年代, 资本投资占日本经济增长的60%, 参见: Dale Jorgenson, Masahiro Kuroda, “Productiv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60 - 1985,” in Charles R. Hulten, e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50. 对日本生产率增长和每小时实际产出的估算来自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t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Figures in *OECD Historical Statistics* are similar. Kazutoshi Koshiro, “Lifetime Employment in Japan: Three Models of the Concept,” *Monthly Labor Review*, August 1984, 34 - 35. 报告中称, 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大约始于1910年, 但直到1955年以后, 雇主才开始雇用应届毕业生, 并暗中承诺他们可以一直在公司工作到退休。

③ Hugh Patrick, “Prospects for Longer-Ru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 Economic Growth Center, Yale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No. 257, December 1976, 11; Edward F. Denison and William K. Chung, *How Japan's Economy Grew So Fa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52, 54; M. Iyoda,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New York: Springer, 2010), 20. 日本购买外国技术重塑了本国纺织业的相关案例见 Robert M. Uriu, *Troubled Industries: Confronting Economic Change in Jap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1. 关于日本储蓄率的文献有很多, 例如 Fumio Hayashi, “Is Japan's Saving Rate High?” and Lawrence J. Christiano, “Understanding Japan's Saving Rate: The Reconstruction Hypothesis,” both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3, no. 2 (spring 1989), and Charles Yuji Horioka, “Why Is Japan's Saving Rate So High? A Literature Surve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4 (1990): 49 - 92.

④ 关于产能利用率、各工厂规模产量、食品店数量等数据，参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Statistics on Japanese Industries 1973*, 20, 26 - 27, 31, 47 - 49。1970年日本共有3030万个家庭，参见：Statistics Bureau,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Statistical Handbook of Japan 2014*, Table 2.3。各行业的生产率变化数据参见：Dale W. Jorgenson and Koji Nomura, “The Industry Origins of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800, November 2005, Table 19。

⑤ 关于经济规划者的焦虑，参见：Kozo Yamamura, “Joint Research and Antitrust: Japanese vs. American Strategies,” in High Patrick, ed., *Japan'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Lessons and Limitations of Industrial Polic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Business, 1986), 183。Figure on relative labor costs is from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4* (Washington, DC, 1974), 192。

⑥ Ibid.

⑦ Bank of Japan, *Monthly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974, 4; Fox Butterfield, “In Japan, Oil May Expose Ills of Growth,”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1974.

⑧ G. John Ikenberry, “The Irony of State Strength;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Oil Shocks in the 1970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1986): 113 - 116.

⑨ Marc Levinson,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6 - 188。日本在1968年年底的贸易逆差为1600万美元，1969年顺差近10亿美元，参见：Ministry of Finance, Customs and Tariff Bureau,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uii/html/nenbet\\_e.htm](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uii/html/nenbet_e.htm)。

⑩ I.M.Destler, Haruhiro Fukui, and Hideo Sato, *The Textile Wrangle: Conflict i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69 - 197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66;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336. The Japan - U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as signed January 3, 1972; see "Agreement on Wool and Man-made Fibers,"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vol. 23, part 3 (Washington, DC, 1972), 3167.

⑪ Japan Industrial Structure Council, *Japan in World Economy* (Tokyo, 1972), 48 - 50.

⑫ Nakamura,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224; Konosuke Odaka, "Are We at the Verge of a Stagnant Society?" in Hisao Kanamori, ed., "Recent Developments of Japanese Economy and Its Differences from Western Advanced Economies," center paper 29, Japa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1976, 33.

⑬ Chiaki Moriguchi and Horishi Ono, "Japanese Lifetime Employment: A Century's Perspective," in Magnus Blomstrom and Sumner La Croix, ed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apan: Why It Happens and Why It Doesn't* (London: Routledge, 2006), 152 - 176; Uriu, *Troubled Industries*, 191 - 209.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accounted for Japan's economic output in 1975; its share slid to 0.2 percent by 1986. See OECD Council Working Party on Shipbuilding, "Peer Review of Japanese Government Support Measures to the Shipbuilding Sector," C/WP6 (2012) 26, 7.

⑭ Yoshimitsu Imuta, "Transition to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in Mikiyo Sumiya, ed., *A History of Japanese Trade and Indust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28; Sueo Sekiguchi, "Japan: A Plethora of Programs," in Hugh Patrick, ed., *Pacific Basin Industries in Distr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437.

⑮ William Diebold Jr., *Industrial Policy as an International Issu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162; Jap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Motor Vehicle Statistics of Japan 2014*, 16, 32.

⑩ Imuta, “Transition to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527. Data on Japanese R&D spending are from Steven Englander and Axel Mittelstad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acroeconomic and Structural Aspects of the Slowdown,” *OECD Economic Survey* 10 (1988): 36.

⑪ Dale W. Jorgenson and Masahiro Kuroda, “Productiv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60–1985,” in Hulten, e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45.

⑫ Ibid., 592–593. The term “deindustrialization” was popularized by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⑬ James Chan Lee and Helen Sutch, “Profits and Rates of Return in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20, 1985.

⑭ Se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Bolts, Nuts, and Screws of Iron and Steel* (Washington, DC, 1975).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的支持者都没有将提高生产率作为其目的，例如：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Prepared Statements of Administration Witnesses,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at Public Hearings Beginning on May 9, 1973* (Washington, DC: GPO, 1973)。

⑮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Bolts, Nuts, and Large Screws of Iron and Steel* (Washington, DC, 1977); Jimmy Carter, “American Bolt, Nut, and Large Screw Industry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 February 10, 1978.

⑯ Jimmy Carter, “American Bolt, Nut, and Large Screw Industry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 December 22, 1978; “Proclamation 4632—Temporary Duty Increase on the Importation i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Certain Bolts, Nuts, and Screws of Iron or Steel,” January 4, 1979;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An Economic Assess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Fastener Industry (1979 to 1986),” March 1987;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Howard Rosen, *Trade Policy for Troubled Industri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6), 20.

②③ Ibid., 23. 关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特殊贸易保护”对制造业部门的影响，胡夫鲍尔和罗森找到了23个例子，这还没有算上那些遭遇进口产品补贴或在美国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的行业。See also W. Carl Biven, *Jimmy Carter’s Economy: Policy in an Age of Limit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228 – 234.

②④ See Etienne Davignon, interview with Etienne Deschamps, Brussels, January 14, 2008, Centre virtuel de la connaissance sur l’Europe, at [www.cvce.eu](http://www.cvce.eu).

②⑤ See Laurent Warlouzet, “The Golden Age of EEC Industrial Policy: Managing the Decline of Steel from 1977 to 1984,” and Christian Marx, “A European Structural Crisis Cartel as a Solution to Structural Depression?,” both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The Practices of Structural Policy in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 Since the 1960s,” Zentrum für Zeitgeschichte, Potsdam, May 28 – 29, 2015; Gotz Albert, *Wettbewerbsfähigkeit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chiffbauindustrie 1945 – 1990* (Frankfurt am Main: P. Lang, 1998), 200 – 201; Lars C. Bruno and Stig Tenold, “The Basis for South Korea’s Ascent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Mariner’s Mirror* 97 (2011): 201 – 217.

②⑥ Jimmy Carter, “Remarks on Signing into Law H. R. 5680, the Chrysler Corporation Loan Guarantee Act of 1979,” January 7, 1980. For detail on the Canadian auto industry during this period, see Michel Cote, “The Canadian Auto Industry, 1978 – 1986,” *Perspectives on Labor and Income* 1 (Autumn 1989).



②⑦ Stephen D. Cohen, “The Route to Japan’s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on Automobiles,” working paper no. 2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97;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Includ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Japanese 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 1985), 4–11. The Reagan quote appeared in Richard J. Cattani, “Carter, Reagan Cast for Votes Among Blacks, Auto Worker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3, 1980.

②⑧ Shailendra J. Anjaria, Naheed Kirmani, and Arne B. Petersen, *Trade Policy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casional paper no. 38 (Washington, DC, 1985), 47. 国际贸易委员会估计, 1984年日本在美国销售的汽车比没有限制措施的情况下少了100万辆, 但每卖出一辆车, 平均多得17%的利润——美国消费者向日本转移了33亿美元。该委员会估计, 由于日本制造的汽车价格较高, 国内汽车制造商从价格上涨中额外获得了52亿美元。1984年上半年, 汽车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15.33美元, 即每年约3.2万美元。See *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10, 41. 1985年, 加拿大每个工作岗位的成本估计从20万加元到100多万加元不等, 相当于14.5~73万美元。See Margaret Kelly, Naheed Kirmani, Clemens Boonekamp, Miranda Xafa, and Peter Winglee,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casional paper no. 63 (Washington, DC, 1988), 79.

②⑨ Ibid., 41. 作者估计, 1981年至1984年, 日本制造商从对美出口中增加的收入为61亿美元。由于这一收入是通过生产和销售较少的汽车获得的, 因此利润率的增长肯定更大。由于对加拿大的出口受到限制, 日本制造商获得了更高的利润。

③⑩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 1994* (Washington, DC, 1995), Table 3; Zvi Griliches, Ariel Pakes, and Bronwyn H. Hall, “The Value of Patents as Indicators of Inventive Activity,” working paper no. 208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6, Table 2. 在20世纪70年

代中期，初级金属行业的设备平均年龄为10年，1985年达到11.8年。Allan Collard-Wexler and Jan De Loecker, “Reallocation and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the U.S. Steel Industry,” NBER working paper 18739, January 2013. 作者指出，在引入电弧炉后，该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来自停用老旧设施。

## 第9章 美梦告终

经济上，工业的困境是一种挑战；心理上，则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1973年年末萧条的景象初现之时，发达国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非政府工作岗位都是制造业提供的。很多其他类型的工作，从货运卡车司机到工厂附近酒吧的服务员，再到拿津贴的退休人员，虽然不直接从工厂领取工资，但是生计却全赖制造业的发展。战后的工业扩张让广大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而且受到福利政策的鼓舞，在经济上的安全感也是空前的。然而随着收入丰厚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工人们发现自己开始原地踏步，要尽极大努力才能维持前25年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工作进取心。福利国家确有优势，但其加之于社会成员的负担也愈趋明显。政府无法保证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开始积累，为严峻的政治后果埋下了隐患。

为什么，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呢？目前的最佳答案，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

蒙·库兹涅茨给出的，该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精英人士。他的理论将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了一起，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学习统计学，1922年出逃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比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早一年拿到硕士学位，并与伯恩斯一道成了经济周期学家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的门生。1927年，库兹涅茨取得博士学位，加入了国家经济研究局（该机构很快将由伯恩斯领导），并且发展出了很多统计学概念，至今仍用于国民收入和生产率的统计。库兹涅茨是当之无愧的国民生产总值之父，这个概念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都被用于比较经济体的规模和增长能力。不过，与大多数使用该数据的政客不同，库兹涅茨强调，体现公民生活水平的很多方面都无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反映出来。正如他在1934年对国会所说：“一国的福祉很难通过关于国民收入的指标来衡量。”<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兹涅茨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4个国家收集数据之后，他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可能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

库兹涅茨坚信，那些经济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处于前列的国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增长。第一阶段，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大批的佃农与手工业者流离失所。他们的技能在贬值，收入也随之下降，而掌握资本的人

则通过投资工业大赚特赚。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时代，当时，号称“机器破坏者”的团伙到处损毁蒸汽织布机，因为他们认为机器是导致下层民众贫困潦倒的根源，而政府在背后支持部分厂商垄断经营，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让工厂主们牟取暴利。于是，成千上万的工人陷入赤贫，社会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库兹涅茨认为，鉴于农民被赶离家园、工匠被迫失业的现象越来越少，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然而，在发展的第二阶段，工资水平仍然相当低下，因为城市中聚集着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待业工人，工厂招工毫无困难，没有提升工资的必要。政府对失业者和伤残人士的救助全然缺位，劳动者找工作时无法进行挑选，在工资谈判中处于绝对劣势。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眼中的19世纪中期，一小撮资本家剥削贫困潦倒的工人阶级，而劳动者完全看不到改善现状的希望。

马克思对他所处时代的解读是正确的，库兹涅茨说，他错在将其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永久性特点。随着经济迈向第三个发展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出生率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家庭收入中有更高的比重投入到了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中。出生在城市的新工人阶级，大多数接受过学校教育，掌握了适应现代经济的各项技能，取代了上一辈半文盲式的工业移民。他们也更加善于运用政治影响力，能够推动立法，建立保护低收入水平家庭的社会机制。因此，库兹涅茨得出结论，当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收入不公平的现象

就会逐渐消失。这一过程自19世纪末的英国开启，美国和德国在一战时期也相继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跨入了上述进程。<sup>②</sup>

按照库兹涅茨的理论，收入差距呈倒U形曲线分布，开始时两极分化愈发严重，但最终差距会慢慢缩小。这一观点对于黄金时代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是一种安慰。所有人都知道，政府指导是为了缓和经济周期，保证经济以前所未见的水平稳定增长，同时把失业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现在库兹涅茨似乎在暗示，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至少在工业国家就是如此。随着收入的增长，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普通人也可以和富人一样积累财富。在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缩小。这是一幅诱人的愿景。

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评估，从来就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收入”可以通过很多角度进行解读：一些学者着重研究工人税前时薪的变化，其他学者则更关注家庭而不是个人，而且会同时统计投资收入而不仅仅是工资——两者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大相径庭。衡量某个国家公民的收入差距，同样有很多不同的路径。较为常见的方式是统计中产阶级在人口中比重的变化，但是对比长期失业者和处于前1%水平的富豪的收入，可能会得到一些不同的视角。短期趋势与长期趋势也有所不同：股市的低迷可能意味着富人在一两年内销售股权的资本收入会降低；但是只要股市出现转机，情况就会立刻得到逆转。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收入水平并不能展示财富分

配的全貌。绝大多数家庭都有收入来源，拥有不动产、股票、债券和企业的比重则小得多。

无论用何种方式衡量，没有争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中经济资源的分配远比战前要均衡得多。对12个具有现成数据的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其中有11个国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收入前1%的富豪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远低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水平。1962年，九分之一的联邦德国家庭依赖不到人均工资一半的收入勉强生存，到了1973年，这个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已经不到总家庭数的十六分之一。20世纪40年代末，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收入低于官方确定的贫困线，及至1973年，排除通胀因素，平均工资仍达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此时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只占九分之一了。仅在瑞士这一个国家，最低收入阶层没能缩短与金字塔顶层人士的距离。<sup>③</sup>

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购置房产和进行储蓄，所以，在黄金时代，财产的分布也比以前更加分散。1939年，荷兰前1%的富裕家庭集聚的财富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但是到了1973年，这一比重下降到了四分之一。1948年，挪威前1%的富人拥有全国34%的财产，但在1973年只剩下了22%。研究20世纪60年代法国和美国的遗嘱信息可以看出，普通百姓掌握的财产占总量的比重远远高于战前。鉴于财产可以滋生利息、分红和租金，财产分布得越分散，对于收入公平也就越为有利。

公平问题得到改善并不是一项奇迹。很多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提高了所得税最高税率，扩大的税收用于弥补战争支出。某些国家在战后仍然维持了这项政策，对于高收入人群，所得税有时会占到全部收入的80%。高昂的遗产税使得将巨额财产留给下一代相当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财产的分布变得更加均匀。在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例证，馆中展示的很多艺术品都是为了冲抵遗产税而上交给法国政府的。英国国民信托（British National Trust）经营的文物级乡村宅邸，很多都是由世代居住在这些豪宅里的主人捐献的，因为家主去世后，子孙无力承担巨额的房地产遗产税。

工会的力量是帮助普通工人提高待遇的另一个因素。战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赋予了工会极大的权限，或者是为了提升国家凝聚力，又或者是战败后在同盟国的要求下行事，比如联邦德国和日本。制造业的繁荣对于工会实力的上升贡献重大。在战后世界中，很多新的工作机会都来自制造业。仅以日本为例，1950年，每5个工人中就有1个从事制造业，到了1970年，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每3个中就有1个。与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相比，制造业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要高得多，因此，制造业的发展为工会提供了日益壮大的潜在队伍。在几乎任何类型的工厂做工都比干农活回报率要高，服务业、小时工以及其他对于教育水平和专业培训没有过高要求的工作，在薪资上也都无法与制造业相匹敌。所以，制造业的增长自然让相当高比例的劳动力都得到了提高收入的机会。



强大的工会并非一定能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化，因为与工会签约的工人往往绝不是底层中的底层。然而，在战后世界中，工会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与个别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协商工资。他们成了政治谈判桌上的常客，大力倡导提高最低工资，建立失业救济、带薪病假、年假和养老金制度。在有些国家，工会在支持女性同工同酬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随着大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双职工家庭的收入也相应上涨。有时，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甚至会与行业组织的首领和政府高官谈判，确定国民收入中多大的比例应当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又有多大比例应当作为企业利润，以此限制大公司股东和小企业主的收益，进一步抚平收入分配的差异。<sup>④</sup>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指出的，战后世界收入更均等的最关键原因并非是经济政策，而是由战争造成的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巨量的资本：大量住宅、商店、办公楼和工厂被夷为平地，其中的生产设备和家具财物也随之化为乌有。即便是财产没有被破坏或充公的企业，也受物价管控、原材料短缺和消费能力下降等原因的影响，经营出现了极大困难。那些人间蒸发的财物属于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战争对资本的破坏起到了均衡财富分配的效果。而且，鉴于大部分财富都被用于滋生利息、分红和租金，资产的灭失对于拉低收入差距也有作用。贫富差距之所以会缩小，不仅仅是因为穷人的境遇在改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富人在一小段时期内遭遇了劫难。<sup>⑤</sup>

向平等社会迈进的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逆转，此时工资上涨遭遇了瓶颈。这一现象在各国出现的时间不同，上层人士生活优于普通百姓和贫困家庭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制定了提升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的政策：或是资助需要抚养子女的家庭，或是鼓励银行扩大对买房者和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不容置疑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拥有高收入和大笔投资收益的人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而大多数工薪阶层疲于奔命，艰难地维持着现有的生活水平。

正是在美国最先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苗头。在1974年残酷的大萧条期间，收入中位数的增长率比通货膨胀率还要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女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恢复到了衰退前的水平，但是男性的收入却始终没能重振。40多年过去了，在美国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水平的男性员工数量，在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仍然赶不上1973年的水平。收入水平排在后面五分之三的家庭，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开始下滑，前五分之一的家庭所占比重则节节攀升。而且收入水平越高，收入的增长也就越迅速。1973年，前1%的家庭收入占有所有家庭收入的7.4%。等到了20世纪末，这个比重翻了一倍。<sup>⑥</sup>

英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普通工薪家庭的购买力在1974—1979年持续下降。收入差距即使没有马上扩大，也只是因为工党政府的反通胀政策严厉压制对高收入者的加薪。工资高于特定数额的人员被设置了收入上限，有些时候，高薪人

士直接被明令禁止加薪。结果当然是收入变得更加平等了，但是限制政策一经撤销，马上就出现了强力反弹。1977年，经理人和专业人士的收入大涨，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尽管高津贴和其他社会福利提高了某些特定群体的收入，比如退休人员 and 单亲家庭，20世纪80年代的收入分配仍然日渐扭曲，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收入的不平等愈演愈烈。<sup>⑦</sup>

在其他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没有那么悬殊，主要就是政府介入的作用。比如加拿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工资不平等加剧，但是收入的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这得益于政府向低收入劳动者提供的津贴。直到80年代，高薪群体才开始在收入上与普通百姓拉开距离。在日本，贯穿整个70年代，收入平等化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情况在1981年左右发生了变化，收入的差距开始稳步扩大，到了2005年，甚至有人称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最高”。瑞典一向被认为坚守了社会民主与平等的堡垒，也在1981年前后经历了收入水平的分化，西班牙和瑞士也是如此。国际上的少数几个异类之一是法国，在整个七八十年代都激进地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缩减收入差距，而且一直把这种状态保持到了21世纪。

如果发生在其他时期，贫富分化可能都不会是什么严峻的事。毕竟，无论哪朝哪代，总有人比其他人要过得好。但是在七八十年代，芸芸大众和高收入者间的差距在扩大，与此同时，全球的工资增长却在减缓。工资增长放缓的精确比例很难确定，因为在70年代，大多数国家仅收集制造业部门

的工资数据。在制造业上，史料是一清二楚的。从18个欧洲、北美和太平洋地区的富裕国家得来的信息显示，1974年之后，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上述国家中的每一个都见证了工资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工人们眼看着自己与高薪的邻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崩塌。<sup>⑧</sup>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黄金时代的好日子急转直下？对于工资增长放缓和收入差距扩大，最常听到的解释都与政治决策相关——这个国家没能成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那个国家法规过于严格，不利于刺激就业，国际贸易协定让发达国家的工人面对低工资国家更不具有竞争力，法律允许企业老板在给自己定薪水时既不考虑工人工资也不考查个人表现。类似的结论层出不穷，而且似乎难以避免：人们往往会将他们亲身经历的问题归结成一个看似熟悉和明显的原因，尤其是在专家和政客相互指责的时候。

然而单纯用国内方面的因素进行解读是不够的。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都有所不同，但工资增长速度降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却是全球性的，所有富裕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对于这种全球性趋势的解释也应该是全球化的。最有可能的答案隐藏在一个新闻报道中鲜有提及的经济指标当中，这个指标的逐年波动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其长远变动方向却对世界局势有着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称其为“劳动收入份额”（labor share）。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支付给在职工人的工资收入，除以在职工人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用于支付工资的比重，而不是支付给资本所有者的分红或者利润，也不是政府提留的税收。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对于工人收入的精准测算，因为很多工人也有资本收入；小企业的所有者可能每周仅领取少量工资，他还能分享公司的利润，如果有的话。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资本收入往往很低——储蓄账户上得来的几块钱利息、员工股份的些许分红。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于研究工人相较于资本所有者的整体收入情况，是有所帮助的。

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滑，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某个国家，而是遍布了世界各地。下降的趋势起于1974年的美国和联邦德国，一年以后传到了日本和英国。1976年出现在澳大利亚，1978年到加拿大，1980年前后到了意大利和荷兰。到了90年代初，就连芬兰和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变化。在46个具备至少15年可信经济数据的国家中，37个在1975年之后表现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显著统计趋势。根据一项测算，1977年到2012年间，工资在总收入分配中占据的份额降低了5%。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1989年德国重新统一、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以及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之前，这一趋势就已经显现。<sup>⑨</sup>

单独来看，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变穷了，而且也不必然反映出雇主确定工资的方式发生了任何改

变。如果一个经济体发展得足够迅速，即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每个人的收入也还是会持续提高。但假如在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同时，劳动收入份额继续缩水，那么可能很多人都会分配到更小的比例。工人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就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取得收入的比重在相应地增长，而这些人原本就属于高收入人群。所以，尽管理论上劳动收入份额下滑并不一定造成经济不平等，但在实践中，却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感觉，那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人愈发地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而芸芸大众则是江河日下。<sup>⑩</sup>

关于这场全球范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经济学家能够给出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革新减少很多工作需要的人工数量，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失业率有着直接的责任。除此之外，技术的发展在某些行业创造了全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从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过去，钢铁企业很少面临竞争，因为建设新的炼钢厂需要数十亿美金的初期投入，而电弧炉的发明大大降低了新晋者购置基础设备的成本。在远离城郊牧场的地方进行牛肉切割包装的新方法，打破了几家大型肉联厂在美国的长期统治——尤其是价格方面的垄断。竞争的压力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工会和员工争取高工资也更加困难。

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经济对于工人技能组合的需求。自动化导致技能和手艺贬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议价能力也相应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电信工人的罢工就意味着电话无法接通，使用者的日常

生活将受到影响。而到了80年代，大多数的电话用户都不会对电信工人的罢工有所察觉，因为他们接受的服务并未受到影响。当工厂工人要求加薪时，制造商可以威胁将生产部门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因为现在这样做，不必担心产品质量下降，产品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随着谈判的筹码向雇主一方倾斜，工会发现，争取更好的待遇和保障就业一样越来越难，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是，工人能够通过学习掌握重塑其工作方式的新技术。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工人将在领取一笔提前退休金后被迫离职——在信息时代，他们的技术再也无法赚到令人满意的薪酬。

尽管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浮夸地宣称长期的稳定繁荣已经到来，然而他们此时却无法对那些生存状态每况愈下的人们做出有意义的回应。政客能够提供的也无非是些老生常谈，比如在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性。而社会公众已经习惯于相信政府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经济保障，此时看着政客一筹莫展的倒霉模样，压抑的怒火就开始爆发了——主要表现为对福利国家高税收政策的反感和厌恶。

福利国家的概念，以及与之相生的对于政府社会角色的新理解，诞生于战争的深渊之中。政府应当提供某些保障的观念并不新颖：早在1883年，德国就颁发了疾病保障法，而瑞典的残疾人保障计划则可以追溯到1901年。然而，这些政策往往只考虑到了城市的产业工人，其他人能够得到的帮助

非常有限。比如，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失业保障体制，直到1950年才只能覆盖70%的工薪阶层，其他人仍然暴露于失业风险之中。美国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在1937年启动之时是不包括农民、家政服务员和个体经营者的。有限的覆盖范围及优越的人口结构，使得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类似的保障。1940年，第一张社保支票寄出之时，350万名退休者的保障收入是由3500万工人及其雇主缴纳的税金支撑的，税率仅为全部收入的1%。对于一名普通的美国制造业工人来说，如果年收入为1200美金，每年的纳税压力也只有12美金。<sup>⑪</sup>

福利国家的根本目标是广泛推行这些保障。1945年，英国和加拿大开始发放儿童津贴，一年之后，法国也借鉴采纳了这一政策，此时津贴的额度依儿童的人数而定，并不考虑家庭的收入情况。这些为了保障城市工人而设计的政策，能让农民群体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在农民的压力之下，四个北欧国家政府承诺将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障推广到全民受益，包括农民和个体经营者。

有了中产阶级的坚定支持，扩充社会保障的一揽子计划就在政治上势不可挡。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名保守的共和党员，在1956年将社会保障福利金的覆盖范围扩展到了残疾工人。一年之后，由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控制的联邦德国政府将养老金金额提高了60%。在英国保守党当权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福利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陡峭上升。在更加注重平等的战后新世界中，无论是名门望



族还是财富新贵，都不希望被指责为对工人阶级的艰辛无动于衷。<sup>⑫</sup>

贯穿20世纪60年代，繁荣的经济使得政府更愿意慷慨解囊。60年代初，富裕国家之中，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的补贴，比如儿童津贴、养老金、残障及失业补助等，平均要占到国民收入的6.8%。到了70年代初期，该数值已经高达10%。芬兰，北欧国家中的后进分子，也于1963年启动了国家疾病保障计划。一年之后，意大利开始向全体老年人发放养老金，尽管他们并未对社保计划做出任何物质上的贡献。在法国和英国，儿童津贴的增长速度远远把通货膨胀抛在了身后。<sup>⑬</sup>

福利国家的政策并未止步于直接的金钱补贴。1964年1月，约翰·F. 肯尼迪遭到暗杀后不满6周，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就向贫困宣战。国会为此制定了针对穷人的食品援助法案，以及由纳税人资助贫民和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法。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就“逆向所得税”的优缺点展开了辩论，所谓逆向所得税就是最低收入补贴，可以保证每个家庭都能达到基本的收入水平，资金由政府提供，而且没有资格限制。扩建大学和高等院校的花费巨大，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新生被招录进来。日本1950—1975年间的高等教育录取率提高了将近800%，西欧的高中以上教育录取人数则翻了3倍。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的大学院校是国立的，收取的学费很少或者根本不收学费。相比街道清洁工和工厂工人的子女，医生和教师的子女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要容易得多，因

此免费的高等教育又是一项取悦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的补贴政策。

发达经济体中，唯一对福利社会存在抵制的国家就是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的二三十年里，领导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处于重建阶段的贫穷国家，无力支付昂贵的福利政策。尽管出于经济收益的考量，日本愿意在教育领域进行投资，但他们对于在欧洲和北美盛行的政府资助福利项目仍然时刻保持警惕。但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非凡的增长之后，日本的经济规模扩大了3倍，政府难以再用贫穷作为借口。在一片颂扬之声中，日本终于在1973年推行了新的健康、养老和收入补贴政策。日本人将这一年称为“福利社会元年”，此时，日本的未来如此灿烂，在多年的奉献和牺牲之后，公民终于要分享胜利的果实了。<sup>⑭</sup>

所有的福利项目都要花钱。福利国家改变了普通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是政府向公民提供津贴，而且是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里，要求公民以税赋的形式上缴相当大比例的收入。

从历史角度看，很少有人需要直接向国家级政府纳税。在这一方面，美国并非不具有典型意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亚洲爆发，所有联邦级别的赋税加在一起也仅占国民收入的7.6%。大部分的税收都是间接税，也因此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政府以进口税的形式从境外的威士忌和香烟上得来的收入，要远高于直接从工人工资中拿走的部分。联邦政府直接征收的所得税，仅仅占到了全部国民收

入的四十分之一。尽管官方的个人所得税率最高可达到79%，但也只有少数的产业巨头和影视明星受到影响。大约五分之四的美国家庭都不需要向联邦政府支付所得税，因为排除各种免税和抵扣额度之后，他们的收入还达不到2500美金的所得税起征点。<sup>⑮</sup>

大部分其他国家的情况也都类似，直到战争改变了一切。随着政府开始征收各种附加税、超额利润税等，战争时期的赋税压力骤然增加。最为极端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对其占领的国家施加重税以资助战争，并且利用税收体系剥夺犹太人和其他被驱逐者的财产。在同盟国方面，英国的所得税在1937—1943年翻了四倍。所得税起征点被降低，所以等到战争结束之时，大部分工人都要支付所得税；而高收入者面对的最高税率，居然达到了令人咂舌的98%。

战争也让税赋收缴的方式更为激进。“我需要的就是现金，而且是从当前收入中提取的现金。”英国的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在1940年宣称。在只有少数富人需要交纳所得税的时候，他们获准每年或者每半年缴纳一次。但是当数以百万计的中等收入群体被卷入税收体系后，很难想象这些人有充裕的现金每年进行一次大额支付，而且，政府也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来为军队和武器买单。美国最先采取措施，从1943年开始要求雇主从工人工资中直接扣除税金。“我们搞不定那些家伙，除非从源头上直接截流。”一位财政部的官员在请求参议员支持他们提出的立法议案时说。英国人把他们的扣缴方案命名为“付你所得”，似乎每周从工资里扣除所

得税，是在给工人们一个报效国家的良机。然而，不论如何包装，都无法逃避一个现实，那就是每周的工资存根都在提示着税收的陡峭上升。<sup>①⑥</sup>

战争结束之后，所得税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起初大部分工人都不需要交纳或者只需交纳很少一部分。在日本，战前和战时交纳所得税的人数都不足100万；即便美国在1947年强制改革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00万，但是仍然不足日本成年人数的七分之一。尽管在1949年需要交纳所得税的英国工人人数约有1400万，但在10年之前这一数字还只有380万，仍然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收入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1951年，典型的美国家庭交纳的联邦所得税还不到全部收入的3%，而且仍有很多家庭完全不需要交税。在加拿大，“针对个人的直接税收”1950年时仅占人均收入的6.4%，比战时减少了三分之一。1958年改革之后，联邦德国的基础税率虽然高达20%，但是为了保护普通工人而创设的津贴制度，使得大部分人交纳的税款低于全部收入的6%。<sup>①⑦</sup>

向普通工薪阶层收轻税，高收入者收重税，可以保证税后收入更加平均，实现重要的社会目标。但是，一个大多数人不交或者仅交很少的所得税的体制，确实无法满足福利国家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

福利国家体制可以说是一项丰功伟绩。它给数百万名退休津贴的领取者提供了尊严，使其无须在老年之时面对赤贫。伤残保险保护了劳动者的家庭，避免在工人遭遇工伤后全家陷入贫困，而医疗保险确保了即便是最贫困家庭的孩子

也能及时就医。失业保险则减轻了经济萧条造成的阵痛，不仅有利于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对这些人光顾的生意和购买商品的生产厂家也有裨益。经济学家将社会保障体制称为“自动稳定器”，此言非虚，因为正是这些保障措施使得消费者在艰难的时事中仍有基础的消费能力。<sup>⑮</sup>

但是，政府推行慈善并非没有成本。尽管工资水平、商业利润和消费能力在迅速提高，福利国家的支出增长的速度更快。纵观各发达经济体，从1960年到1974年，单单扶贫项目支出就提高了150%，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在24个发达国家中，仅有芬兰这个半岛小国1974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于1960年。随着社会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工人收入的增速，福利国家体制在被看作一项优势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负担。<sup>⑯</sup>

把许多其他事情联系起来看，1973年这个关键的年份对于福利国家来说也是个转折点。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商业利润出现暴跌，导致工人工资的增速开始下降。然而福利国家体制的发展却没有一并放缓。恰恰相反，数百万名在经济下滑过程中失业的工人，排着长队领取政府提供的津贴。还有几百万人认为自己的年纪太大，已经不适合再就业了，开始提前领取养老金。到了1980年，西欧的大部分女性在60岁之前停止工作；男性则是63岁。那些基于收入水平的福利支出，比如住房补助和食品津贴，也相应上升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符合了申请的条件。比如说，美国政府的食品券计

划从1974年到1976年耗资几乎翻倍，原因就是受益人的数量增加了近50%。<sup>②0</sup>

社会保障体系肩负了重任。在经济困顿的艰难时刻，它保护家庭免遭失业危机的蹂躏，抚平全球衰退的影响，这也是此项制度建立的初衷。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保体制用税收和强制扣款抽取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并且通过只有最专业的政策研究人员才能弄懂的公式重新分配到各个领域。仅举一例，20世纪70年代的前5年里，联邦德国的政府支出提升了93%，而经济增长仅有52%。在西欧，到了70年代末，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包括一些医疗项目和高等教育——相当于经济总量的近六分之一。<sup>②1</sup>

除了减少福利之外，唯一保持收支均衡的方法就是加税或者举债，而减少福利无论在哪个国家都相当于政治自杀。1965年，24个发达国家的税收平均占国民收入的24.8%。1973年，随着福利国家体制的发展，平均税收达到了国民收入的28%。到了1977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31%——在十几年的时间跨度里，它的增速已经相当惊人。税收上涨的规律出现在了每个发达经济体中，无一例外。最极端的例子是瑞典，在12年里，税收的比重上涨了13%，等到1977年，国民收入中的每个瑞典克朗都有45%被划为税收。<sup>②2</sup>

通货膨胀就是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按梯度征收的，收入所处的梯度越高，相应的所得税税率也越高。在澳大利亚，高过起征点第一梯度的收入只需承担8%的温和税率，但超过第27级梯度的

收入则要面临高达66%的税率。在意大利，1~32级税收梯度的税率从10%一直提高到72%；在日本，低收入者只需按10%的比率交税，而高收入者可能要对收入的最高部分交75%的所得税。通常而言，这些税收起征和梯度金额是不随通货膨胀变化的，也就是说，假如一名工人年收入的提高仅仅是与物价指数的上涨一致，但是多赚回来的里拉、日元或美金，需要交纳的所得税要高于前一年的水平——排除通胀因素后，此人拿回家的实得工资要低于原有水平。因此，尽管名义工资每年都在上升，很多家庭还是感到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现在处于更高的所得税征收梯度。<sup>②③</sup>

因此，在通货膨胀高歌猛进的十年，税收着实让人烦恼，而且也更具争议。即便收入增长已经跟不上通胀的步伐，政府还能稳稳收取家庭收入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工厂工人和街道清洁工感受到的税收压力并不亚于他们的老板。1969年，联邦德国的普通工人家庭每多赚一马克只需支付19芬尼的所得税——也就是说，边际税率为19%。但是到了1978年，边际税率几乎翻了一倍。英国家庭中除了最为富裕的一批，1979年支付的所得税占收入的比重比1969年多了10%。记者彼得·詹金斯的测算结果是，有两个孩子的英国家庭，收入为行业平均工资，1976年需要缴纳的税金占全部收入的26%，在四年内上涨了7%。加拿大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8年到1985年，普通加拿大公民的所得税税率居然提高了20%。<sup>②④</sup>

同样重要的是，至少从政治的角度上看，高税收直接给个人收入带来了沉重负担。在早些年，为福利国家买单的主

要是企业，方式是交纳营业税或为员工交纳社会保险。当然，企业最终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股东或者员工，但是对于员工来说，他们增加的成本是隐形的。而且，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源于对消费征税（如营业税），或是对资产和财富征税（如遗产税），这部分税收的占比在1970年高达43%。纵观各发达经济体，收入税和社会保障费用在1970年占政府收入的34%，在1975年占38%，而到了1980年，占比就几乎高达40%了。福利国家的成本迅速转嫁到了收入税的身上，这些钱直接来自工人的腰包，他们眼看着工资中越来越大的比重被扣掉。工薪阶层抱怨负担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sup>②5</sup>

然而，即便普通公民交纳税金占工资总额的比重每年都在提高，政府也还是做不到收支相抵。为了兑现社会福利的承诺，政府大量举债，巨额财政赤字成了常态。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世纪60年代还无足轻重，及至70年代却翻了三番，这还是在国防开支大幅削减的情况下。1973年之前，日本政府的支出还大抵与收入相等，但此后大面积财政赤字变得司空见惯。联邦德国在1973年前财政赤字尚且有限，之后也是大幅提升。<sup>②6</sup>

在富裕国家中，政府财政状况的巨大变化可以通过政府债务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反映出来。从1946年到1974年，该比例始终在下降，因为各国都在偿还二战期间借下的债务，并且避免举借新债。从1975年开始，平均债务率开始上升，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就在政府债台高筑的70年代下



半叶中，利率开始大幅飙升，致使政府预算的相当比重用于支付利息。这些利息的账单也进入了工薪阶层的视野，他们交纳的所得税和社保为政府收入贡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担心，将来他们的孩子还要继续为这些利息买单，而他们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sup>②⑦</sup>

早些年世道更加安定，人们普遍愿意用高税金换取更好的社会福利。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几次反对税收的零星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往往是针对地方政府为建设学校和维护公园而征收的房产税，而非联邦政府用来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贫困和失业补助的收入税。这些抗议活动零零散散分布在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并没产生多大影响。但是进入70年代，随着经济环境的恶化，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脱离了政府的控制，社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此时，政府提高税收以资助福利社会的尝试开始碰壁。大规模的反对税收运动，最初是在富裕且田园牧歌般和谐的丹麦王国中涌现，而这要感谢一位名叫摩根斯·格里斯楚普（Mogens Glistrup）的税务律师。<sup>②⑧</sup>

格里斯楚普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据说是哥本哈根最大的一家，其主营业务就是帮助客户避税，方法是在一些傀儡公司之间搭建贷款链条，利用丹麦允许纳税人从收入税基中扣减利息支出的规定，达到避税的目的。1971年1月30日，44岁的格里斯楚普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大谈特谈税收的问题。手中高举着纳税申报单，上面写着应纳税额为零，他将避税者比作二战时期破坏德国铁路的爱国者。

格里斯楚普的滑稽之举让他一夜成名，而且演变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丹麦政治长期以来由四股势力把控，也就是所谓的“旧”党，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的利益群体，比如说农民和工会。在社会立法方面，四个旧党派几乎都是一致行动，很多立法提案甚至是全票通过的。选民们相当青睐这个承诺打破旧秩序的圈外人。在保守党拒绝提名他为国会议员之后，格里斯楚普利用其炙手可热的名声在1972年组建了进步党。进步党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但是格里斯楚普在吸引公众关注方面确实是个奇才，他发表了很多尖锐的评论，比如说建议解散军队，用一台电话答录机取代国防部，答录机在接通后只会用俄语说“我们投降”。他宣称：“在当前形势下，你在政治领域中能做的最为严肃的事情就是取笑当权派。”<sup>②9</sup>

丹麦成为当代反对税收运动的发源地并非偶然。尽管20世纪60年代是繁荣的十年，丹麦却始终保持着全欧洲最低的经济增长率，进入70年代后也没有任何好转。丹麦的通货膨胀率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而福利国家政策的加强给丹麦人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1965年，丹麦国民收入的29.5%都用于纳税。仅仅6年之后，政府就将全国总收入的40.8%收入囊中。普通家庭真切地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压力，而民众消费的增长率比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低。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担忧加剧了人们的不安。1972年，丹麦以全民公投中高达90%的支持率加入欧洲共同体。过了不到一年，民意调查却显示，至少有一半的丹麦公民对这个决定表示后悔。

尽管格里斯楚普本人并不上镜——“他向来衣着随意，身材胖墩墩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这样汇报——但他吸引选票的魅力丝毫不受影响。格里斯楚普在竞选中呼吁取消收入税，并且承诺在当上总理后，每十分钟就裁撤一个官僚机构，1973年12月，进步党成了议会的第二大党派。丹麦人称之为“地震式选举”，一夜之间就重塑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即便没有政党愿意与进步党组建联合政府，格里斯楚普对当权者的不断攻击还是让他的理念得到了颇多关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民意调查显示，丹麦人对于社会事业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态度愈加负面消极。“丹麦正在从福利国家的阵营中仓皇撤离，或者至少是要远离福利社会所必需的税务负担，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场大撤退。”一位《金融时报》的记者宣称。<sup>③⑩</sup>

在挪威，有一个人堪称与格里斯楚普一时瑜亮。安德斯·兰格（Anders Lange），比格里斯楚普整整年长了一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右翼的祖国联盟关系紧密，但在战争期间强烈反对纳粹统治。战后，他进入一家养狗人俱乐部工作，并且开始出版《爱狗者日报》。最初的时候，这份报纸有关政治的内容无非就是政府对狗主人的征税，但后来涉及的政治话题越来越多。1953年，报纸遭遇经济问题，一名员工携款潜逃，报社也因之倒闭，但是兰格开展了一项副业，专门组织抗议游行来反对社会主义青年运动者的示威活动。当兰格在1960年重新发行报纸之时，对共产主义者、政客和官僚机构的抨击成了家常便饭。两年后，《爱狗者日

报》更名为《安德斯·兰格日报》。视野开阔了之后，报纸很快孕育了一场由不满者组织的政治运动。

挪威的经济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健康，但是兰格对于官僚机制和税收的抱怨还是引发了人们的共鸣。1973年4月，在奥斯陆的一家电影院举行的公共集会中，人们投票支持安德斯·兰格的政党提出的大幅削减税收、关税和政府干预的纲领。一个月后，格里斯楚普亲临奥斯陆以示支持。和格里斯楚普不同，兰格在军事上是强硬的鹰派，但他们都对福利国家制度深表怀疑。兰格自称是美国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支持者，同时也喜欢自由派作家安·兰德。兰格凭借着反对税收的政治纲领，以69岁的高龄在1973年的全国大选中赢得了5%的选票，一路闯进了国民议会。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初期的反对税收运动，很快就跨越北海，得到了微弱的回应。在那里，英国人面对的麻烦主要是针对不动产征收的财产税。在1970—1973年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执政的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连年降低。尽管保守党不想和高税收扯上关系，但是主要由工党控制的大城市地方政府却不愿削减公共服务或者裁员。到了1974年，经济陷入危机，部分纳税人开始拒绝支付地方税，这让保守党看到了政治契机。他们的发言人是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年轻部长。“地方政府开支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撒切尔对坐在广播前的观众说。她承诺，保守党会废止地方税，代之以“你能支付得起的赋税”。<sup>③①</sup>

在丹麦、挪威和英国，福利国家的政治共识已经破裂。尽管一次政府税务调查把格里斯楚普送进了监狱，丹麦进步党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就此沉寂。在1975年1月的大选中，他们只失去了28个议会席位中的4个。进步党的支持者来自各行各业。民意调查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强烈反对这样一个论点：“总的来说，人们可以相信政客能够为国家做出正确的选择。”安德斯·兰格于1974年去世，但是他的政党改组成了进步党，并由一名颇具魅力的年轻商人卡尔·哈根（Carl Hagen）带领，成了挪威政治中一支重要的保守势力，并在2013年最终进入政府。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英国保守势力最终放弃了他们的贵族遗产、他们对于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于英国注定要以低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的确信。他们将会追随玛格丽特·撒切尔向全新的方向前进，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不再事事包揽的小政府。<sup>③②</sup>

---

① *National Income 1929 - 32: Letter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Commerce Transmitting in Response to Senate Resolution No. 220 (72nd Congress) a Report on National Income, 1929 - 1932*, (Washington, DC, 1934), 7. 之前很多年，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规模的适用范围最广的标准。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国内生产总值所取代，国内生产总值是一种不包括外国来源的净收入的衡量标准。

②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955): 1 - 28. 库兹涅茨承认，他的研究对象是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经济，所以“不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可能有所不同。

③ 本段有关收入分配的数据来自T Anthony B. Atkinson and Salvatore Morelli, “Chartbook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t [www.chartbookofeconomicinequality.com](http://www.chartbookofeconomicinequality.com), accessed January 8, 201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据, 他们还提供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英国、日本、新西兰、挪威、南非、瑞典和美国的。如果每个家庭在全国收入中所占比例相等, 则基尼系数为0, 如果所有收入都属于一个家庭, 则基尼系数为1。日本的基尼系数从战前的0.3左右下降到1953年的0.04, 表明平等程度非常高。See T. Mizoguchi, “Long-run Fluctuation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Japan,” *Economic Review* 37 (1986): 152 - 158, cited in Toshiaki Tachibanaki, *Confront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Jap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59.

④ Facundo Alvaredo,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The Top 1%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2013): 7; Richard T. Griffiths, “Economic Growth and Overfull Employment in Western Europe,” in Richard T. Griffiths and Toshiaki Tachibanaki, eds., *From Austerity to Afflu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68 - 72; Takenori Inoki, “From Rapid Growth to the End of Full Employment in Japan,” in Griffiths and Tachibanaki, eds., *From Austerity to Affluence*, 87.

⑤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⑥ Carmen DeNavas-Walt, Bernadette D. Proctor, and Jessica C. Smith,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60 - 245 (September 2013), Table A-4; Atkinson and Morelli, “Chartbook of Economic Inequality.” 在美国, 家庭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74年达到最低水平。

⑦ Alissa Goodman and Steven Webb, “For Richer, for Poorer: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61 - 91,”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1994, 15 - 17, 40, 56

- 60; Mike Brewer, Alastair Muriel, and Liam Wren-Lewis, “Accounting for Changes in Inequality Since 1968: Decomposition Analyses for Great Britain,”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2009;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Middle-Income Households, 1977 - 2011/12,” December 2, 2013; A. B. Atkinson, “Bringing Income in from the Cold,” *The Economic Journal* 107 (1997): 297 - 312. See also Gregory Clark, “What Were the British Earnings and Prices Then? (New Series)” MeasuringWorth, 2015, at <http://www.measuringworth.com/ukearnncpi/>.

⑧ Bruce Western and Kieran Healy, “Explaining the OECD Wage Slowdown: Recession or Labour Declin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 (1999): 234.

⑨ 1960年之后六大经济体的劳动份额，参见：Sachverständigenrat *Jahresgutachten 2012/13*, 318 - 341; 1975年后类似的数据参见：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Brent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2014): 61 - 103. 有很多文献探讨该指标下降的意义，例如：Roberto Torrini, “Labour, profit and housing rent shares in Italian GDP: long-run trends and recent patterns,” Banca d’Italia occasional paper 318, March 2016, and Benjamin Bridgman, “Is Labor’s Loss Capital’s Gain? Gross Versus Net Labor Shares,” working paper,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October 2014。布里奇曼断言，劳动份额的下降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低得多，因为经济学家的模型对折旧的估算是错误的。

⑩ 稍后一段时间的关于这点的证据，Martin Adler and Kai Daniel Schmid, “Factor Shares and Income Inequalit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ermany 2002 - 2008,” discussion paper 82, Institut für Angewandte Wirtschaftsforschung,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May 2012.

⑪ Urban Ljungberg and Klas Amark, “Social Rights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1900 - 2000,”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26 (2001): 161.

⑫ Leif Hannes-Olsen, “Children’s Allowances: Their Size and Structure in Five Countries,”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May 1972): 17–28; Matti Alestalo, Sven E. O. Hort, and Stein Kuhnle, “The Nordic Model: Conditions, Origins, Outcomes, Lessons,” working paper 41, 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 Berlin (2009).

⑬ OECD,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88*, 67.

⑭ On Japan, see Toshiaki Tachibanaki, “Japan Was Not a Welfare State, But...” in Griffiths and Tachibanaki, eds., *From Austerity to Affluence*, 203.

⑮ 税收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率源自: [www.usgovernmentrevenue.com](http://www.usgovernmentrevenue.com), viewed February 15, 2015. Rates are from Tax Foundation, “U.S.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s History,” October 17, 2013. Jacob Fisher, “Earners and Dependents in Urban Families in Relation to Family Incom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10, no. 4 (April 1947): 14; US Treasury Department,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nstructions for Form 1040A, United States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 1939.”

⑯ B. E. V. Sabine, *A History of Income Tax*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196; Charlotte Twright, “Evolution of Federal Income Tax Withholding: The Machine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to Journal* 14 (1995): 371.

⑰ On Japan, see Chiaki Moriguchi and Emmanuel Saez, “The Evolution of Income Concentration in Japan, 1885–2002: Evidence from Income Tax Statistic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 (2005): 713–734. On Great Britain, see Tom Clark and Andrew Dilmont, “Long-term Trends in British Taxation and Spending,” 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 briefing note 25 (2002). 在美国, 1951年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3270美元, 该收入的联邦所得税为112美元。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Consumer Income,” Series P-60, no. 10, September 26, 1952, and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U.S.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 for Calendar Year 1951, Form 1040.” On Canada, see Roger S. Smith,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Average and Marginal Rates in the Post-War Period,” *Canadian Tax Journal* 43 (1995): 1059, 1065. On Germany, see Giacomo Corneo, “The Rise and Likely Fall of the German Income Tax, 1958–2005,”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51 (2005): 159–186.

⑱ 关于社会支出对经济规划者的吸引力，参见：Hans-Peter Ullmann, “Im ‘Strudel der Maslosigkeit’? Die ‘Erweiterung des Staatskorridor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sechziger bis achtziger Jahr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2 (2006): 255–263, and Werner Ehrlicher, “Deutsche Finanzpolitik seit 1945,” *VSWG: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81 (1994): 10–19.

⑲ On the changes in Italy, see Daniele Franco, “A Never-Ending Pension Reform,” in Martin Feldstein and Horst Siebert, eds.,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213–214.

⑳ Data on food stamps from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 at [www.fn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pd/SNAPsummary.pdf](http://www.fns.usda.gov/sites/default/files/pd/SNAPsummary.pdf), viewed June 1, 2015.

㉑ OECD国家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从1970年的63.4岁下降到了1980年的61.4岁。在这段时间内经合组织国家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从65岁下降到63.3岁。OECD, “The Retirement Decision in OECD Countries,” Ageing working paper 1.4 (2000); Bo Strath,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 in Europe,” in Griffiths and Tachibanaki, eds., *From Austerity to Affluence*, 178–185.

㉒ OECD dataset, “Tax revenue as % of GDP,” [stats.oecd.org](http://stats.oecd.org), viewed February 9, 2015. 冰岛1977年的数字是推算的，因为该国没有报告年度数据。

㉓ Deborah Mitchell, “Tax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Tax Revolt’ of the 1980s Revisited,” *Public Policy Progra*

m working paper 36,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ptember 1993, 33 - 34, at [https://digitalcollections.anu.edu.au/bitstream/1885/7301/1/Mitchell\\_Taxation1993.pdf](https://digitalcollections.anu.edu.au/bitstream/1885/7301/1/Mitchell_Taxation1993.pdf); Hiromitsu Ishi, *The Japanese Tax System*,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2.

②④ Gebhard Kirchgassner, “Die Entwicklung der Einkommensteuerprogressio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inanzArchiv*, new series, 43 (1985): 333; Deborah Mitchell, “Tax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18; Peter 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Smith,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②⑤ OECD, “Tax on Personal Income, Total, % of GDP,” and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Total, % of GDP,” [stats.oecd.org](http://stats.oecd.org), viewed February 9, 2015.

②⑥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 1995), 366 - 367; Ishi, *The Japanese Tax System*, 51.

②⑦ National debt measures were take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 Debt Database, <http://www.imf.org/en/Data#data>.

②⑧ Isaac William Martin, *The Permanent Tax Revol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2 - 55. 马丁指出, 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房产税的攻击来自左右两派。

②⑨ Jorgen Goul Andersen and Tor Bjorklund, “Structural Changes and New Cleavages: The Progress Parties in Denmark and Norway,” *Acta Sociologica* 33 (1990): 195 - 217; Lars Norby Johansen, “Denmark,” in Peter Flora, ed., *Growth to Limits: The Wester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Vol. 1* (Berlin: W. de Gruyter, 1986), 351 - 352; Malcolm Rutherford, “Burning Tax Records,” *Financial Times*, April 6, 1973; Hilary

Barnes, "Backlash against welfar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8, 1974.

③⑩ Johansen, "Denmark," 368; Confidential memorandum, US Embassy in Copenhag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COPENH 00349 01 0 F 02 071311Z, February 7, 1975, NARA, RG 59,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Electronic Telegrams, at <http://aad.archives.gov/aad/>.

③⑪ Christopher Warman, "Conservatives accused of making local government 'fall guys' as part of election preparation," *The Times* (London), January 14, 1974. 撒切尔在1974年6月27日的一次议会辩论中首次抨击利率, 参见: Hansard HC875/1750。她1974年8月28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稿见<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2391>。

③⑫ Andersen and Bjorklund, "Structural Changes," 203.

## 第10章 向右转

197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让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选民都感到不安和疏离。他们期望政府能够保障就业、改善工作环境，并且提高生活水平，正像政府在之前的近30年里所做的那样。然而此时，他们眼前只有紧缩的经济、停滞的工资和濒临倒闭的工厂。面对新的经济现实，旧政党似乎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只适合在繁荣期间分配胜利果实，而无法刺激生产率的增长，适应一个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

早些年，选民无条件地接受他们所支持政党的政治路线，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在欧洲，天主教、社会主义和农民政党均能得到某些地区选民的稳定支持。工会成员是加拿大新民主党的核心支柱，而美国南方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是民主党的坚强堡垒。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一度忠诚的选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也能轻易地移居外地，不再坚信他们有义务

支持原政党的路线。在意大利，本地主教的意见开始变得无关紧要，而美国工厂工人越来越不在乎工会领袖的呼吁。随着区域投票一致性的丧失，战后的稳定政府逐渐让位于不再牢固的联盟，少数议员的死亡或入狱就能打破其中脆弱的平衡。

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很多基础性的事实发生了改变。“1974年中的某些时间点，在英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尼德兰、挪威、瑞典和丹麦，立法机关中没有一个党派占据了多数席位。”三极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一项研究中指出。该委员会当时刚刚成立，成员多为国际商界和外交界的领袖级人物，很快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此时，专家们开始谈到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不可治理性”。<sup>①</sup>

不可治理性在很多领域都有所体现。政府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秩序。在欧洲，报纸标题中充斥着黑帮的绑架和谋杀犯罪，比如联邦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意大利的红色旅和西班牙的埃塔（ETA）。在美国，犯罪率直线飙升：1975年，每20个居民中就有一起财产犯罪立案。统一的主权国家自身也受到了攻击，从魁北克到苏格兰再到南斯拉夫，政党都想让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甚至是实现地区自治。接下来还有丑闻带来的不确定性，1974年三个主要经济体的核心领导层因此发生权力更迭。5月，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辞职，原因是他的一名亲密助手被揭发是民主德国间谍。8月，水门事件事发，理查德·尼克松试图掩饰他曾在1972年总统

大选期间指派特工闯入民主党办公室，结果发生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职总统辞职。12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从地产交易中牟利，并因此辞职。<sup>②</sup>

尽管上述三起事件在细节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有一名成就杰出也备受欢迎的政治明星陨落了。勃兰特在1933年曾逃往挪威以躲避纳粹，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项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中拽了出来，将其重塑成了群众基础远比产业工会及其成员更为广泛的政党。在1972年的连任竞选中，联邦德国民众热烈支持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即与民主德国和波兰关系正常化，以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也能使分散在两国的家庭重新团聚。尼克松早在1946年就登上了美国政治舞台，而且在两年前的连任竞选中还刷新了美国大选的记录：在50个州中赢得了49个州，投票支持率高达61%。他利用中产阶级和白人工薪阶层对犯罪的恐惧和对种族融合的反感，赢得了他们的广泛支持。而田中首相，随后在一场收受美国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贿赂的丑闻中被定罪，但是此前他通过政治分肥的手段，打造了一台强大的选举机器。他最擅长的就是将政府资金转化成钢筋和混凝土，很多崇拜者都将他称为“智能推土机”。<sup>③</sup>

然而就是这些在权力场中手握重拳呼风唤雨数十年的大人物，即便人脉根深蒂固，仍然无法安然度过危机。如果是在几年之前，人们面对类似的事件很可能只会耸耸肩膀，毫不在意。而此时，政治环境已然发生了改变。

不可治理性，这个词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含义更多是与政府瘫痪而不是社会的不稳定性相关。据说，这是两项根本性社会变革的结果。其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让普通人也有机会和勇气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不再盲目地追随教会、工会或者行业协会的指导；与之相反，他们会自行判断什么样的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另一项转变是，政府已经增重成了庞然大物，其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直接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人们也因此更加关注它的一举一动。这两项转变综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政客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大众利益之名做出决定，然后就要求选民们无条件地支持。福利国家的福祉已经被当作了公民的天赋之权。人们曾对政客许诺的各式新鲜福利心怀感激，而此时，他们拒绝任何可能减损他们既得利益的改变，无论是在绝对收入上还是相对收入上。这些越来越善于表达诉求的选民有着明确的经济利益需要保护，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受到重视。<sup>④</sup>

对于不可治理性的关注，与经济发展的停滞有直接关系。在繁荣增长的黄金时期，政府有能力改善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条件。他们有充裕的资金提高儿童津贴，兴建免费或者低学费的大学，同时又不影响无孩家庭的税后收入。然而此时面对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倒退，政府就只能玩一场零和游戏。任何为某一群体配置资源的措施，无论是学龄前的幼儿还是耄耋的老人，都意味着要切走别人的蛋糕。甚至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政策，比如抑制通货膨胀，公众也很抵触，因为人们不愿为了长远的收益而承受短期的阵痛。

福利国家政策对公众许诺的不仅仅是稳定提高的生活水平，更包括社会公平的改善。而这一承诺，也成了经济萧条的受害者，因为政府掌握的流动性不足以补偿所有自认为处于弱势的群体。英国记者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指出，一项政府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宁愿每周和其他人一样拿到4英镑的补贴，而不是在其他人每周拿到6英镑的情况下，自己拿到5英镑。“政策越倾向于消除阶层分化和收入差异，人们就越容易因为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群情激奋，”布里坦得出结论，并警示道，“自由民主制度存在某种倾向，那就是催生人们不切实际的期望。”政策变化的潜在受损者已经动员起来要保护已经属于自己的权利，而民选政府在对自身的改革中缚手缚脚。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代议制政府的不可治理性。<sup>⑤</sup>

一种观点是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对这一理论最著名的支持者要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尽管本人和蔼可亲、言语温和，奥尔森对富裕民主国家未来命运的预测却远远谈不上乐观。在他的眼中，随着有广泛群众基础、表达群众普遍关切的大型组织逐步失势，有着狭隘目的的小型团体愈加得志，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已经在渐渐瓦解。这种转变的原因使用简单的算术就能解释。如果某个大型组织的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改变政策所能带来的利益平均下来就很少。而加入某个小型团体，专门为特定目标奔走，如果该团体在相应事项上成功地左右了政策制定，每个人能得到的好处都会大大提升。按照这一逻辑，对于一名心脏外科的医生来说，加入心脏病联合会进行游说所能带



来的利益，远远要高于加入泛泛的大型医生联合组织，因为后者还要同时关注过敏科医生和肾病专家的利益。

就奥尔森看来，真正的危险就是，这些小型团体会把目标简单定义为保护成员的眼前利益。代表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大型组织能够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为了公众的福祉，愿意接受短期的挫折。但是大型组织正在节节败退。奥尔森预计，权力将向小型团体转移，而后者只会坚持不懈地在政治斗争中争取短期胜利，以保持成员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随着这些小型团体影响力的增加，以及彼此间结成同盟，他们终将绑架政府，使其无法做出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决策。

伴随着狭隘利益集团的得势，受到冲击的首先就是国际贸易。大型组织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知道，自由贸易能够刺激经济的整体增长，即便某些产业和部分工人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小型团体的视角就狭隘得多了。一项降低鞋子进口关税的贸易协定，全国劳工联合很可能会支持，但是鞋业工会几乎肯定要反对。类似地，狭隘利益集团往往会阻碍新技术的推广，以保护相关企业的利益和员工的工作机会。奥尔森警告道，经济将越来越僵化，也会越来越抗拒改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总的来说，”奥尔森写道，“狭隘利益集团及其联合将导致政治生活更加分裂，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率和总体收入水平。”<sup>⑥</sup>

奥尔森在政治上是一名保守派，而且和很多右翼人士一样，他认为工会组织尤其要为富裕民主国家中明显的僵化倾

向负责。在关于不可治理性的辩论中，一件怪事就是不同党派之间居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塞缪尔·布里坦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多项经济政策表示过支持，预测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主导地位“将在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有生之年成为过去”。但是维利·勃兰特，民主派中的左派人士，据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中，不可治理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晚期”的一个表现，在此阶段政治秩序将会失去其合法性，接下来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社会结构的最终崩塌。然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不可治理性不过是政府无法兑现其对公民的所有承诺的又一例证。<sup>⑦</sup>

并非只有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出了不可治理性。铁幕之后，共产党控制下的苏联附属国也陷入了统治危机，而且事实表明，这场危机远比西欧、北美和日本的民主政权所面临的更为严峻。

苏联在人们的记忆中通常与经济瘫痪相等同，但这是对于历史过分简单的解读。事实上，东欧和苏联的国营经济体制战后也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尽管很难做到逐一对比——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等统计概念都应以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国家制定的价格计量——大多数的评估认为，铁幕之后，经济增长相当迅速。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测算，1948—1973年，在剔除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的影响之后，苏联和东欧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要高于比利时和丹麦，而且远远高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按照麦迪森的结论，1948年，匈

牙利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尽管在接下来的25年里，美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很快，但是匈牙利的增长速度要远超美国。<sup>⑧</sup>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归根结底与市场经济国家繁荣的原因并无不同。战争导致国家满目疮痍，亟须大规模的重建。数百万的劳动力离开了田间地头，流入新工厂操作重型机械。这些工厂跟二战之前比较典型的小型企业相比规模要大得多，资本密集程度也高出很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规模经济的真正信仰者。从卡尔·马克思开始，他们就坚信工业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那些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研究的经济学家尤其强调生产总量的意义，根据他们的观点，计划经济的领导者认识到，实现工业化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建造大型的综合工业体，能够快速炼造钢铁、生产化学制品和纺织棉料。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效能的信奉贯彻其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规划者决定该生产多少吨钢铁和多少平方米的布料，工厂管理者的业绩就根据能否完成这些指标来评价。其他的国有工厂则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进口钢铁和布料，并生产指定数量的拖拉机和连衣裙。接下来，这些规划者就要指导国营农场购买拖拉机，以及决定国营商场应该卖掉多少件连衣裙。国际贸易往往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而不是现金交易。如果一串串的香蕉忽然出现在布拉格的杂货店货架上，这很有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官员安排的：该国向某个香蕉生产国出口机械，并接受对方用水果作为部分货款。

共产主义经济体十分擅长生产产品，却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武器和重工业制品始终占据首要地位；至于公寓和汽车这些普通家庭需要的商品，则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产品的质量往往十分低劣，样式也过时老旧，因为针对品质和创新几乎没有任何奖励。虽然规划者关注人们购买连衣裙的数量，但他们毫不在意这些连衣裙的颜色、款式和图案是否符合那些看过西方时尚杂志的女性的心意。这些对于产品多样性的潜在需求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每家工厂都被提前指定了配额，以便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这种流程是无法满足消费者按个人品味购物的需求的。而仅在对化解政治危机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公众的情绪才会被视为一项考量因素。<sup>⑨</sup>

早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前，苏联内部就已经广泛出现了动乱的迹象。新的人权运动开始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政治压迫。国家无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导致波兰爆发大规模内乱，从1970年开始，当地政府就在用冻结物价的方式安抚民众。1968年遭受了苏联入侵并终止了一切政治与经济革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了滋生暴动的温床。1974年3月，匈牙利多项具有自由化倾向的政策在苏联的反对下被叫停，理由之一是“向资本主义变质”。飙升的油价打乱了苏联的计划。提高一种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需要进口的重要原材料的价格，并降低其西方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速度，石油危机也因此使社会主义诸国难以实现经济增长，进一步滑向了不可治理性的深渊。<sup>⑩</sup>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新闻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然而，尽管到处充斥着关于不可治理性的危险信号，选民仍未放弃对民主政府自我革新的信念。被选民们无情抛弃的是那些只会承诺牛奶和蜂蜜的魅力型政客。70年代不属于夏尔·戴高乐和林登·约翰逊这种传奇式的领袖。人们需要的是务实的领导人，现实可靠，有实干能力而不是只会夸夸其谈，面对经济危机能够保障稳定。

与他们的前任相比，新一代的领导人主要有两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不带有个人色彩，二是能力超群。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在汉堡大学师从卡尔·席勒学习经济，并在维利·勃兰特于1974年5月辞职后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他是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者，而且一贯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他的执政哲学总结起来就是一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那些眼中总是未来愿景的人应该去看医生。”瓦莱里·玛利·勒内·乔治·吉斯卡尔·德斯坦，人们口中的吉斯卡尔，在德国的施密特下野后两周当选法国总统。吉斯卡尔是声名卓著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国际经济领域的专家。三木武夫，在田中角荣丑闻产生下台后，于1974年12月成为日本首相。他在历届日本首相中与众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不肯利用政府工程合同讨取政党捐助人和地方官员的欢心。在日本，他不仅以言语耿直著称，还以没有废话、讲求实干的作风享有盛誉。<sup>⑪</sup>

然后就是吉米·卡特了。曾任核潜艇指挥官、佐治亚州乡村家族花生仓库经理的卡特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干而且清

廉的领导人。作为浸信会主日学校的兼职教师，卡特是一位极为虔诚的信徒，他承诺要在美国推行人权外交政策，这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因为当时国家因越南战争和对拉美独裁政府的支持而民心分裂。1977年1月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卡特在天寒地冻中步行走过宾夕法尼亚大道，而不是按照惯例乘车，这一举动巩固了他作为平民总统的形象。

这些领导者都是极为严肃的人。他们看到通货膨胀正在腐蚀本国的经济，导致国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他们意识到了福利国家政策的局限性，也了解人们对高税收的反感。他们清楚地知道，唯一能够激励企业扩大投资和招募工人的就是利润。他们清楚，高油价已经导致本国大部分的制造业不再具备经济效率。而且，不论他们对公众说了什么，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大部分暂停营业的工厂再也迎不来重新开张的那一天了。他们准确地认识到，为了实现重现经济繁荣，眼前最大的挑战和难题就是恢复生产率增长的速度。

然而，尽管这些领导人做了各种努力，彼此间经常沟通会商，仍然仅仅能够给经济提供一点微弱的反弹。在三木及其继任者的治下，日本经济在1974—1979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6%——几乎不到之前6年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德国和法国的增长速度也与之相近。唯有美国，增长率比前者低了接近整整1%。在这6年中，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有1.9%——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这个数据意味着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任何提高。

况且上述数据还只是税前收入。为了达成政治目标，政府需要向退休和失业工人发放津贴，并补贴依靠政府资助发放工资的企业。尽管社会上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政府仍然坚持上述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别无选择。而为了给这些补贴提供经济支持，他们不得不继续从工人的收入和消费者的支出中抽取税收。吉斯卡尔担任法国总理期间，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74年的34%上升到了1979年的38%；在日本，这一数字从22%提高到了24%。纵观23个发达国家，国民收入中税收的比重在这些年中增长了3%。然而尽管税收一直在涨，到了1979年，各国的失业率还是创了6年以来的新高，通货膨胀率再次飙升。

世界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高税率，以及人们眼中高税率的罪魁祸首——政治党派，将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1976年1月30日，预言成了现实。

一个风雪交加的星期五，瑞典警察打断了斯德哥尔摩皇家大剧场内正在进行的戏剧彩排，剧目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死的舞蹈》。舞台上的演员眼看着身着便衣的警察走向他们的导演，时年57岁的英格玛·伯格曼，说他因为偷税漏税而被警察厅传讯。伯格曼，这位蜚声国际的电影导演，同时也是瑞典当代文化的代表人物，公开受到了侮辱。他的护照已被扣押，公寓遭到搜查，本人被警告不得离开城区。面对刑期可达2年的司法指控，伯格曼因为“情绪紧张”住进了卡罗林斯卡医院。

就在伯格曼事件抢占各大报纸的头条后未久，警察突击搜查了女明星毕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的家。在十几部伯格曼的电影中担任过角色，并且是一名5岁女孩的母亲，安德森被拘禁了36个小时，不允许打电话或者联系律师，理由是她欠下了2.3万美元的税金。接下来，3月3日，68岁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长袜子皮皮》系列故事的作者，同样是世界知名的文化名人，在瑞典流通最广的报纸《快讯》上发表了一篇短小的寓言故事，题为《住在偏执国里的波米贝瑞朴莎》。在故事中的某个虚构王国里，一名作家因为作品成功而不得不面对高达收入102%的税金，其中的讽刺谈不上含蓄。“这些人真的是我曾经如此尊敬、如此仰慕的智者吗？”可怜的波米贝瑞朴莎问道，对象是制定这些税收的政治领袖。“他们想要实现的是什么目标——一个狭隘、不可思议到极致的社会吗？”她的故事是有事实基础的，随后林格伦就公开了她和勤勉的税务人员之间的一些小争执。<sup>⑫</sup>

公诉人没有找到上述三人偷税漏税的任何证据，但是丑闻这种东西，一旦缠身就很难摆脱。住院2个月之后，伯格曼回到了波罗的海上的法罗岛，这个海风呼啸的小岛是他的故乡。4月，在法罗岛上，他在《快讯》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正式声明由于税务机关的骚扰，他已经决定离开瑞典。伯格曼说，这场调查让他认清：“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被某种特殊的官僚主义攻击和中伤。”“这种官僚主义，”他接着说，“像恶性肿瘤一样肆意蔓延。”他说他将关闭电影制片厂，取消在瑞典发布新电



影的计划。他将他的财产交给国家税务局处置，以防“正直的瑞典纳税人们”以为他要逃避义务。就在当天下午，伯格曼登上了一台飞往巴黎的客机，从此背井离乡。五天之后，税务审计人员对伯格曼的指控做出了回应，声称税务人员做法正确，伯格曼无理狡辩。但是审计人员向媒体公开的数字显示，政府主张伯格曼应缴的税款，高达这位导演收入的140%。<sup>⑬</sup>

上述三起案件引发了瑞典的政治风暴。众所周知，伯格曼和林格伦都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该党派坚决主张通过高税收向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以及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公。此时，这两位文化领军人物似乎都离弃了他们的政党。对9月19日议会选举的民意调查显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将该党的失势归咎于“反动宣传的洪流”。但事实上，接连传出的丑闻让很多远远谈不上反动的选民开始反省，一个要求工薪阶层交纳一半以上的收入，并且严厉惩罚小型企业和个体生意的税收体制，到底谈不谈得上公平正义。

对于官僚体制抬头的抱怨并非无据可依。1950—1975年瑞典新增的100万个工作岗位中，超过一半都属于公共部门。在同一时期，政府雇员的人数增长了151%——这一数字是劳动力增长率的5倍——因为扩张中的福利国家雇用了更多的社会工作者、就业咨询顾问，以及幼儿园教师。

虽然慷慨的社会事业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开始抱怨，他们的领导人丧失了与普通群众的

联系。逐渐地，人们提到社会民主党时，首先想到的不再是高养老金和带薪探亲假，而是烦冗的官僚主义作风。“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和英格玛·伯格曼最先通过抗议开启了民怨的闸门，更多不满的情绪也随之宣泄。”独立媒体《每日新闻》报道。年轻的工人尤其厌烦福利国家的单调乏味和一成不变，开始与社会民主党离心离德。从1976年开始，年满18岁即可在大选中投票的制度确立了下来，这无疑不利于社会民主党的事业。而林格伦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警告说瑞典正处于成为“官僚独裁”的边缘，对社会民主党又是一重打击。<sup>⑭</sup>

随着大选的临近，对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的感知毫无征兆地笼罩了全国。瑞典安然度过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受到的冲击远不如其他邻国严重。帕尔梅政府全力刺激国民经济，削减增值税以鼓励消费，提高社会福利，补贴制造商以保持生产线正常运转并保护工人不至失业。得益于这些积极的刺激政策，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时，瑞典却能一枝独秀，不但失业率降低了，工资也大幅提高了。但是瑞典无法靠国库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全国都有大量的制成品在仓库中堆积如山：政府给生产企业提供了补贴，但是没有人想买这些东西。1976年初，世界范围内需求的下降和国内的高人力成本拖累了瑞典的出口贸易，整个经济开始转向收缩。

1932年起，社会民主党就开始统治瑞典，期间从未间断，以致大部分瑞典人从未料想过会有其他的党派执政。但

是1976年9月19日，随着瑞典经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衰退，选民们将社会民主党赶下了权力的舞台。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冲击。“瑞典模式需要修复。”伦敦的《金融时报》评论道。至少部分离弃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是出于反对核能的原因，因为该党始终大力支持发展核能，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考虑的并不是这类细枝末节。不管是对是错，这次选举的结果被解读为一次削减政府权力的努力。尽管瑞典的非社会主义政党也远远谈不上是福利国家的尖锐批判者，他们的成功至少重启了一个疑问，那就是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安全，其代价又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sup>⑮</sup>

相比瑞典，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新经济现实，英国的适应要勉强得多。事实上，英国几乎完全没能顺势而为。

1974年2月，英国仍然笼罩在石油危机的紧张氛围之下，到处弥漫着一种不安感。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接近20%。面对矿工的罢工，制造商每周仅开工三天以节省煤炭和能源。北爱尔兰则处在内战之中。“谁在统治不列颠？”保守党质问，他们声称工党过于激进，甚至有可能废除人们对于住宅的所有权。而工党，此时正在全力与已经在任4年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宣战，由偏向社会主义一方的势力主导，其中一个被称为战斗派（Militant Tendency）的团体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工党竞选的宣言是呼吁“一场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对权力和财富平衡的改变，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家

庭”，并且坚持北海石油和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应该收归国有。<sup>⑩</sup>

愤怒的选民没有让任何党派拿到大多数支持，结果选出了1929年以来第一个无多数党议会。大不列颠整整三天没有组建政府。这三天中，希斯为争取自由党14个议会席位的支持而讨价还价。自由党尚在犹豫时，希斯就向工党的哈罗德·威尔逊低了头，此人在1964—1970年担任英国首相。威尔逊组建了少数派政府，依靠对几个小党派的忍耐勉强维持，直到10月举行重新选举。这次尝试让工党赢得了多数支持，但这个所谓多数十分脆弱，连正常的政治运转几乎都无法做到。而工党之所以能够赢得多数，是因为很多选民待在家里没有参加投票。

工党政府在1974—1979年统治英国，最开始由威尔逊执政，1976年3月后由詹姆斯·卡拉汉担任首相。在此期间，英国经历了可能是二战后所有发达国家选出过的最为无能的一届政府。通货膨胀已经完全失控：1974年的数据是19%，1975年达到了25%，1976年恢复到了15%。然而菲利普斯曲线显示的替代关系却完全没有反映出来；高通货膨胀并未达成遏制失业率的效果，反而驱逐了投资，导致情况更加恶化。随着经济总量的缩水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一英镑所能兑换的美金也从1975年3月的2.43元下降到了1976年9月的1.66元。就在同一个月，工党的年度代表大会召开，并收到了一则惊人消息：大不列颠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穷国的身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紧急贷款。

为卡拉汉说一句，他接手的确实是个烂摊子。卡拉汉由寡母在贫困中艰难养育成人，1944年进入议会，一路披荆斩棘，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内阁岗位都任过职。在哈罗德·威尔逊政府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在重新商定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条款时起到了关键作用，该项决议在1975年的全民公投中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当年的3月，威尔逊突然辞去了首相一职，当时已经64岁的卡拉汉成了他的继任者。“首相！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据传，他在赢得了党内选举后说道。

在卡拉汉搬入唐宁街10号的三个星期之后，工党就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地位，原因是一名议员将为诈死而接受审判，不得不退出工党。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卡拉汉不得不一再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小党派谈判妥协。他的优势在于外向的性格和平静的外表。人们给他起了个“阳光吉姆”的外号。工会也一向对他十分尊重，因为17岁时他曾经担任过税务局的办事员，并成功地为税务公务员组织工会。“没有人比詹姆斯·卡拉汉更能代表英国的工人运动了。”记者彼得·詹金斯在1988年写道。<sup>①⑦</sup>

然而，工会对于首相的敬意并没有让合作变得更容易。英国的工人运动历来有激进倾向，而很多工会都坚决反对雇主提出的任何可能导致工作机会减少的变革。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会组织理解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能够在长远上提高工人的收入，并且在经济的其他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是对于英国的工会领袖来说，这样的言论近乎异端邪说。以全国矿工总工会为例，他们反对国家煤炭局关闭

任何一家煤矿，哪怕是那些历经近2个世纪的挖掘已经完全枯竭的煤矿。杰克·琼斯（Jack Jones），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工会的领导者，代表了建筑业、制造业工人，码头劳工和卡车司机的利益，在当时可谓手掌重权，以致1974年选举前的街头涂鸦都写着“投杰克·琼斯一票，把中间的代理人切掉”。

尽管并非所有的英国工会都激进好斗，但普通的民众普遍都反对政府的“收入政策”，因为该政策倾向于用限薪的方式控制通货膨胀。等到卡拉汉入主唐宁街10号之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规律：雇主会在政府限定的幅度内提出工资涨幅；工会将拒绝接受，并组织罢工；而雇主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屈从于工会的压力。<sup>⑮</sup>

1976年9月，在布莱克浦滨海度假村举办的党代会上，卡拉汉向工党的左翼人士发出了明确警告。“我们之前身处其中并认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安逸世界，那个首相大笔一挥，减减税、超超支就能保证充分就业的安逸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卡拉汉严肃地宣称，“我们过去认为，只要政府花钱就能摆脱萧条，减税和扩大开支能够提升就业。我现在坦诚地告诉你，这一选项已经不复存在。”他呼吁提高生产效率和控制公共支出，但是对于一个在1974年10月提出支持制造业国有化并要求大企业“按国家需要和目标一致行动”的政党来说，他的态度并不受欢迎。在那些支付着工党的账单并且控制了多个工党地方委员会的大型工会眼中，提高生

产效率和控制公共支出就意味着裁员和降低养老金。这不是他们支持的计划。<sup>①⑨</sup>

多亏有英镑的贬值刺激了出口，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英国经济在1976年下半年焕发出一丝活力。但这差强人意的表现也仅仅是针对本国最近的情况而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英国在经济增长率、资本投资量方面都稳居倒数第一，通货膨胀也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卡拉汉政府非但没有要求英格兰银行降息，反而寄希望于限制工资上涨的政策能够在短暂阵痛后解决问题。他们的希望落空了。1977年7月，在英国北部的达拉谟举行的煤炭工人节上，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呼吁工人“无视政府对于进一步限制工资的建议”，而此时卡拉汉本人就坐在领奖台上。当轮到卡拉汉演讲时，他号召矿工们接受限薪，理由是“这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矿工也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这完全谈不上是什么有吸引力的说辞。<sup>②⑩</sup>

1978年夏天，工党政府宣布，工人工资的增长率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不能超过5%。这一比例很可能连通货膨胀率的一半都达不到。工会领袖们担心武装分子举行未经授权的罢工活动，拒绝接受政府不切实际的指导方针，要求回归正常的工资谈判流程。“我们已经忍受限薪3年了，人们早都已经受够了。”一位住在约克郡赫尔城的卡车司机回忆道。卡拉汉拒绝让步，结果是汽车工人、货车司机、铁道工人、护士，甚至掘墓人，都开始了罢工。医院不再接收病人，肉鸡因为没人喂食而饿死。1978—1979年间那个黑暗而大雪连绵的冬

天，将会以“不满之冬”的名字载入史册。伦敦人的垃圾堆满了莱斯特广场，因为清洁工拒绝打扫。争端最终得到了解决，罢工的工人们争取到的工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政府5%的指导数字。1979年3月，议会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对卡拉汉政府的不信任案。<sup>②①</sup>

这一次投票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作为英国主要政治势力的工党的下台，在很大程度上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关。撒切尔在1959年加入议会，坚决反对战后各国对于建设福利国家的共识，并且尖锐批判保守党对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1975年2月，这位保守党的环境事务女发言人取代前首相爱德华·希斯成了保守党的议会领袖，撼动了整个英国的政治建构。此时，她开始向卡拉汉施压，要求组织大选，而此时英国的经济再次陷入困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全世界都在应对新的石油危机——这一次发生在1979年1月推翻伊朗国王的革命运动之后。

撒切尔行事果断，喜欢直言不讳。她认为英国面临着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广受认同。但是和大多数同胞（当然包括卡拉汉本人，他曾在1974年跟工党领导人说过“我要是个年轻人，我就会移民”）不同，她不认为衰退是不可逆转的。她把矛头指向了高税收和福利国家政策，指责其压抑私人企业的积极性、扼杀经济增长的活力。撒切尔对于抗拒变革的工会和靠地租过着安逸生活的乡绅同样不满。她宣扬刻苦工作和创业精神是重要的美德。

“我们中没有人幼稚到会去相信，只要政府削减了税负，一



切就会突然改变，让我们的国家在一夜之间恢复繁荣，”她在大选前一周的广播节目中说道，“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建设一个奖励劳动的国家，还是建设一个勤奋工作得不到认可的国家，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实现经济上的复兴，英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内在关怀的社会。”<sup>②②</sup>

关于撒切尔夫人崛起背后的智囊，已经有很多记载了：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宣扬自由市场的理念；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爵士，作为一名议会成员，在1974年对希斯的保守主义和解路线大加批判；伦敦政策研究中心，专为给未来的保守党政府提供咨询而建立。约瑟夫爵士支持用货币供给机制抑制通货膨胀，并将各种自由市场派的观点灌输给了撒切尔。毫无疑问，无论是实业上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利益团体，本国的或是国外的，都在支持保守党的主张。1976年，约瑟夫爵士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的政府管理的范围太宽，支出太大，税收太高，借贷太重，人员也太过繁冗了。”这一观点已经被中部的企业家和城里的银行家鼓吹多年了。<sup>②③</sup>

然而，虽有这些努力为保守党的复兴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但仅靠市场竞争的理念是无法将工党推向深渊的。工党下台的最根本原因是二战后给全世界带来繁荣的经济模式的崩塌。贯穿整个五六十年代，工党的观点渗透到各项政策中，福利国家制度建立起来，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到了70年代，无论怎样的政策组合都无法继续带来英国人民预期的高速增长。正是梦想的幻灭将保守党送回了历史

的舞台。1979年5月3日，保守党在议会取得了60个席位，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了英国首相。

在大西洋的对岸，吉米·卡特犯下了和吉姆·卡拉汉同样的错误。在他四年的总统任期中，他遇到的倒霉事也与后者相似。

卡特初入白宫之时，美国的经济形势比英国要好得多。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到了1979年夏天，失业率从1977年1月份的7.5%下降到了5.7%。但是没有人会误将这些数字当成经济体整体健康的表现。阿瑟·伯恩斯领导之下的美联储，为了帮助杰拉尔德·福特赢得连任大选，在1976年底大幅降息，留给卡特的则是通胀高升的恶果。尽管卡特得以在1978年1月将伯恩斯赶出美联储，但此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攀升到接近两位数。美联储开始激进地提高隔夜利率以遏制通胀，国债短期债券的利率已经快要高到和长期债券的利率持平了。1978年8月18日，两条收益曲线终于相交了：投资者将资金借给政府2年，将获得比借给政府10年更高的收益。这一反常的情形，在金融市场理论中被称为反向收益率曲线。它为美国经济敲响了警钟，昭示着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极有可能在1979年的下半年出现。

然而就在紧迫的关头，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了，起因是伊朗革命和沙特阿拉伯限制石油生产的决定。自从1974年起一直保持稳定的石油价格，仅在1979年这一年就翻了一倍。对于美国的选民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汽油的价格，而这一数字从每加仑70美分涨到了1.11美元，而且购买时常常要花

费漫长的时间排队等待。就在加油站主人们忙着往油泵上贴“售罄”标签的同时，卡特政府加急印制了汽油的供给券，以防止供应紧张的加剧。卡车司机和运输业主抱怨联邦法规禁止他们将上涨的油价转嫁给顾客，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演变成了暴力对抗。卡车司机宣布罢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动用了石块、砖头，甚至子弹。搬家中的家庭发现他们的家具滞留在了运输线上，因为搬家公司的货车司机不敢上路。<sup>②④</sup>

卡特的总统任期毫无欢欣可言。尽管没有人指责他应该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负责，他和他的幕僚也没展现出多少力挽狂澜的魄力。他的政府采取了一些关键措施来减轻政策对经济的束缚，包括在1979年4月取消油价管制，以及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压力之下于1980年结束了对货运和铁路行业的管制。但是以上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能够解决卡特自己在1979年6月15日面向全国百万观众的演讲中提到的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这一点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稳定造成了威胁，”他说，“国民中的大多数人确信未来五年将比过去五年过得更糟，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不到一年之后，1980年3月，卡特宣布了提高信用卡和其他家庭借款成本的新规。“高通货膨胀与过度的信用支出密切相关，”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对美国民众说，“消费者已经深陷债务泥沼。”他似乎在暗示，如果人们愿意减少支出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坏事。<sup>②⑤</sup>

正是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大环境中，罗纳德·里根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一样，不是横空

出世的。自由市场的信奉者花了多年时间耐心建设智囊团和大学研究机构，用以瓦解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就培植了许多基层团体，将这些人团结起来的是对于各项社会和法律变革的不满——不得不让孩子到较远的街区上学以满足种族融合要求；堕胎变得更加容易；“反歧视政策”支持移民就业；性教育的推广——他们还不断利用共和党来反对这些变化。<sup>②6</sup>

但是这些担忧还不足以让整个美国的政治风向向右转。1976年，里根成了保守党的执矛者，杰拉尔德·福特，作为更加倾向于温和派的共和党总统，拒绝让里根获得总统竞选的党内提名。在当时，美国经济正在从1973—1975年的衰退中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而且对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的恐惧也还没有弥漫全国。等到1979年下半年，债券市场预期到的衰退如约而至，人们的心态开始发生转变。房贷利率飙升到了11%，年轻人对于买房置业感到绝望，辞退的通知也不断发放到建筑工地和汽车工厂的工人手中。此时，保守党全面崛起的时机成熟了。

里根用言辞和自信的力量反驳了当前所谓的世界已经无法治理的观点。他的形象强大而充满力量，给人的感觉是，如果由这样一个人来执掌政府，美国就能抵抗外敌、恢复繁荣。“你的生活比4年之前更好了吗？”在1980年10月与卡特的电视辩论中，里根这样问电视前的所有美国人。在几天之后的总统大选中，里根的声势席卷全国，赢得了44个州的选票。和几年前的英国大选一样，数千万的工薪阶层选民抛弃

了支持福利国家的政党，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不认为经济衰退在所难免的候选人身上。当里根承诺新的理念和刻苦工作能够让经济重返繁荣的时候，美国人急切地想要相信他。<sup>②⑦</sup>

里根和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熟，但还远远谈不上是亲密的友人。1969年，在里根作为加州州长的第一届任期中，英国的保守党邀请他参加董事会“郊游”，这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聚会。里根的演讲题目为“位高则任重”，他发出警告：“很多原本属于人民的权利正在被政府势不可挡地侵犯和占有。”类似尖锐的语言在美国不会引发一丝波澜，但以英国上层社会的礼仪标准来看，就相当语出惊人了。里根自此频繁到访伦敦，在这里，他缩减加州政府人事规模的故事让在场的听众深深着迷。撒切尔与里根第一次相见应当是在1972年首相希斯举办的午餐会上，两人1975年4月在伦敦的下议院又有过一次长谈，此时里根的州长任期刚刚结束，撒切尔则当选了议会的保守党领袖。<sup>②⑧</sup>

和撒切尔一样，里根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了一条简单的理念：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需要控制通货膨胀、降低税收并缩减政府规模。对于他们来说，技术上的细节都不是重点。撒切尔最为重视的经济顾问，基思·约瑟夫和艾伦·沃尔特斯（Alan Walters），都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对于他们来说，实现高收入和低失业率的政策工具就是货币供给。里根的顾问团队则更加多元，其中既有货币主义者，也有支持传统“小政府主义”的共和党人，他

们提倡的是收支均衡和低利率，此外还有新兴的“供给学派”的拥护者，这些人认为降低边际所得税税率将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

货币主义者认为供给学派是在推销所谓包治百病的“万金油”。传统学派嘲笑货币学派对于货币供给量的执迷，同时又不信任供给学派不顾政府赤字的危险，急于降低边际税率的做法。对于供给学派，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完全无关紧要。然而，三者都坚信只要政府奉行自己的观点，美国梦就能复苏，美国人期待的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就能实现。

发达国家向右转的进程还远未结束。1982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院的信任投票中失败。在没有输掉任何一次全国大选的情况下，赫尔穆特·施密特结束了长达8年的首相生涯。

联邦德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表现几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率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要低，失业率虽然高出了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水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意大利和法国的程度。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帮助了德国，使其在马克汇率相当坚挺的情况下，仍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保持竞争力。整个70年代，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尽管增长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了施密特施政的大敌。原油的价格在1979年初只有每桶16美元，到1981年初已经疯涨到了每桶38美元，价格翻了一倍不止。央行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吸取了教训，拒绝用通货膨胀来缓解危机，他们严格控制货币政

策，避免消费者价格指数失控。全世界范围的利率飙升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于联邦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施密特因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而备受指责。随着总理声望的下降，原本就处于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和其他小党派联盟轻易地转换了阵营，政府迅速重组。

施密特的继任者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赫尔穆特·科尔。科尔本人并不是右翼的激进派，但是他从瑞典和英国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他强烈谴责官僚体制的臃冗，承诺裁撤政府的多余机构，尽管他所在的政党在联邦德国成立后的32年里有20年处于执政地位，政府大多数行政部门的建立都是他们的主意。科尔倡导减税和改良福利国家体制，以刺激人民对工作的热情。他承诺在不摧毁福利国家体制的前提下，改善这一社会制度。从选民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缺少新的想法，他们在接下来的16年里始终没能再次上台。<sup>②⑨</sup>

科尔就职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11月，日本的拐点也来了。自从1973年以来，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就在不断扩张，政府大幅提高了退休津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并且降低了个体经营者的健康保险缴纳比例。政府支出当然也随之攀升——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税收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到了1980年，纳税人开始发声抗议。“虽说日本的税率要低于大部分西欧国家，但是对于广大日本纳税人来说，这可谈不上什么安慰。”美国政治学者埃利斯·克劳斯（Ellis Krauss）评论道。继任的领导者试图通过提高政府借贷来推进减税，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局限。1980年，日本政

府发行的债券金额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加在一起还要多，而这样大规模的借款却只能覆盖全部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sup>③①</sup>

缩减社会福利在政治上并不可行。面对危机，日本政府选择了一条很有本国特色的道路。1980年秋天，行政管理厅成立，由中曾根康弘担任长官。中曾根康弘是战后日本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他出生于日本中部一个叫作群马的穷困山区，父亲是伐木工人，从他的家乡乘火车去东京大概要两个小时。毕业于东京大学之后，他在二战期间服役于日本海军，职务是出纳员，并且曾经为了竞选国会议员而放弃了行政职务。1951年，中曾根康弘致信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批判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为他赢得了坚定的保守派的名声。自此以来，他的立场始终牢牢与自由民主党右翼保持一致。他领导了一个党派，并主管了几个部委，但始终没能获得足以成为首相的广泛支持。<sup>③②</sup>

得益于中曾根康弘在宣传方面的努力，人人都知道所谓“行政管理”只是精简政府规模的委婉说法。1982年初，行政管理厅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国会立即按照其建议废止或者修订了共计355件法规，还减少了对于政府雇员的拟议加薪。在国会占大多数的自由民主党在当年的10月27日推举中曾根康弘为日本首相。他的竞选宣言是：“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进行财政重建。”翻译过来有些绕口，但是对于日本选民来说，听起来就和罗纳德·里根的话一样简洁有力。<sup>③③</sup>



继瑞典选民抛弃社会民主党以来，保守党在一国接一国重掌大权。这些新上任的自信而果断的国家领袖们，一扫民众对于不可治理性的担忧。眼前的问题变成了：他们这些降低税收、提高市场自由度、强化个人责任和增加社会活力的政策，是否能让经济重现数年之前的繁荣景象。

---

① Michael J.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166.

② 美国的犯罪数据来自: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Statistics, <http://www.ucrdatatool.gov>.

③ James Sterngold, "Kakuei Tanaka, 75, Ex-Premier and Political Force in Japan, Di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93.

④ Suzanne Berger, "Politics and Anti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Seventies," *Daedalus* 108 (1979): 27 - 50.

⑤ Samuel Brittan, "The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f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1975): 156 - 158.

⑥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7, 74, 181 - 237.

⑦ Sir Keith Joseph,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Be Mealy-mouthed: Intervention Is Destroying Us," speech at Upminster, June 22, 1974, at [www.margaretthatcher.org/archive/displaydocument.asp?docid=110604](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archive/displaydocument.asp?docid=110604). See also Hugo Young, *The Iron Lad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9), 85; Armin Schafer, "Kr

isentheorien der Demokratie: Unregierbarkeit, Spatkapitalismus und Postdemokratie,” *Der ModerneStaat* 2, no. 1 (2009): 159 – 183. On Brandt’s purported prediction, see Crozier et al.,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2.

⑧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 – 2008 AD*, [www.ggd.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http://www.ggd.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viewed May 8, 2016.

⑨ Judd Stitzel, *Fashioning Socialism* (Oxford: Berg, 2005); Eichengreen,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131 – 162.

⑩ “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ashington, August 13, 1974,” *FRUS 1969 – 1976*, vol. E-15, part 1, document11, and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cember 4, 1973, *ibid.*, document 28.

⑪ 施密特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不明。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评论道：“这句话我只说过一次，就被引用了一千次。一次就够了。” See “Verstehen Sie das, Herr Schmidt?” *Die Zeit*, March 4, 2010.

⑫ I have used the translation of Lennart Bilen. Roger Choate, “Ingmar BergmanTax Ordeal Swings Swedes Against Government,” *The Times* (London), May 10, 1976; William Dullforce, “Strong Sw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n Sweden,” *Financial Times*, May 11, 1976; William Dullforce, “Have Swedish Taxes Reached SaturationPoint?” *Financial Times*, May 21, 1976.

⑬ “Bergman says farewell to Sweden,” *The Times* (London), April 23, 1976; William Dullforce, “Ingmar Bergman Goes into Tax Exil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1976; Birgitta Steen, *Ingmar Bergman: A Reference Guide* (Amsterdam: AmsterdamUniversity Press, 2005), 956.

⑭ Sven Olson, “Sweden,” in Flora, ed., *Growth to Limits*, vol. 1, 15.

⑮ Olof Petersson, “The 1976 Election: New Trends in the Swedish Electorat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1 (New series, 1978): 109–121; “Modell in Gefahr,” *Der Spiegel*, September 13, 1976; Gerard Caprio, “The Swedish Economy in the 1970’s: The Lessons of Accommodative Policies,” Federal Reserve Board international financed discussion paper 205, April 1982.

⑯ Labour Party Manifesto, February 1974; Sandbrook, *State of Emergency*, 611–645.

⑰ David McKie, “Lord Callaghan,”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05; “Lord Callaghan of Cardiff,” *The Telegraph*, March 28, 2005; Peter 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

⑱ Graffiti cited in Andy Beckett,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70s Britain,”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09.

⑲ Prime Minister James Callaghan speech to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Blackpool, September 1976, <http://www.britishpoliticalspeech.org/speech-archive.htm?speech=174>; October 1974 Labour Party Manifesto, <http://www.labourmanifesto.com/1974/oct/>.

⑳ Joel Krieger,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Decl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

㉑ Andy Beckett, *When the Lights Went Out: Britain in the Seventies* (London: Faber, 2009), 486.

㉒ Margaret Thatcher, “Party Election Broadcast,” April 30, 1979,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Archives (MTFA), document 104055. 关于民众对英国经济长期下行的恐惧，参见：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30–49。卡拉汉的引文在有几个版本，都没有权威确证。

②③ For example, see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②④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Monthly Energy Review*, February 2015, Tables 9.1 and 9.4.

②⑤ Stacy L. Schreft, “Credit Controls: 1980,”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0): 25–55.

②⑥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Hugh Heclo and Rudolph Penner, “Fiscal and 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in Fred I. Greenstein, ed., *The Reagan Presidency: An Early Assess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⑦ 1980年10月28日里根与卡特辩论的文字记录, 参见: <http://www.debates.org/index.php?page=october-28-1980-debate-transcript>.

②⑧ John Antcliffe, “40 Years Ago Today: Governor Reagan at the Royal Albert Hall,”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5, 2009. 撒切尔夫人没有参加董事学会的演讲, 但她的丈夫告诉了她。她的丈夫当时在场, 并获得了一份打印件。See January 8, 1990, interview of Thatcher by Geoffrey Smith, MTFA, document 109324.

②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Perspektiven des Wirtschaftswachstum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is zum Jahre 1995,” December 6, 1979, appendix Table 12, BA, B102/306599.

③⑩ Yasuo Takao,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The Case of Japa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 (1999): 265–266; Ellis S. Krauss, “Japan in 1983: Altering the Status Quo?” *Asian Survey* 24 (1984): 89; James Elliott, “The 1981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Japan,” *Asian Survey* 23 (1983): 765.

③① Martin Fackler, “Japan’ s Elder Statesman Is Silent No L  
ong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10.

③② Toshiaki Tachibanaki, “Japan Was Not a Welfare State, Bu  
t...” in Griffiths and Tachibanaki, *From Austerity to Afflue  
nce*, 205; Kumon Shumpei, “Japan Faces Its Future: The Politi  
cal-Economics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10 (1984): 143 – 165.

## 第11章 撒切尔

①



②

③



1

\_\_\_\_\_

\_\_\_\_\_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_\_\_\_\_

⑫

⑬

\_\_\_\_\_

⑭

⑮





1

⑰

⑱



\_\_\_\_\_

②0

②1

\_\_\_\_\_



24

25

26

\_\_\_\_\_





29

30



③②



③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③①

③②



## 第12章 左翼的最后战场

1

1



\_\_\_\_\_

②

\_\_\_\_\_

③

④

\_\_\_\_\_

⑤

\_\_\_\_\_

⑥

⑦



\_\_\_\_\_

⑧

\_\_\_\_\_

\_\_\_\_\_

⑩

⑪





\_\_\_\_\_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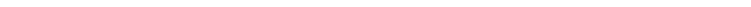
⑱

⑲

\_\_\_\_\_



②①



①

②

---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

⑱

⑲

⑳

㉑

## 第13章 早安，美国！

1979年10月6日，华盛顿，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周六。下周一是法定假期——哥伦布日，华盛顿的大部分官员已经离开首都，分散到各地度过长周末。与新闻媒体一道留下的人则在关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正在白宫首次与卡特总统会面。第二天他将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主持一场露天弥撒。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处——这就是美联储举行秘密会议的好日子。

当天上午10：10，央行的高级官员围坐在美联储会议室里27英尺（约为8.23米）长的桃花心木桌子边召开会议。他们的心情十分沉重。距离全球性经济繁荣的戛然而止已经过去了6年，此时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走向正轨。虽然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通货膨胀却没能得到控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攀升。1979年1月伊朗革命之后，石油价格急剧上涨——美国炼油厂在1978年底为进口石油支付

的价格是15美元一桶，仅在9个月之后，就变成25美元一桶——这给制造业和运输业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1979年，美国人在汽车燃料上的总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一，极大削减了普通人的购买力，进而对整个经济体的就业形势造成了重击。

美联储会议的参与者们都阅读了由两位负责执行货币政策的官员准备的报告。报告开头就是一片阴霾：“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对于通胀的心理预期在市场上造成了投机压力，其中包括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黄金市场。”根据三周前的经济数据，最新的预测结果仍然是负面的：经济衰退将始于本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到1980年底，失业率将从6%上升到8.1%。与会的每个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在9月18日上一次会议中议定的措施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当时，8人投票支持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4人因担心高利率将导致经济状况恶化而投了反对票。这种尖锐且公开的分歧表明，美联储缺乏全力抗击通胀的决心，而这又让金融市场陷入了慌乱之中。<sup>①</sup>

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央行官员们就一项计划达成了一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联储将停止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稳定价格。相反，它将充分利用联邦储备体系中数千家银行的准备金总量。“通过货币供给机制，加强对准备金的管控，并限制货币供给增长，我们认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好地控制货币总量。”沃尔克说。能够理解这段话的美国人可能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是消息传到了华尔街，这里的交易员

对每个美联储官员的每一句话都要详加解读。更何况银行的自有准备金是衡量国家货币供应量的指标之一。以准备金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美联储与4个月前的英格兰银行一样，开始向货币主义迈进。<sup>②</sup>

不管是沃尔克还是美联储的其他政策制定者，都不信奉货币主义所宣扬的机械地管理货币供给的理论。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责任是对一系列数据和事件报告进行评估，从而探明经济状况，并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10月6日公告，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沃尔克震荡”，似乎消除了美联储前期不断调整货币政策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自此之后，美联储将在固定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的约束之下行事。

但这并非沃尔克的初衷。之所以要对货币政策进行约束，美联储的真实目的在于扫除降低通胀道路上的两个政治障碍。一方面，美联储希望能够安抚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那些颇具影响力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他们那些在《华尔街日报》上不断对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进行攻讦的支持者们。如果他们对美联储的抨击转变为称许，金融市场或许会产生通胀率下降的普遍预期。假若如此，利率也将随之下降，而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利率的下降，事实上对降低通胀率确有帮助。另一方面，美联储还希望新的立场能够使其在未来的政治攻讦面前幸免于难。然而，此时美国的通胀率已经高达12%，这样的数字只在战时价格管制刚刚结束时出现过一次，想要平息这样的高通胀，需要提高的利率之多似乎在美国前所未见。

如果美联储公开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并宣布将短期利率提高到15%或20%，汽车经销商、建筑工人和企业高管会闹得沸反盈天，愤怒的国会议员甚至可能剥夺央行的独立管理权。然而，如果高利率仅仅是货币主义者所主张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副产品，那么美联储在受到批评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支持。正如沃尔克在周六会议上对他的同事们所说：“这在政治上更容易推动。”<sup>③</sup>

“保罗·沃尔克是谁？”仅仅在3个月之前，当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Anthony Solomon）推荐此人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问道。沃尔克出生在新泽西州，他的父亲是一名镇行政官员，他本人在1952年进入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从初级经济学家做起，曾几度进入政府工作。沃尔克对于国内外的货币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博弈都不陌生：他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在财政部工作，尽管他是民主党人，仍被尼克松政府邀请担任财政部的高级职位。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期间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他的名片盒里保存着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私人电话号码。<sup>④</sup>

1974年初，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也就是尼克松的“能源沙皇”，在财政部的级别位于沃尔克之上。4月，也就是陷入困境的总统提名西蒙成为财政部长前不久，沃尔克突然辞职。他没有公开做出解释，但他不同意西蒙的自由主义思想并非秘密。沃尔克的知识人脉让他在私人机构拿到了上百万美元的薪资，但美联储主席

阿瑟·伯恩斯还有不同的想法。沃尔克在财政部工作期间，两人接触频繁，伯恩斯希望有沃尔克在身边辅佐。他帮助沃尔克获得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职位，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正是执行美联储日常货币政策的前哨，并且深度参与外汇事宜。身处这一岗位，沃尔克在美联储委员会中拥有一票的投票权，该委员会就是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sup>⑤</sup>

1978年，卡特拒绝重新任命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以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斯就此离开联储。而曾任公司高管的米勒完全不适合这份工作，于是，他接受卡特的建议，于1979年7月改任美国财政部长。此时，美联储就有了一个空缺需要总统填补。这就是卡特第一次听到沃尔克名字的时候。两周之后，仅在卡特与沃尔克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一次面谈以及参议院迅速确认之后，主席办公室就开始萦绕着沃尔克廉价的Antonio y Cleopatra Grenadier雪茄烟雾。

卡特在经济问题上并非特别专业，更谈不上熟悉沃尔克观点的细节。就像所有政治领导人一样，总统赞成降低通货膨胀，但也和普通大众一样希望美联储能够循序渐进，在实现价格稳定的同时不让更多人失业——而且不能危及总统在1980年的连任。美联储十多年来一直在尝试这样做却没有取得成功，但这一事实并没能改变总统的意见。

沃尔克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就警示过“我们的经济管理能力有限，暂不能同时满足保障充分就业的需求”，也就是说，降低通货膨胀必将

消耗就业机会。1979年初，沃尔克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供职之时，曾多次在美联储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投票支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抗通胀，但他的观点属于少数。在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几周之后的一次货币政策投票中，四位联储高级官员反对他的加息议案，可谓对他的反通胀计划发起了正面挑战。第二天早上，这条消息就被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美联储的成员们第一次大声反问，为了保护美元的价值，不断追逐节节攀升的欧洲利率，最终让国民失业、企业破产，这一切是否真有意义。”<sup>⑥</sup>

沃尔克计划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将政策关注的焦点从利率转向了银行储备。这样一来，美联储官员也就不必在投票时顶着天大的压力了。美联储在10月6日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建立规则来减缓银行储备的增长。之后，联储只需按规则行事。从此以后，央行官员将不必再讨论如何用高利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降低通胀率这类充满争议的议题，因为利率不再将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

当然，美联储的新政策不仅仅是玩了个文字游戏。所有相关人士都非常清楚，减少银行储备金的增长率，意味着银行间隔夜贷款利率——也称为“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10月6日会议期间，联邦基金利率为11.9%，3周后达到15.6%，下一年3月时达到了17%。由于借款变得更加昂贵，银行削减了对消费者和企业的贷款。长期利率也有所上升，虽然没有特别剧烈，这表明金融市场对经济萧条的预期越来越强。

市场的眼光没有出错。美国的高利率反过来又推高了其他国家的利率，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在荷兰，失业率在接下来的4年内上升了9%；在德国，失业率上升了超过5%。韩国经济陷入衰退，巴西长期强劲的经济增长也趋于停滞。但沃尔克政策冲击所造成的第一桩政治伤亡，却发生在美国：新房建设量减少了一半；汽车的销售量，从每年1400万辆下降到了不足1000万辆；失业率上升近2%。虽然经济周期的低点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已足以导致卡特败北。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sup>⑦</sup>

罗纳德·里根是美国右翼的明星。作为一名前任演员和企业家精神的倡导者，他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加利福尼亚州担任过两届州长。他的言论充满右翼保守气息，赞扬自由市场和小政府主张，甚至做出过“让领福利金的废物重新回去工作”的直率承诺，正是这些言论让他在1966年的竞选中成功当选州长。与持有保守道德观的大多数人（这些人多是住在阳光地带城郊和小镇上坚信基督新教的共和党人）不同，他没有那么吹毛求疵；与共和党中的华尔街银行家（他们认为政府收支均衡是必须的）不同，他不会那么死板。其他保守派人士火气冲天，但里根展现的是一种更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出发点在于对普通人的关切。

帮助里根入主白宫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经济形势。1979年11月，保守的伊斯兰运动推翻了伊朗国王，多名美国人沦为伊朗人质。营救人质的进展每晚都在电视新闻中播出，许多选民指责卡特措施不利，导致人质被长期监禁。里根就职之



时，举国上下都对未来充满不乐观的预期，生活水平进入下滑通道，国民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让经济步入正轨是他任职之后的首要任务。“一开始制定的规划就是，将里根经济计划作为所有重大举措的重点和基础，无论国内国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后来写道。<sup>⑧</sup>

除了关于小政府主张的老生常谈和对企业精神的坚定信念之外，里根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经济哲学。他对经济顾问的选择也不拘一格，从严格的货币主义者，到提倡增加政府开支以克服衰退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有上达天听的机会。然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宣扬的是的一种叫作供给学派的新经济学理论。出于宗教热情和自由主义狂热，供给学派学者认为，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衰退，错就错在政府把目标设置为不断努力提高收入，使人们产生经济繁荣之感，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学派认为，经济政策不应该追求消费者需求的提升，而是应鼓励发明者、企业家和投资人作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要关注经济的供给一方。他们断言，归根结底，供给是唯一真正的需求来源。只有供给侧的扩展，才能增加经济产出并创造就业机会。

供给学派的观点对里根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政府应该减少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供给学派最有天赋的倡导者之一，在他1981年出版的畅销书《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中断言：“与其说贫穷是一种收入状态，倒不如说

是一种心态，而且……政府救济会使大多数依赖它的人越来越萎靡。”提供给失业者的补贴“阻碍了生产性的劳动”，应当予以限制。“事实上，”吉尔德写道，“经济学家倡导的几乎所有促进平等和消除贫困的措施——通常旨在刺激消费——都会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而生产又是需求的真正源泉，最终需求也会因之受损。”因此，供给派学者坚定地站在了福利社会的对立面。<sup>⑨</sup>

与许多其他“大政府”的批评者相比，供给学派在税收政策方面的观点有所不同。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强调财政预算均衡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减税虽然可取，但也要和减少政府开支相配合，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政府深陷赤字的泥潭。相反，对于供给学派而言，财政赤字只是细枝末节。他们解决经济增长缓慢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药方就是减税——但又不是一概而论的减税。他们认为，对投资征税惩罚了承担风险和创业的精神，也就是惩罚了供给的创造者，因此针对投资收入的所得税应彻底取消。对于家庭和企业累进征收所得税，高收入部分税率过高，则会让人们丧失进取的动力，同时让部分经济活动转入地下。取消资本利得税并降低边际税率，会为就业和投资带来新的动力。经济将随之繁荣，税收总额甚至可能超过原有水平。<sup>⑩</sup>

当然，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于收入最高的人群。这是累进税的本质，是每个高收入国家都存在的税率阶梯，其目的就是让收入微薄的人少交或根本就不交所得税，高收入者则要多交所得税，而且收入越高，税率也就越高。从所得税

制度产生之初，累进制便被认为是征税最为公平的方式。但供给学派不能苟同。他们声明，累进制税收是为了将收入重新分配，而非促进经济增长。“所有这些财产转移都是零和游戏。”吉尔德断言。对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人——正是这些人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在促进社会财富的累积——征收重税，无异于杀鸡取卵。

按照供给学派解释，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的真相在于，富人将钱换成了黄金或者用于避税，而不是冒着风险进行生产性投资，因为即便投资成功，收入也会被税收耗去大半。根据供给学派的分析，正是因为累进税制之下的富人不再愿意承担风险，导致了近些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进而影响了所有人的就业前景和生活水平。吉尔德这样总结教训：“为了帮助穷人和中产阶级，必须给富人减税。”<sup>⑪</sup>

供给派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当时的论战参与者，而非经济学教授。虽然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以及国家经济研究所税务研究室前负责人诺曼·图尔（Norman B. Ture）也声称，减税会激发投资，鼓励企业家精神，但学界对于供给学派理论的研究和分析却少之又少。事实上，当时针对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税率已经很低，这点几乎没人注意到。供给学派关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放缓应当归咎于高累进税，以及对富人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复苏的说法并未得到验证。同样未经证实的观点还有，降低税率会让躲在地下避税的资金重新回到阳光之下。<sup>⑫</sup>

至于所谓的拉弗曲线，也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据说这条曲线最初是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华盛顿某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来的。拉弗曲线表明较低的税率能够刺激经济，从而促进政府收入增加。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拉弗的理论没有争议。人人都同意如果税率畸高到某个点，人们将不再费心去工作赚钱，此时税收总额就会开始下降。然而，拉弗的草图并没有说明这个点到底是多少，供给学派阵营中也没有其他人愿意猜上一猜。对该观点的唯一严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所得税税率还可以定得更高，直至降低税率能让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现有证据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当前的行为是不理性的。”唐·富乐顿（Don Fullerton）写道。此人后来成了里根政府财政部的税务官员。<sup>⑬</sup>

不管有没有证据支持，降低税收将重振经济这一观点，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1981年2月18日，也就是在上任不到1个月后，里根公布了他的经济复苏计划。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出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本身。”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大幅减少个人和商业税的措施，政府也将削减预算，把联邦支出从1981年占经济总产出的23%，降低到1986年占经济总产出的19%。里根政府断言，这些新政策不仅会使低迷的经济重新复苏，还会使它彻底转型。“到1986年，美国经济将产生1300万个新工作岗位，比维持现有政策的情况要多300万，”计划报告中承诺，“经济发展将摆脱疲弱的现状，实现更加强劲的增长，大约每年上升4%~5%。”根据他的计划，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告诉全国：“从明年开

始，政府赤字将逐年缩小，用不了几年，财政收支就能实现平衡。”<sup>⑭</sup>

国会议员们没有傻到阻挡高速前进的列车。1981年8月颁布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中，包含了里根要求的大部分内容。原有的14段所得税累进等级减少到了5段，以防原本就跟不上通胀的工资增长将家庭所得推到更高的征税等级。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面临的最高等级税率从28%降到了24%，家庭实际收入大幅增长；收入水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家庭面临的最高等级税率则从70%降至50%。还有一点让该减税政策更具魅力：虽然政客宣称低收入家庭享受减税的比重最大，但富裕家庭得到的减税金额最高，这与供给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年收入约1万美元的工薪家庭，1982年会因新政策节省74美元税款，而年收入10万美元的公司高管则能节省1897美元。企业也获得了极高的税收减免，据说这将引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尤其是在新机器和设备方面。<sup>⑮</sup>

里根的减税计划立即投入执行。但政府开支的削减却没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总统自相矛盾的愿望：想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同时又想大规模增加军费支出，包括为海军建造100多艘新船，添置数百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甚至重新启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停用的二战时期的战列舰。1981年3月，里根在上任2个月后，提出了第一份预算议案。其中预计在排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到1984年国防开支每年增长8%，而所有其他政府支出每年将下降约4%。但总统的政治顾问们保证，一些政治敏感的福利计划中的“基本权益”，包

括每月的社会保障支出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都不会被触及。由于不能动摇“神圣”的社会保障、军费开支和国债利息，联邦支出中的相当大部分被排除到了预算削减计划之外。<sup>①⑥</sup>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实现缩减联邦支出的结果，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支出都需要被大幅削减。在被里根的顾问们称为“裁减室”的行政办公楼248号，总统的预算工作组逐一确定目标。1982年，提供给40个医疗和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总共减少了四分之一。政府将停止向津贴领取人提供免费的肺炎疫苗，预计在4年内会缩短5000人的寿命。许多老人之前工作时收入就很低，每月领到的退休金也寥寥无几，现在也难逃收入缩减的厄运，即便总统所谓保留“基本福利”的承诺言犹在耳。穷人的住房福利、带孩子的贫困家庭的补助金以及提供给学校的午餐补贴都任由宰割。总体而言，里根建议将除了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联邦开支从1981年占国民总收入的17.3%减少到1984年的不到13%，二战以来所有新增的社会福利几乎都被削减殆尽。<sup>①⑦</sup>

然而即便如此，联邦预算收支仍无法达到平衡。1982年的政府预算仍存在严重的赤字。而1984年的政府预算之所以能够达到平衡，要感谢财政收入一栏标了星号的440亿美金收入。页脚对星号的注释仅有一句：“今后的结余尚有待确定。”<sup>①⑧</sup>

无论形势如何，想要国会批准这种规模的支出削减都相当困难。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采取的反通胀政策则使其成为

不可能。该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980年春天位于15%的高峰通货膨胀率，到了1981年5月已回降至10%以下。但美联储认为经济复苏将令通胀率再次上涨，于是坚决地踩住了经济增长的刹车：利率不断攀升，即使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1981年夏天，银行间隔夜拆借的利率达到了19.9%，比通货膨胀率高出10%——对于仅几个小时的资金周转来说，简直是令人咋舌的高价。由于借款过于昂贵，银行贷款和商业投资都趋于停滞。房地产市场亦是一潭死水，仅仅在卖方愿意向买方提供抵押贷款时，房子才卖得出去。各处都笼罩在裁员的阴影之中。由于税收收入远远低于预期，里根，这个认为美国宪法应当强制要求联邦预算收支平衡的总统，发现自己当政期间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财政赤字。

面对赤字危机，国会开始讨论如何取消减税政策，虽然这些措施才刚刚开始实施。1982年，新的税法出台，多项1981年颁布的商业保护政策被废止。新法之下，投资者更难规避对利息和分红的征税，吸烟的人要交更高的卷烟税。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年生效的减税政策又被取消。从某些方面来看，1982年的税法是有史以来国会通过的税收增幅最高的法案。它能让联邦政府的年收入提高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的金额。即便如此，最高税率仍远低于里根就职时的水平。

里根声称，之所以同意推翻他在一年前争取到的减税政策，是因为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每增加1美元的税收，财政支出就会相应减少3美元。然而，在1981年无法实现的开支

削减，在1982年仍然难如登天。由于政府坚持要扩大和重新装备军队，想要实现目标，几乎所有其他的政府项目都需要大幅削减开支——对此，里根政府的内阁官员没有一个做好了提出议案的准备，国会也不会轻易赞同。“削减预算是一个痛苦的政治过程，而里根政府从未真正愿意将其付诸实践。”里根的预算主管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后来承认。<sup>①⑨</sup>

总体来说，在1981年和1982年税法之下，里根政府征收的税金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大幅下降，但政府支出并未同时收缩。里根的成绩得不到选民的认可。“事实上，1982年的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和工作总时长，都低于1979年的水平。”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Edward Denison）写道。1982年11月众议院重新选举时，很多在1980年与里根一道上台的共和党人被扫地出门。<sup>②⑩</sup>

1982年8月，形势仍未见任何好转的迹象。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8个交易日下跌，总计下跌5.6%。“昨天，股票价格继续回落，投资者对利率走向深表担忧。”《纽约时报》8月6日报道称。“现在是熊市。”某知情股票分析师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宣布。8月13日，《泰晤士报》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话，预测股市在触底之前至少还会再下跌5%。如果有人在1973年10月5日（赎罪日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购买股票，在大约9年的时间里，他的股票资产将减值近五分之一——即便不考虑美元购买能力的下跌。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时，分散投资在3



0余只道琼斯股票上的1000美元，到1982年价值不足370美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信心全无。

然而，在8月13日，股价已经开始回升。股票市场似乎已经触底。两个交易日后，著名的华尔街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告诉客户，债券市场也已触底，暗示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上升。考夫曼的言论带动了股市疯狂上涨，道琼斯指数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所谓通货膨胀无法被击败的传统观点被断然抛弃，新的智慧箴言是沃尔克的美联储赢得了战争。公众视野之外，来自境外金库和银行的资金不断涌入美国的金融市场。涵盖500只美股的宽基指数在3周内上涨了16%。10月，美联储推翻了沃尔克1979年的政策，放弃以货币供给为政策目标，转而盯住利率，并宣布以降低利率为导向。这一举措再次推高股市。从8月13日到当年年底，美股价格上涨了35%。<sup>②①</sup>

美国股市的狂欢——人们期待已久的“牛市”——将会前所未有地延续17年之久，债券市场的牛市甚至长达30余年。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投资人的黄金年代。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一时机同样宝贵。1983—1986年，美国政府公布的年度赤字平均为国民收入的5%，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政府庞大的借贷需求使利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高利率吸引了大量来自境外的资金，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境外资金维持了美国的表面繁荣，但其副作用是毁灭性的。为了在美国投资，外国投资者要在货币市场上购买美元。他们的需求推动了美元的猛烈升值：1985年，美元兑一揽子外币的汇率比里根上任时高出了77%。投资者在两个方面均可得利，一边享受美国股市和债市的繁荣，一边坐拥美元升值的收益。<sup>②②</sup>

但是，美国本土制造商面临的局面就十分困窘了。过去，进口制成品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1980年的总值仅相当于经济总产出的5%，而这个数值在欧洲则超过15%。由于美元的强势，进口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导致1981—1986年美国进口商品的总值上涨了40%，而美国出口商品的总值却在下降。随着工作岗位的减少和收入的降低，工业城镇的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轮胎制造中心，超过三分之一的橡胶业工作岗位在20世纪80年代消失，该地区经济的总产值陷入停滞。学校、公园和公共图书馆也因为工厂缴纳税金的减少而年久失修。即使是保住工作的工人也不能幸免，因为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他们分期付款购买的房屋，在当地大型厂商关闭之后，价值也会大大贬损。80年代初期，当挖掘机和推土机制造商卡特彼勒的市场被日本的小松集团大量抢占后，其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总部附近的房屋均价下降了20%，这还没有刨除通货膨胀的影响。<sup>②③</sup>

1984年，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团队为他的连任制作了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广告。其中既没有对他的竞选对手沃

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严厉谴责，也没有任何能让愤世嫉俗的选民嗤之以鼻的空头承诺。相反，在一艘渔船出海的宁静场景中，一名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向一辆汽车，旁白是温和的男声：“这就是美国的清晨。今天，我们国家的就业岗位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下一个画面中，一大家子人搬入新房，接着是一对年轻男女宣读婚姻的誓言，旁白在提醒观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下降了一半，未来充满了光明。广告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难道我们想要重回四年前的窘境吗？”——四年前正是蒙代尔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副总统的时期。

“美国清晨”这部广告片不仅帮助里根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同时还给人们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正是里根的税收政策和缩减政府支出政策带来了经济复苏，而且在未来的几年中，里根政府还会不断强化这一观点。然而，这种论断难免有些牵强。广告中强调的两大经济成就——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非是政府的功劳，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里根减税的热情以及对巨额预算赤字的容忍，甚至可以说让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比财政收支平衡时更高。事实上，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内经济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他对沃尔克的坚定支持，没有这种支持，美联储很可能迫于政治阻力而无法将美国经济从通货膨胀中解脱出来。<sup>②④</sup>

除了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控制之外，里根的经济政策并无太多亮点。1982年8月开始的牛市第一年，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尽管经济从1983年开始走高，利率下降

也带动了建筑业和汽车行业的复苏，但就业市场依旧低迷。相比于政府承诺的从1981年到1986年新增1300万个工作岗位，实际的增加数量不到1000万。从股市热潮开始到1987年8月，整整花了5年时间，失业率才回落到6%——1973年之前，这样的失业率代表着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之中。在理查德·尼克松时代，5%的失业率都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阿瑟·伯恩斯不得不因之放弃对抗通胀。到了里根时代，6%的失业率反被称赞为一项重大成就。<sup>②⑤</sup>

即使对于已经加入就业队伍中的1800万美国人来说，在里根任期结束的1989年，经济也很难让人感到活力。在里根任期内，所得税率的下调让全职工人每周实得工资的中位数上升了约5%。但是，女职工的工资涨幅与男性差别很大。在里根时期，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的女性的购买力上升了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的男性的购买力完全没有上升。收入最低的人群情况最差：尽管有减税政策，1980—1989年收入水平排在后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平均收入还是下降了约4%。<sup>②⑥</sup>

20世纪80年代，很多家庭有相当大比重的财富凭空蒸发。在美国，房屋价值能占到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50个州中有27个州1990年的平均房价水平要低于1980年。如果已经申请了住房抵押贷款，再办信用卡或汽车贷款时，个人要支付的首次付款比重也变高了。这导致许多家庭在1982年经济衰退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处于巨大的财务压力之下。1992年，美联储经济学家观察到，在里根时代，一些人

赚得盆满钵盈，但更多人则所获无几：“人均收入和资本净值的中位数仅有小幅增长，与此同时，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却大大上涨，这意味着，从1983年到1989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更为加剧了。”<sup>②⑦</sup>

为什么里根的复兴计划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收效甚微呢？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1982年8月之后股票和债券价格的飙升增加了持有这两种资产的家庭的财富。而这类家庭往往是由年龄较大的家长主导，收入水平也远远高于一般家庭。1983年，由55岁以下的成员主导的家庭中，只有五分之一拥有债券，五分之一拥有股票——而且他们的股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超过几千美金。只有金融市场投资者把他们的意外之财花费在可能提高汽车工人、服务员或装修工人收入的事情上时，华尔街的丰厚奖金才会流向较不富裕的家庭。供给学派之前的论断——只要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人群经济状况更好，自然会给低收入者带来繁荣和福利——并没有得到证实。

里根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允许投资者保留更多的收益，就意味着会有更多新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现代化和生产力提升。但事实击碎了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说。“我所看到的基本面状况根本算不上什么经济奇迹，”里根政府财政预算方面的负责人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在1986年说道，“我们的储蓄率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去年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却并无显著提高。而我们的整个理论基础是，这一系列措施将带来生产率和实际收入的大幅增长。”

平均而言，非农业企业的每小时产出——这一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在里根时期的增长速度比1977年前要低得多，而那时的边际税率其实更高。从历史上看，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水平。但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改善也没有发生。<sup>②⑧</sup>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失望的局面，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学家格里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所说的“金融化”。按她所说，放松金融管制和高利率，让企业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快速扩张的信贷市场，专注于用钱赚钱。这一转变“采取的形式是非金融公司从对工厂和设备的长期投资中撤回资金，并将资源转移到金融市场之中”。早在1983年，这一趋势就已经受到关注，当时里根任命的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发现，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制造业的资产回报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差距愈加明显。<sup>②⑨</sup>

这一结果从商业投资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供给学派承诺投资热潮即将来临，然而大量资金被用于建设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而不是用于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本身。实际上，1981—1989年，对于商业设备的投资是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问题在制造业中尤为严重。里根总统任期结束时，美国工厂的平均设备年龄比他上任时高出一整年——这表明对制造业的投资远远谈不上强劲。许多陷入困境的制造商推迟安装新设备，尽管这些设备可以让它们从最新的技术创新中获利。他们放弃了购置新设备所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工人对加薪的愿望更加遥不可期了。<sup>③⑩</sup>

里根革命——总统的支持者们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所起的总称，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带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通货膨胀不会再被容忍。随着大政府的批评者们不断开启放松管制的新领域，市场力量在经济世界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因美元强势引发的进口热潮难以逆转，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保持增长，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美国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市场。减税的压力始终存在。对政府赤字的担忧将继续停留在讨论的阶段，不会通过增税或大幅削减支出得到切实的解决。美国政府会大力支持社会福利——但与此同时，虽然步调缓慢却相当肯定，许多福利计划将被削减，以便为不断上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腾出空间，对于困难家庭子女教育的扶持也不得不因此流产。

里根重新让美国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在经历了多年的绝望之后，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但里根革命无法实现美国人对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的期望。对于一半以上的家庭来说，排除通胀因素后，1989年的收入并没有超过1981年的水平。与此同时，雇主为工人提供的福利也在缩水。1980年有超过40%的私企员工有权享受明确的养老金福利；10年之后，仅有不到30%的人参加养老金计划。在同一时期，65岁以下拥有健康保险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5%。尽管1982年以后国民总收入增长强劲，但几乎所有收益都来自那些拥有企业或持有股票和债券的人。和其他几个富裕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迫在激流中挣扎，并且担忧他们所依赖的国家是否还能再让他们免于溺水。<sup>③①</sup>

---

① Memo to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 from Stephen Axilrod and Peter Sternlight, October 4, 1979; FOMC, “Summary and Outlook” [ “Greenbook” ], September 12, 1979; Transcript, FOMC meeting, October 6, 1979, all available at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10.htm>. 背景资料参见: David E. Lindsey, Athanasios Orphanides, and Robert H. Rasche, “The Reform of October 1979: How It Happened and Why,” 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working paper 2005-02, December 2004.

② Federal Reserve Board, “Meeting of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October 6, 1979, Minutes of Actions”; Federal Reserve Board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3, 1979.

③ Transcript, FOMC meeting, October 6, 1979, 8, 17.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尼克松的预算主管罗伯特·梅奥发现,这一转变支持了美联储批评者的意见。

④ William R. Neikirk, *Volcker: Portrait of the Money Man* (New York: Congdon & Weed, 1987), 59; Joseph B. Treaster, *Paul Volcker: The Making of a Financial Legend* (Hoboken, NJ: Wiley, 2004).

⑤ Treaster, *Paul Volcker*, 32.

⑥ Paul A. Volcker, *The Rediscove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61 - 62; John Berry, “Fed Lifts Discount Rate to Peak 11% on Close Vot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1979.

⑦ 关于美联储的储备目标如何运作的实际解释, 参见: Richard W. Lang, “The FOMC in 1979: Introducing Reserve Target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1980): 2 - 25.

⑧ Allen quotation from Cronin, *Global Rules*, 93.



⑨ George Gilder,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12, 45. Other important books by supply-siders include Jude Wanniski, *The Way the World Works* (Washington, DC: Regnery, 1978); Paul Craig Roberts, *The Supply-Sid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Bruce R. Bartlett and Timothy Roth, eds., *The Supply-Side S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3); and Victor A. Canto, Douglas H. Joines, and Arthur B. Laffer, *Foundations of Supply-Side Economics—Theory and Evid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⑩ 许多供给学派的倡导者后来否认曾预测较低的边际税率会带来较高的税收。Bruce Bartlett, “The Laffer Curve:Part 1,” *Tax Notes*, July 16, 2012. On the irrelevance of budget deficits, see Robert Ortner, *Voodoo Deficits* (New York: Dow Jones Irwin, 1990), 41 – 80.

⑪ Gilder, *Wealth and Poverty*, 12, 20, 45, 188.

⑫ 20世纪70年代，美国投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70%，工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50%。在这十年间，资本收益的税率，如出售持有一年以上的股票所获的资本利得的税率一直较低，而且一部分资本收益不在征税之列。虽然股票的红利按较高的税率征税，但这并不影响对创业公司的投资，因为这些公司通常不支付红利。

⑬ Arthur Laffer, “The Laffer Curv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1765, June 1, 2004; Don Fullert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Rates and Government Revenues,” working paper 46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pril 1980.

⑭ “America’s New Beginning: A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1981); Reagan address to Congress, July 27, 1981.

⑮ Tax Foundation, “Special Report: The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 September 1, 1981.

⑩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Building a 600-Ship Navy,” March 1982, and “Future Budget Requirements for the 600-Ship Navy,” September 1985; David A. 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130.

⑪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n Analysis of President Reagan’s Budget Revisions for Fiscal Year 1982,” March 1981, A-54-A78.

⑫ Stockman, *Triumph of Politics*, 132.

⑬ 对斯托克曼的引言来自电视节目中的一次采访。 *Frontline*, April 20, 1986.

⑭ Edward F. Denison, *Tren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29 - 198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5.

⑮ 考夫曼给客户的有影响力的说明，参见：Henry Kaufman, *On Money and Markets: A Wall Street Memoir*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168。

⑯ 衡量汇率变化的方法有很多。这里使用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贸易加权汇率指数，该指数从1981年1月的91上升到1985年3月的162（1973年3月为100）。根据美联储在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基础上调整的指数，美元的价值在这段时间上升了42%。

⑰ Trade data are from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12. On Akron, see Larry Ledebur and Jill Taylor, “Akron, Ohio: A Restoring Prosperity Case Study,”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 “All-Transactions House Price Index for Peoria, IL (MSA),” available fro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ATNHPIUS37900Q>.

⑱ For praise of Reagan’s economic policies, see Robert L. Bartley, *The Seven Fat Yea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亨利·考夫曼回忆，里根政府强烈反对他的观点，即很多联邦借款的利率都

过高了，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敦促他支持政府的立场。See Kaufman, *On Money and Markets*, 270. On the importance of Reagan's support for Volcker, see Samuelson, *The Great Inflation*, 112.

②⑤ See Nixon comments at March 21, 1970, press conferenc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 (Washington, DC: USGPO, 1971) 87.

②⑥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 (Washington, DC, 2011), supplemental data for Figure 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http://www.bls.gov/cps>. 想要确定低税率对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中位数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工资是由单个人领取的，而已婚夫妇往往共同支付所得税。根据税收政策中心的数据，家庭收入中位数——而非工资中位数——的平均联邦所得税率从1981年的11.8%下降到1989年的9.3%。将这一降幅应用于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中位数，得出里根任期内工资增长了约5%。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家庭下降的幅度较小。Data from the Tax Policy Center, at [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Content/PDF/family\\_inc\\_rates\\_hist.pdf](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Content/PDF/family_inc_rates_hist.pdf), viewed August 4, 2015. On the real incomes of the lowest 20 percent of households, see the underlying data for Figure 2 in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

②⑦ US 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Census of Housing Tables Home Values," median home values adjusted to 2000 dollars; Arthur B. Kennickell and Janice Shack-Marquez, "Changes in Family Finances from 1983 to 1989: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anuary 1992): 1-18. Installment debt reached a record level, measured against income, in 1986; see Robert B. Avery, Gregory E. Elliehausen, and Arthur B. Kennickell, "Changes in Consumer Installment Debt: Evidence from the 1983 and 1986 Surveys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October 1987): 761-778.

②⑧ *Frontline*, April 20, 1986.

②⑨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Global Competition: The New Reality* (Washington, DC, 1985), 12.

③⑩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37. 生产率增长、投资和设备平均使用年限取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衡量投资的是净投资，它考虑到了现有设备的折旧率。

③⑪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What Are the Trends in U.S. Retirement Plans?" at <http://www.ebri.org/publications/benfaq/index.cfm?fa=retfaq14>, viewed August 1, 2015. See also William J. Wiatrowski, "The Last Private Industry Pension Plans: A Visual Essay," *Monthly Labor Review* (December 2012): 4; Robin A. Cohen et al.,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Trends, 1959 - 2007," *National Health Statistics Reports* 17(2009): 9.

## 第14章 失落的十年

1

②

\_\_\_\_\_



1

\_\_\_\_\_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_\_\_\_\_

⑩

⑪



1

\_\_\_\_\_

⑬

⑭



⑮

⑯

\_\_\_\_\_



19

20





\_\_\_\_\_

②4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②③

②④

## 第15章 新世界的曙光

①

②

\_\_\_\_\_

③

\_\_\_\_\_

④

⑤

\_\_\_\_\_

⑥

⑦





\_\_\_\_\_

\_\_\_\_\_

⑩

⑪

1

⑫

⑬

⑭

⑮

1

\_\_\_\_\_



⑰

⑱

\_\_\_\_\_

⑪

⑫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

⑱

⑲

⑳

# 致谢

1